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15年)

## 目录

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怕犯民族主义的错误 .....	2
太原警察暴行案能否得到合理解决，关键有三条 .....	5
为山西 12·13 讨薪女工周秀云命案联署呼吁信 .....	7
致《为山西 12·13 讨薪女工周秀云命案联署呼吁信》发起人的信 .....	13
积小胜为大胜，积量变为质变，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 .....	15
论钓鱼岛问题上的社会护国主义立场 .....	18
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	23
为中国马列毛左派的政治成熟而斗争 .....	28
站在生态悬崖边缘的中国，怎么办？ .....	31
当工人运动高潮来临时，“劳工界”何去何从？ .....	40
要坚决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做斗争 .....	44
中等收入陷阱、劳工新政、二十世纪的终结及二十一世纪的开始 .....	47
关于“文革造反派”的几个问题 .....	57
关于发表郭松民同志“关于文革造反派的几个问题”的说明 .....	59
周舵先生和马克思 —— 自由派没落时代的哲学和经济学 .....	61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理论和统计问题 .....	66
阶级斗争、经济危机和马克思主义 .....	75
中东与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 .....	87
学习毛主席的战争理论、正确认识当前阶级斗争的特点 .....	90

## 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怕犯民族主义的错误

远航一号（2014年11月23日）

读到龙翔五洲网友转来的关于日本外相正式表态，宣称所谓“尖阁列岛不存在主权问题”这一消息后，义愤填膺。结合当前政治实际，写了两段随笔，受到解廌角网友鼓励，贴在这里，供各位网友批评：

纸包不住火，终于露馅了！钓鱼岛问题，在当今买办资产阶级政府手里，已经台湾化、国际化，既成事实化！钓鱼岛问题要解决，中国必须依托作为东亚唯一世界级大国的历史、人口、地理优势，下决心与日决裂，下决心与日断绝一切经济、政治、文化往来，用时间拖垮日本，进而达到根除日本军国主义的目的。

中国马列毛左派要有创造性的思维，在钓鱼岛问题上可以不怕犯民族主义的错误，要以钓鱼岛问题作为启发民众觉悟、特别是启发青年觉悟的契机。在当前买办资产阶级统治下，中国是决不可能与日本发生战争甚至于武装冲突的。对此我们不必有幻想，也不必害怕。但是通过揭露现政权买办投降，可以启发群众觉悟，并为未来革命胜利后彻底断绝与日经济关系做铺垫。

与日断绝经济关系，是要付出代价的，资本家要赔本自不必说，离不开洋货的小资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工人阶级也要付出代价。不用爱国主义，这个道理不好讲。中、日、韩、台是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核心。搞垮了日本，搞垮了中国出口业资产阶级，就是搞垮了资本主义，就是给世界革命做贡献。

以上自然是不成熟想法，可以在今后斗争中逐步发展。但是基本来说，我们不要小看钓鱼岛的问题。钓鱼岛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两国领土争端，它牵涉到中日两个大国，关系到东亚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稳定。于中国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来说，一切加强

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不稳定的因素，都于中国无产阶级有利。

就钓鱼岛问题本身来说，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中国近现代民族解放革命未彻底胜利的产物（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影响没有消除，台湾问题没有解决，日本军国主义没有根绝）。无论从阶级的立场，还是从民族的立场，都必须坚持对钓鱼岛问题的完全彻底解决，也就是彻底地、巩固地、永久性地确立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就目前政治工作来说，当然一方面要利用资产阶级当局立民族主义牌坊的企图，坚决宣传中国对于钓鱼岛拥有毫无争议的主权，使“钓鱼岛是中国”的思想深入人心。但是更主要的，是积极揭露当局一切表面“强硬外交”、实际妥协投降的阴谋，以此来达到教育青年、教育群众的目的，并推动广大爱国青年思想的觉悟。

对于来自广大爱国青年的自发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捍卫钓鱼岛主权的行动，一般予以坚决的支持，并且在支持过程中打破青年对当局“强国”的幻想，并启发其进一步的觉悟。对于在青年爱国运动中出现的盲目反日排日（指针对一般日本群众而不是日本资本家）、民族沙文主义、种族主义的言行，在政治上有利时（即易于被群众理解时），积极予以劝阻；在政治上不利时，与之保持距离，等待群众觉悟。

中心目的，要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一旦政治形势有变，马列毛左派可以将收复钓鱼岛作为自己东亚外交的中心要求，并不惜为此与日本全面破裂。所谓全面破裂，就是断绝政治、经济、文化一切往来，包含军事准备，但主要不是靠打仗。打仗，目前以及今后相当一个时期，打不赢，也巩固不了。只要以钓鱼岛为契机，砸烂东亚资本主义的摊子，就是胜利。离开了中国资本主义，日本资本主义必垮。

日本人民群众一开始可能不理解，但是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日本与中国要比日本与美国近得多。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中日人民总归是要友好的。对于中国人民来

说，对日断绝关系，无非是暂时少了日本技术、少了日本汽车、少了日本消费品。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少了这些东西，一定可以继续生存和繁衍下去，而且必将繁荣昌盛起来！

## 太原警察暴行案能否得到合理解决，关键有三条

### 远航一号（2014年12月31日）

据新华网12月30日报道，记者从山西省太原市相关部门了解到，针对该市小店区发生的“12·13”案件，12月30日凌晨，太原市检察院已对涉案民警王某以涉嫌滥用职权罪批准逮捕。目前，案件侦查工作仍在依法进行中。

从目前报道的情况来看，政府方面已经意识到，太原警察暴行案，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民愤极大，如不迅速采取一些缓解民愤的措施，将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然而，从太原检方的初步措施来看，山西地方政府和公检法部门仍然是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受害人家属以及广大群众敷衍了事，而不是认真解决问题。

观察此案的关键有三条：第一，是否全部犯罪嫌疑人均被依法逮捕并按照法律得到其应得的惩罚，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是否准确、量刑是否恰当；第二，政府对受害人及其家属能否给与应有的赔偿和抚慰；第三，中央以及各级政府能否从此事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并以此为契机解决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关心的两大问题，其一就是解决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的建筑业及其它各行业农民工工资大量、持久被拖欠的问题，其二就是整顿各地公安机关、严禁警察个人或单位非法滥用暴力，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人身自由和安全。

太原警察王某殴打讨薪农民工周秀云女士及其家人，并导致周秀云女士死亡，此案性质十分恶劣，情节十分残忍。其犯有滥用职权罪是肯定的。然而，目前太原市检察院仅仅以涉嫌滥用职权罪逮捕王某，却有着避重就轻之嫌。根据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指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违反法律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一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从目前公开报道的情况看，王某并非简单地因为滥用其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间接造成被害人死亡。作案人残酷毒打周秀云女士及其家属长达一个小时以上，显然属于蓄意严重伤害他人身体。在并非出于执行公务所必要的情况下（如警方受到罪犯攻击），蓄意严重伤害无辜公民的身体，根本不在任何一级国家公职人员的职权范围内。王某

的所作所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触犯了刑法第 234 条。刑法第 234 条规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得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除了王某以外，王某所在派出所所长及其他人员，在王某作案时坐视不管，案发后又恫吓受害人家属，阻挠其揭露事实真相，显然已经构成滥用职权罪，理应依法逮捕。

太原警察暴行案，并非孤立事件。4000 万建筑业农民工以及其它行业的许多农民工和城市工人，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已经成为全国性、普遍性、长期性的问题。这种问题，在目前的法律体制范围内，是完全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当务之急，中央必须痛下决心，首先根据中国目前的体制特点，严格要求省以下各级党政机关，将解决建筑业和其它行业工人按时领工资问题作为当前的一个首要大事，用突击式、运动式的方法，首先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从而解决相当一大部分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其次，再用一段时间，对现有的法律体制进行改良。根据中国的国情，有关劳动法规必须向劳方做出适当的倾斜，取证的责任要以资方为主、劳方为辅；对劳方取证的要求，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既可以采纳书面证据，也可以采纳根据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其它任何可以证明实际存在的劳务关系的证据，包括劳方可以提供的各种人证。

太原警察暴行案所暴露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全国大量的基层公安机关，完全无视依法治国的精神，针对普通人民群众经常地非法使用、大量使用暴力手段。警察滥施暴力的行为已经严重地恶化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客观上加重了社会不稳定。如不迅速、有效解决，将引起广大人民群众严重不满，有可能颠覆党和国家的根基。要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中央痛下决心，首先从整顿各级公安机关、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入手，随后再逐步从法律上加以规范。

太原警察暴行案，将如何发展，是得到合理解决并且以此为契机，将中国的政治和法律运行引导到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还是欲盖弥彰、民愤难平，从而使中国未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更加错综复杂，乃至引起更多更大的恶性案件？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 为山西 12·13 讨薪女工周秀云命案联署呼吁信

(红色中国网 2015 年 1 月 7 日)

题记：2014 年 12 月 13 日，山西太原发生的讨薪女工殒命警局的恶性事件，是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出现建筑业农民工讨薪事件以来最为恶劣的恶性事件。农民工因讨薪而自杀或他杀的事件已不算新鲜，但因讨薪而死于警方之手却在中国是第一次。这彰显出国家治理秩序在基层遭遇到巨大冲击，痛定思痛，我们特以公民身份进行公开联署呼吁，以此事件为借鉴、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重建国家治理秩序，呼吁国家在公检法领域进行反腐。

联署邮箱：[dagongdi@163.com](mailto:dagongdi@163.com)，请发送“真实姓名+职业”参与我们的联署。我们希望以 1213 名公民的联署，为我们能生存在一个更加安全、更有尊严的社会而呐喊行动。

该联署信向海内外所有中国公民以及关注中国工人和公民权利事业的各界人士开放签名。

我们为一位母亲请命，我们为一位妻子请命，

我们为一位姐妹请命，我们为每一个中国公民请命。



2014年12月13日，一位47岁的河南籍建筑业女工周秀云在山西太原讨薪未成，反为偏袒资方的警察蓄意伤害，导致身亡；其夫其子与工友也遭警察殴打拘留，近在咫尺而无法施救。春节即临，夫失爱妻，子失慈母，阴阳两隔，闻者莫不悲戚。逝者虽逝，其冤何得雪？生者固在，身心已创竭。

此案一出，举国震惊，民愤滔滔。案件发生后，山西省和太原市政府部分工作人员一再诿过饰非、拖延调查，并对当事人家属软硬兼施企图掩盖事实真相。后来经周秀云家人和工友不懈努力，再加之互联网和媒体的披露，才使问题得以曝光。

我们了解到，山西省太原市政府和公检法部门目前正在严肃调查此事，当事人的王文军等三名警察已因滥用职权罪被依法逮捕，其余涉案警察也在调查中。山西省太原市还为此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公安局长出面亲自道歉，并表示将对太原市公安局大力整顿，力度不可谓不大。

但另一方面，张海等 13 位法律界人士于近日发表联名公开信，指出恶警王文军等人打死周秀云女士的行为，属于故意伤害致死，其罪行大大超越了滥用职权的性质，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如不依法严惩，将产生严重错误的法律导向，甚至于助长个别执法和司法人员把“公民当成草民，把民命不当人命”的恶劣作风。我们希望，太原市公检法部门能够重视上述法律界人士的意见，对罪犯依法予以严惩，使受害人家属有所抚慰，使遇难的周秀云女士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这起事件，虽然是极为恶劣的个案，但这种现象并非山西太原一省一市之责，也并非极少数个别官吏操行不检所致。这恰恰反映了当前社会大量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以及党群关系、政群关系中一些严重不正常的状态。

正如沈原等 10 位社会学家近日以“依法治国，请保护建筑工的合法权利”为题的联名公开信中指出的，尽管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但是对我国经济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六千万建筑业农民工基本劳动权利得不到保障的问题，竟然长期得不到解决，以至于建筑业农民工被欠薪、讨薪难、没有社保、缺乏劳动安全保障、罹患职业病、遭遇工伤后得不到合理赔偿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普遍、长期存在。这不仅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几千万农民工及其广大家属的切身利益，乃至使其中一部分人生活无着，更严重影响了党和国家在普通人民群众中的声誉，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作为国家法律机器的公检法机关，本应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建筑法》等相关法律，帮助广大农民工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上述法律往往得不到有效执行。更严重的是，部分公检法人员与开发商、建筑商等资方人员官商勾结，偏袒资方，乃至公然威胁、恐吓、打骂争取正当权利的农民工，这在有些地方也已经成为常态。

根据“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于 2014 年底发布的《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超过三成的讨薪农民工遭受工地方涉警、涉黑打压。在山西太原 12·13 事件中，十几个维护国家治安的壮汉面对一个讨薪求助无门的弱女子，即使不闻不问已属丧尽天良，居然还能狠下心在朗朗乾坤之下痛下杀手，将一个弱女子殴打致死，还踩踏死者头发神态自若，这已经完全丧失做人的最低标准，彻底践踏了每一个人内心所尊崇和珍视的价值和情感，这种伤害已经形成且正慢慢发酵扩散，这种失控的公权力将使所有正面的价值毁坏与崩溃。

在一定意义上，周秀云女士是千千万万农民工的缩影，六千万建筑业农民工中，超过 80%的人每年都会遭遇到欠薪；他们之中，也有很多人为了讨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自杀或者他杀。更客观一点讲，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的自杀，实际上也是他杀，是被不能满足底层劳动者最低基本权利的那种社会力量所杀害了。

周秀云女士之死是一个悲剧。在中国现有的维稳体制下，本应属于全体人民的公检法权力，在某些地方，已经成了少数人的私产，甚至于与黑社会相勾结，俨然成为地方一霸，不仅不能维护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反而成了当地的公害。这种局面再不改变，中国就有国将不国的危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就有被颠覆的危险。

我们殷切期望，中央、山西省等各级党政领导，能够以周秀云女士被害为契机，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下大决心、花大力气，从依法治国的原则出发，按照群众路线的要求，做几件得民心、得党心的大事，把上述的几种深层次社会矛盾认真、彻底地加以解决。

为此，我们呼吁：

第一，公正审理周秀云女士被害一案，依法严惩杀人凶手以及其他参与殴打、恐吓周秀云女士及其家属的涉案人员。

第二，在公检法领域开展一场大整顿，全面深入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加大公检法领域的反腐力度，纯洁公检法系统，扫除一批损害人民利益与国家公权力形象的害群之马，恢复国家在基层的社会治理秩序。对于公安部门的执法权力，要依法予以约束，保证人民群众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不受侵犯。

第三，下大力气解决建筑业和其它各行业农民工被欠薪的问题。首先在所有的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建筑业企业，建立正规的用工制度，取消包工制，针对所有的职工、派遣工、农民工和其他劳务人员落实劳动合同，从制度上消除农民工被欠薪的根源。对于非国有的建筑业企业，相关的公检法和劳动管理部门要大力加强执法和监督的力度，同时鼓励这些企业的职工、派遣工、农民工和其他劳务人员组成工会，开展集体谈判，主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对于大量、一贯拖欠工人工资的地产资本与建筑公司，要予以严惩；对于国

有和国有控股的建筑业企业，可以将是否解决好农民工欠薪问题，作为其法人代表行政考核的一个主要指标。

我们相信，只要中央和各级党政部门能够依法办事，按照党的各项决议和政策办事，切实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一定能够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上述几个问题，化解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为长期坚持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

**联署签名邮箱：dagongdi@163.com**

请将您的“真实姓名+职业”发到上述邮箱进行公民联署。（联署持续中.....）

**联署发起个人：**

李民骐	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许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刘忱	中共中央党校教师
柴晓明	北京大学成人教育教师
亓昕	首都经贸大学教师
郝彩虹	大学教师
宋阳标	媒体人
李大君	社会工作师
高超	日本早稻田大学在读博士
余锋	公益机构工作人员
尚凯	公益机构工作员
曹曙	天津工人
张亚辉	影视工作者
庞浩然	学生
张海兵	公益机构工作人员
赵俊	公益机构工作人员

**联署发起机构：**

武汉在行动工人中心

2015年1月7日

(联署名单共 1849 人, 略)

## 致《为山西 12·13 讨薪女工周秀云命案联署呼吁信》发起人的信

（“一名基层人民警察”，2015 年 1 月 11 日）

原编注：国内同志来信：致红色中国网各位负责编辑，公开信的涟漪效应正在继续发挥作用，昨晚某同志收到一名警察来信，如下：

-----

某先生你好，我是一名基层人民警察，你们关于 12-13 山西讨薪女工命案警局的呼吁信，我看了，写的不错，但作为一名老刑警，我秉承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精神，不便签署联名，不是我担心个人得失，而是有些网上的东西很容易是偏颇之词，起码是片面的。再说，我们现在致力于建设法治社会，用舆论去压制审判，用网络媒体去影响审判，很容易得到的不是公正的审判结果！其实，我们知道的也就是那脚踩头发的照片，至于事实真相，我们知道的很少！法律是无情的，我们不能用看那照片的情感，去影响自己的判断！我们需要深究的是为什么一起讨薪事件会动用了警察？警察接谁的命令出警并如此处置？警察现在是弱势群体，除非彪子路的，没人去出风头，被投诉上访，没领导会站出来承担责任，一旦被投诉、被媒体曝光，被追究责任（行政刑事责任）的一般就是一线处置民警！

美国最近因为警察打死黑人引起的骚乱，换在中国，早把民警抓了，就是他们做的没错也抓了，中国要求基层民警是神仙，完美无缺的，尽管领导也做不到完美无缺！可美国是法治国家，警察执法正确，就是引起骚乱也不能冤枉警察！在中国能做的到吗？警察法规定，执行命令的结果由做出决定的上级负责！可实际中，却是下级当替罪羊！

随着年龄增长，我理解了毛主席当年砸烂公检法的作为，我们警察还是人民警察吗？还是为人民服务吗？企业主欠工人工资，群众聚集讨薪，企业主就找政府领导，政府领导就派警察维稳，出了问题就警察被黑锅！你也许会说，你们不会不去？我们警察的经费靠地方党委政府拨款，不听话就断了经费，总不能喝风吧？周永康在任上说要财政列支，他都抓起来了，我们也没实现，现在走的是政府拨一点，企业单位赞助一点，到处赖一点的路子！

资方把警察拉进去，无非三种方式：一是打 110；二是找政府；三是政府怕群体事件出事，操纵警察镇压，但在这个事情上可能性不大！现在政府

尤其党政一把手能量巨大，他们以讲政治为借口，滥用警力，警察也不想参与非警务活动，但党委领导是政治要求，财政拨款是经济手段，公安怎么拒绝？

我觉得警察应该代表广大群众利益，不能沦为政府尤其是官僚的工具。其实正是我们放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走上了特色，才导致了乱象！正是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取消了罢工罢课罢市，人民才失去了监督的权利！就连游行集会也名存实亡！以前的干部怕秋后算帐，现在谁怕？封建社会的官清朝的官也没现在的官权倾一时！

因为我没有完全占有资料，也不清楚警局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事实还没有弄清楚之前，我不能贸然表态，让你们失望了！

积小胜为大胜，积量变为质变，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

——“为山西 12·13 讨薪女工周秀云命案联署呼吁信”活动小结

远航一号（2015 年 1 月 18 日）

自 16 位中青年同志和武汉在行动工人中心于 1 月 7 日发起“为山西 12·13 讨薪女工周秀云命案联署呼吁信”以来，在短短一个星期内，已经有国内外各界人士 1800 多人参加联署。目前，各界群众仍然在积极参加联署活动。

在这次活动之初，国内青年同志大胆地提出，要用 1213 名公民的呐喊呼唤一个更加安全、更有尊严的社会。当时，根据过去的老经验，我和一些岁数较大的同志对于实现这个目标还不是很有信心。现在看来，干革命工作，不能单纯依靠过去的老经验，要敢于、善于发动群众，要敢于、善于打破一些条条框框，在斗争中学习斗争，这样才能避免原地踏步、在工作中不断地取得新的进步。

这次，参加联署的有广大的基层工人、农民、教师、职员、个体劳动者、退休人员、退伍军人和原公安民警，有大学教授、法律界工作人士、医生、作家、记者、职业经理人、工商界人士，有各地群众维权积极分子，有李成瑞、巩献田、张勤德、苏铁山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有跟随毛主席造走资派的反、长期坚持反修斗争的项观奇、恽仁祥、刘金华等老战士，有内地的著名进步知识分子如旷新年、郭松民、秋石客、袁庚华，有国际上享有声誉的学者如卢荻、严海蓉、李民骐，有长期致力于领导、组织基层工人维权斗争的劳工活动家如王江松、张治儒，有在历次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中声明鹊起的青年社会活动家如宋阳标，有重庆打黑英雄申勇同志，有在海外长期为中国社会的民主和进步而奔走的社会知名人士如王希哲、高寒、李淑娴，以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如生活晨报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张继军、黄万里研究基金主持人黄肖路、澳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郝志东、台湾鬼岛工寮集体博客等）。这次呼吁信的联署参加者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既有大量的基层群众，也有为数众多的社会贤达，有着广泛的代表性。

发生在山西省太原市的 12·13 警察打人致死案，性质十分恶劣，是各地警察长期普遍对群众滥用暴力以及中国现有的经济体制下不能保障劳动者最基本、最起码的生存权利等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因而引起了社会各界以及包括左、中、右各政治派别的强烈愤慨。我们注意到，在 16 位中青年同志发起联署呼吁信之前，沈原等 10 位社会学家已经向中央发出呼吁，要求政府方面以此事件为契机，贯彻《建筑法》和《劳动合同法》，力求在短时间

内解决好几千万建筑业农民工按时领取劳动报酬的问题。张海等 13 位法律界人士也就 12•13 案提出法律上的意见，主张对作案警察依法严惩。近日，受周秀云女士家属的委托，三位律师已经提出刑事诉讼状，控告 34 名公检人员，并且提出对于两名首犯，应按照故意杀人罪予以起诉。主流媒体对于该案也做了一定的报道，并且表示要对涉案人员依法惩办。

在这种形势下，即将开始的对该案的审判，有可能产生较为公正的结果，参与打人致死以及事后参与包庇、妨碍调查的警方人员，包括首犯、主犯和从犯，有可能得到一定的惩处，其中，首犯有可能被严惩。

即使此案最终在司法上得到较为公正的结果，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也仅仅是稍有慰藉而已。它不可能解决在全国各地仍然反复发生、层出不穷的警察暴力问题，也不能解决几千万建筑业农民工讨薪维权步步维艰的问题，更不能挽回周秀云女士的生命。目前，案件尚未起诉，审判过程还可能发生曲折，受害者沉冤无法昭雪、涉案罪犯不能尽数得到严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我们将对此案继续保持高度关注，对于有关方面包庇罪犯、蒙蔽受害者家属及公众的可能性保持高度警惕，直至该案得到较为合理、为受害者家属及广大社会公众所接受的结果为止。

即使该案得到较为合理的解决，也只是惩处了一小部分最直接的罪犯，使得周秀云女士在天之灵稍得安慰。尽管如此，这也将是目前正在全国各地发生的、有各阶级参与的、广泛的群众斗争中一个局部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是受害者家属以及像周秀云女士那样的许多普通劳动者直接斗争的结果，也是社会各界奋力呼吁的结果，当然也是统治集团权衡利弊以后决心做少量让步的结果。这种让步，固然部分地是为了“收获民心”，为了维持中国目前整个政治体制的表面稳定，但也是客观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反映。如果统治集团在这样的事情上不让步，而是一味地坚持最顽固、最野蛮的压迫政策，其合法性就可能完全丧失，其统治地位就可能遭受到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一部分的全面反对，其统治就决不可能长久。

经过这次斗争，虽然远远不可能解决目前遍及全国各地的警察暴力、农民工被欠薪的问题，但是在经过群众斗争的教训以后，各地警察在使用暴力镇压群众时可能会稍有收敛，这将为全国各地的各类群众斗争提供略为有利的条件。

目前，毫无疑问，资产阶级在中国仍然占统治地位。但是，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上升，资产阶级的力量在下降；无产阶级已经越来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而资产阶级的困难则在与日俱增。随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制造业等行业中，工人已经能够进

行较为有组织的斗争。在建筑业，由于其行业的和其它的特点，建筑业工人的斗争力量仍然比较薄弱。尽管如此，在未来几年，随着中国整个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的、进一步的变化，建筑业也可能发生比较有组织的工人斗争。

除了有组织的工人斗争以外，中国的无产阶级也要敢于和善于团结其他各劳动阶级以及一部分中间阶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开展普遍的、群众性的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围绕着 12•13 案的斗争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利用网络和媒体进行广泛的呼吁，可以起到团结和教育一批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中国资本主义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榨以后，目前其经济、社会、政治矛盾都在迅速地激化。这些矛盾，目前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那就是，为了保障中外资本家所需要的利润和资本积累，中国资本主义将不仅无法满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最低要求，而且也将无法满足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最低要求，并且资产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也将日益激化。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马列毛左派要敢于、善于投身到最普遍、最广泛的群众斗争中去，不仅积极参加和支持一切无产阶级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而且参加和支持其他劳动群众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并且参加和支持一切被压迫阶级争取民主和基本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斗争，参加和支持一切有利于提高资本积累成本、增加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困难的群众斗争。在普遍的和大量的群众斗争中，积小胜为大胜，积量变为质变，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为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对无产阶级根本有利的变化而斗争！

# 论钓鱼岛问题上的社会护国主义立场 白曼（2015年2月18日）

## 论钓鱼岛问题上的社会护国主义立场

白曼 著



图 钓鱼岛海景图

红色中国网在11月发表了署名“远航一号”的关于“钓鱼岛”立场的时评<sup>[1]</sup>，时评发表的大致背景是APEC会议期间两国资产阶级政府达成了谅解。“远航一号”先生在文章中痛斥政府卖国，并以社会护国主义的文宣要求所谓的左翼（马列毛立场上的左翼）不要怕犯民族主义错误。一方面我们庆幸这样的左翼机会主义情绪还只是实验室里的试验品，暂时没有在大规模群众运动里发酵。另外一方面却不得不就当前中国性质以及今天各种局部冲突中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有的立场进行阐述。

### 中国的国家性质

“远航一号”的文章里对中国政府定性为“买办资产阶级政府”政府，此处不能断言“远航”公民由此言论出发将中国定性成一个依附性的国家，但政治问题归根到底是个经济问题。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国际秩序依然是在金融资本的统治之下，考察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下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得不涉及对中国国家性质的分析。

这是来源于中国商务部2014年10月25日发布的我国1到10月对外投资数据：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2个国家和地区的447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4606.4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前9个月累计实现投资749.6亿美元，同比增长21.6%。

其中9月当月，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01.7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为97.9亿美元，同比增长90.5%。截至9月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8万亿元人民币（折合6184亿美元）。

“前三季度，我国内地对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等七个主要经济体的投资达559.2亿美元，占我国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4.6%。其中对中国香港的投资同比增长19.5%；对欧盟、俄罗斯和日本的投资分别增长218%、69.7%和150%；对东盟投资35.6亿美元，同比增长3.2%；对美国投资39.5亿美元，同比增长28.2%；对澳大利亚投资21.5亿美元，同比增长0.9%。”<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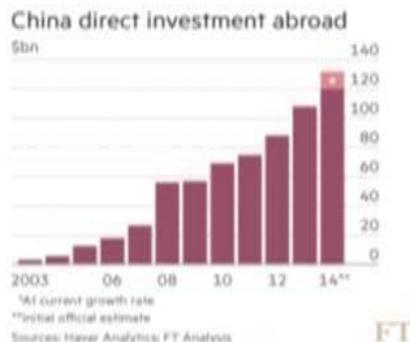


图 2003年-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

中国与美国、日本是世界上三大对外投资大国，2014年更是成为了直接投资的净资本出口国。如果说几年前中国的对外投资还是以实体经济为主，相比之下，企业融资、证券发行、承销、私人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等一类金融资本的输出与传统欧美列强相比相对逊色，但在2014年，新兴的中华强权主导成立了初始资本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储备银行以及初始资本5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系列组合拳让美日等老牌列强颇为恐慌。

德国、英国和俄罗斯先后与中国签署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逐步实现了国际化。中国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垄断组织越来越起决定性作用，比如中国的电信行业被三个寡头——电信、移动、联通，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占据了世界估值前十的互联网企业排行榜中四席，电力行业基本上是被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给控制的；而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国企改革、医疗、教育、住房（包括保障房建设），金融资本都如影随形。如果说资本主义复辟刚刚完成的年代，中国经济还呈现出很强烈的买办化色彩（招商引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那么，今天，经历了20多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靠着上亿产业工人和职员的心血打拼，中国资产阶级亟需要给自己积累的资本找到一个投资场所，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里，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列强。当然，正在崛起的中华强权目前还是个后进小弟。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上，欧美银行依然掌握着话语权，中国的金融资本在助力本国产业政策输出上还没有准入资格，国内产业资本要进行资本输出，更多依赖于境外金融资本，即使如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在美国上市，承销业务没有一家中国投资银行，让国际资本赚足好处<sup>[1]</sup>。中国制造业年产值2万亿美元，规模上全球第一，自主创新的技术供给率不高，核心技术和核心关键部件受制于人，产品可靠性低，产业链高端缺位。所以，中国又是一个世界体系里的赶超者，他还远不够孔武有力。那么，由此可见，今天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在一个后进帝国主义国家（二流帝国主义国家）里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这样的国家里即使存在阶级压迫以民族压迫形式表现出来的情况，这个公式也是针对中国境内的一些小民族的，任何鼓噪“日本人欺负我们中国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社会护国主义思潮都是破坏工人阶级自我意识觉醒的羁绊。

## 无产阶级与今日民族国家

上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和托洛茨基指出，在中国、印度支那以及其他殖民地国家驱逐帝国主义、建立起民族国家的任务具有进步性，在

这些国家里，反对殖民主义的爱国主义运动具有某种深刻的民主性，他们致力于克服以部族、种族、宗教或语言为基础形成的共同体所具有的狭隘的排他性，奠定了团结的基础，这类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托洛茨基更是认为只有工人阶级在贫苦农民支持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彻底实现反对帝国主义、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20世纪中叶，多个殖民地国家摆脱了政治上被帝国主义列强军事占领的处境，但在经济上依然处于依附地位。这些国家民族解放只完成了最低限度的部分（即政治主权上的独立）。那么，在这些国家里，如果工农需要彻底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就必须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在政治纲领上对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情绪就必须采取审慎但却又坚持原则的态度。

大的原则上，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自然应该同一切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情绪划清界限，但是不是应该对所有的爱国群众运动（这些群众运动的主要骨干是一些小业主和一部分城市职员）都采取敌视态度，应该采取具体的态度。在我看来，在那些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民族国家里（甚至包括印度，尽管一些毛主义者断言印度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工人的组织应该对爱国主义的情绪采取最坚决的反对立场，这里的很多爱国群众运动更多是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或种族主义情绪的排外运动；然而，在一些落后资本主义国家里当地的经济呈现出极强的买办性（如巴基斯坦依附于中国，菲律宾、伊拉克、阿富汗依附于美国、一些西非国家依附于法国），群众的反资本主义情绪是针对直接的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比如一些非洲居民对中国资本的态度），军事占领情况下，反资本主义斗争更是与反侵略战争结合起来（比如在阿富汗与伊拉克），但看到工农群众中的反帝爱国情绪是否意味着要有产政府的反帝措施承担政治责任。不，不能！我们以菲律宾共产党的纲领为例，他们指责中国是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这一论断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但由此出发号召工人去保卫“黄岩岛”则是彻底沦为了菲律宾资产阶级政府的应声虫。如果某一天却是发生了某个帝国主义列强入侵菲律宾的军事行动，菲律宾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参加到群

众反侵略的斗争中去，但即使在具体的行动里，也应该以毫不信任与不拿原则作交换的态度同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技术上而非政治上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这些名义上独立的国家不是依附于这个列强就是依附于那个列强，就像旧中国的蒋记政权一样，落后资本主义国家腐朽的统治者无力真地去跟列强叫板，但他们肯定乐意煽动无产阶级的爱国情绪，以他们为筹码争取这个列强的支持来威吓住另一个列强。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国际工人运动的低潮时期，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走，帝国主义大战不是那么容易爆发，但领土纠纷与局部冲突蔓延不断，革命的工人群众在当前更现实的口号应该是“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绝不让无产者当资产阶级的炮灰，要求将各种军备竞赛的费用作为改善工人生活的基金”。而无产阶级自我组织越深入，就越需要对“远航一号”公民鼓吹的左翼爱国主义情绪采取零容忍态度。统治阶级厉兵秣马，但不会轻易动武，而我们的社会主义者们，比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府还着急。

## 中日不会轻易开战

2014年，日本军费开支预算2848亿元人民币，较之于2013年提高2.8%；中国军费开支预算8082亿元人民币，较2013年增长12.2%。乍看起来，双方似乎剑拔弩张。但作为世界第二、三大经济实体，中日之间的联系又很紧密，2014年，日本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均难以期待，日元大幅贬值，日本政府陷入债务危机（负债率高达243%），这边厢，中国这边经济发展进入滞胀期，大量资本流出，日本政府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物价上涨，中国政府的降息则进一步引起大规模的金融投机，而在工业区，倒闭关厂风波此起彼伏。

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疯狂积累的时代，一方面是黄袍加身的统治阶级赚得满钵，另一方面是底层群众生活愈加艰辛。中日资产阶级并不想真正为钓鱼岛问题大打出手（虽然一直有分析认为东海大陆架上的石油资源的分配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争夺），但为了各自国内政权的合法性，又不得不声明

对领土的主张，鼓动国族情绪。2014年，日本对华投资40.8亿美元，同比下降39.7%。十多年来，日本的本国优质企业倾向于在海外进行生产（利润率较高），这个过程带来了产业资本外流和国内产业空心化，贸易逆差居高不下，而由于受到钓鱼岛冲突的影响，对华贸易这一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受到极大影响。日本央行推出量化宽松政策，试图提升日本金融机构及企业的放贷和投资能力。然而，日本央行的浮动汇率制度带来的却首先是日元的贬值，更多的中国职员阶层去日本旅游或从网上购买日本产品，并不能立即从大方向上改变目前日本经济出口的颓势，因为日本的很多高利润率的产品（如汽车）产线也是开在中国的，而紧张的外交关系显然影响到大和权贵的钱袋子了。

日本资产阶级需要实实在在的利益，面临经济复苏的实际任务，日本资产阶级开始尝试同中国靠近，试图修补关系。11月6日，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了会晤，7日上午双方进行协商，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统治者认为“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之后，来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尽管，中日资产阶级政府之间依然存在着不信任，但相比于几年前的“冷战”局势，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日本政府无力像从前的军国主义时期那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它的防御无法离开美国的军事庇护，所以日本不可能单独绕过美国同中国开战；而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能力和巨大的常备军兵员，最近几年海陆空军的装备水平也大幅提升，但军队腐败现象严重，各种社会问题（边疆的民族矛盾、工业区的阶级矛盾、农村的土地流转争议、环境与食品安全）交织在一起，一旦开战，战争将成为这类社会矛盾的引线，直接引爆火药桶，因而统治阶级从本位利益出发乐于操纵群众的爱国情绪，但并不会真正地去东海上施展武力。

## 革命社会主义的态度

“远航一号”说：“就钓鱼岛问题本身来说，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中国近现代民族解放革命未彻底胜利的产物（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影响没有消除，台湾问题没有解决，日本军国主义没有根绝）。无论从阶级的立场，还是从民族的立场，都必须坚持对钓鱼岛问题的完全彻底解决，也就是彻底地、巩固地、永久性地确立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sup>[6]</sup>。一句话可见这位所谓的左派立场上是堕落到什么地步。第一，断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未彻底胜利也只是因为社会主义无法在孤立的民族国家内建成，中国民族解放革命“部分”胜利的产物——工人中国已经覆灭，被一个资本主义的新生强权所取代，未彻底胜利只是工人阶级又回到了被奴役的地步，绝非什么台湾没有被统一、钓鱼岛主权被搁置；第二，毫无疑问，“远航一号”声明的主权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权，从民族的立场保卫钓鱼岛已经意味着放弃了阶级立场，这是彻底的投降。

“远航一号”继续毫不脸红地说道：“就目前政治工作来说，当然一方面要利用资产阶级当局立民族主义牌坊的企图，坚决宣传中国对于钓鱼岛拥有毫无争议的主权，使‘钓鱼岛是中国’的思想深入人心。但是更主要的，是积极揭露当局一切表面‘强硬外交’、实际妥协投降的阴谋，以此来达到教育青年、教育群众的目的，并推动广大爱国青年思想的觉悟”<sup>[7]</sup>。这个论断充满了官僚套话，“教育青年”“教育群众”，但却是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口号来散布有毒有害的言论，这样的社会护国主义鼓动是最坏的宣传材料，它试图让群众永远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俘虏，让群众的阶级觉悟永远停留在一个无法威胁阶级统治的水平上。

“对于来自广大爱国青年的自发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捍卫钓鱼岛主权的行动，一般予以坚决的支持，并且在支持过程中打破青年对当局‘强国’的幻想，并启发其进一步的觉悟。对于在青年爱国运动中出现的盲目反日排日（指针对一般日本群众而不是日本资本家）、民族沙文主义、种族主义的言行，在政治上有利时（即易于被群众理解时），积极

予以劝阻；在政治上不利时，与之保持距离，等待群众觉悟”<sup>[8]</sup>。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观点，如果小资产阶级跟着法西斯主义思想走，我们不是与之作坚决的斗争，而是“与之保持距离”。至于所谓的“青年爱国运动”，不同的阶级因为不同的利益诉求会发生分化，小资产阶级（小业主们）甚至一部分职员固然有盲目的排外情绪，这类民族主义的盲动并没有明确的主张，因而容易被一些投机政客利用（如法西斯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吹鼓手），然而，是否说一切排日行动都是盲目的呢？不是的，在这些年的中国工业区的日资企业里，一些日企工人以国族口号作为掩护，提出了具体改善待遇、同工同酬、废除苛刻管理制度的诉求，这类的工人斗争尽管以爱国口号“我是中国人”出发，但斗争的落脚点却是实实在在的阶级利益之争，革命社会主义者应该靠拢这一部分受爱国思想影响的群众，耐心地倾听他们的主张，帮助他们在具体反对日本企业主的斗争中进行联合。而“远航一号”从机会主义的政治观点出发，他只能得出不得罪受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和种族主义思想影响的爱国群众一类庸俗的政治实用主义结论。

最后，“远航一号”说：“只要以钓鱼岛为契机，砸烂东亚资本主义的摊子，就是胜利。离开了中国资本主义，日本资本主义必垮”<sup>[9]</sup>。又一个空洞的口号，中日无产群众的自我组织远未到可以“砸烂东亚资本主义的摊子”的时候，离走出迷雾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对于革命社会主义者来说，如果我们自认为以服务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态度来认清一系列严肃的问题，固然不应该停留于口号式的批判，你高喊社会护国主义口号叫嚷“砸烂东亚资本主义”，我高唱革命的失败主义口号维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当然，目前中国资产阶级面临的对手——中国无产阶级刚刚开始走出这么些年以来一盘散沙的情况，当工人运动还在起步阶段，类似的社会护国主义情绪毕竟影响有限，因而在全局范围上来说，他也是实验室里的产物，还未在硬碰硬的阶级斗争里发酵。同时，能多少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反对左翼爱国主义情绪的少数革命社会主义者，也多数是灰色的小市民，没有在严肃的阶级冲突中经过考验，还并不是合格的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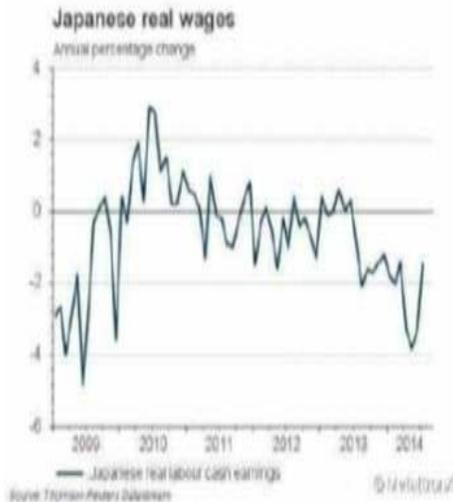


图 2009-2014 年日本人民实际工资波动曲线

2014 年岁末，二十多年来开足马力的中国资本主义进入一个增长放缓的时期，而几年来一直经济陷入停滞的日本更是出现劳动人口减少、失业上升的“美景”，人均工资仅增长 0.8%，通胀却高达 3.4%，实际工资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日政府先后采取一系列增加 M2 广义货币量、增加消费税等对资本家更有利、对劳动人民更不利的政策。统治阶级是不会较真一块岛的得失的，但在经济危机面前，却下定决心要底层群众更多承担苦难。路还很漫长……

注释：

[1] 远航一号，《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怕犯民族主义的错误》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306>

4

[2] 《2014 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情况》，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410/20141000764992.shtml>

[3] 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IPO 募股由以下一些国际投行承接：瑞士信贷集团 (Credit Suisse Group AG)、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AG)、高盛集团 (Goldman Sachs Group Inc.)、摩根大通公司 (JP Morgan Chase & Co.) 和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4] 同注[1]。

[5] 同注[1]。

[6] 同注[1]。

[7] 同注[1]

## 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 远航一号（2015年2月25日）

《惊雷》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白曼同志撰写的“论钓鱼岛问题上的社会护国主义立场”，对去年11月远航一号撰写的红色中国时评“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怕犯民族主义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与白曼同志是有分歧的。但是正如白曼同志所说，钓鱼岛问题目前在中国的阶级斗争中并不占据紧要迫切的位置，用白曼同志的话说，“我们庆幸这样的左翼机会主义情绪还只是实验室里的试验品，暂时没有在大规模群众运动里发酵。”既然白曼同志也认定笔者所代表的“社会护国主义”尚未“发酵”，机会主义和护国主义的帽子，我也可以再戴些时日，等到适当与必要的时候，再把这两顶帽子还给白曼同志。

在这篇时评中，我主要想借与白曼同志探讨的机会，就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是否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当前中国阶级斗争的态势等问题，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 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

在“中国的国家性质”一节中，白曼同志列举了一些统计资料，主要是200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扩张的情况，并借此来说明中国已经成为“二流帝国主义”国家。确实，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投资有了大幅度增长。2014年的数据还不完整。截至2013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投资金额达到6604.8亿美元。除了对外直接投资以外，中国政府所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实际上也是对外投资的一种形式。截至2013年底，中国持有外汇储备38213.2亿美元。两者相加，截至2013年底，中国累计的对外投资总额达到了44818亿美元。除此以外，还有私人部门的对外借贷和对外证券投资。但这方面没有数据，数量估计也不大。

另一方面，1979-2013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6001.6亿美元，其中累计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13936.9亿美元。此外，截至2013年底，中国外债余额8631.7亿美元。累计实际利用外资与外债余额两者相加，截至2013年底，外国累计的对华投资总额达到24633.3亿美元。如果单从直接投资来看，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大约相当于外国累计在华直接投资的一半。但是，如果用中国的海外总资产与外国的在华总资产相比较，中国的海外总资产超过外国的在华总资产20184.7亿美元。表面上，中国拥有巨大的国际净资产。

然而，中国所拥有的巨大的国际净资产却没有给中国资本家带来多少投资收益。根据中国的2013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国从所有海外资产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包括利息和红利）为1677.2亿美元；同年，中国向外国投资者支付的投资收益为2276.3亿美元。在投资收益这一项上，中国的逆差为599.1亿美元。中国4.5万亿美元海外资产的平均回报率为3.7%，而外国近2.5万亿美元在华资产的平均回报率却高达9.2%。与中国近乎赔本赚吆喝的海外投资相比，西方跨国资本在中国投资所获得的是丰厚的超额利润。

在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虽然跨国资本流动规模巨大，但是传统的进出口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也就是外围国家以较多的社会劳动时间来交换核心国家较少的社会劳动

时间)仍然是世界剩余价值转移的主要形式。据笔者测算,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中平均要用两单位的本国社会劳动时间来交换一单位的国际社会劳动时间,每年因此而损失的社会劳动时间高达6000万人年,大约相当于中国劳动力总数的8%。相比之下,美国在进出口贸易中平均只需要用一单位的本国社会劳动时间就可以交换到五单位的国际社会劳动时间,美国因此每年可以无偿占有5000万人年的国际社会劳动时间,无偿占有的劳动量相当于美国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

正如白曼同志所说,中国的制造业虽然规模巨大,但是“自主创新的技术供给率不高,核心技术和核心关键部件受制于人,产品可靠性低,产业链高端缺位”;“国内产业资本要进行资本输出,更多依赖于镜外资本...让国际资本赚足好处。”白曼同志据此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后进帝国主义国家”。与其说,中国是一个所谓的“后进帝国主义国家”,倒不如说,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向半外围地位靠拢的外围资本主义大国。考虑到中国的国家规模和政治军事实力,将中国作为一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来分析,也未尝不可。而在经济方面,中国仍然具备着外围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通过不平等交换对外输出大量剩余价值)。

## 帝国主义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不可以说中国是“二流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是“后进帝国主义国家”?在白曼同志看来,中国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强权”,仅仅是暂时不够“孔武有力”,中国已经具备了一些帝国主义的典型特征,如垄断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资本输出等。像白曼同志这样的观点,不仅在托派青年同志中有,在毛派青年同志中也大量存在。

从表面上看,今日中国资本主义似乎与列宁所列举的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的几大主要特征有很多相似或一致的方面。但是,众所周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学院里的博士论文,而是为了分析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把握当时世界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并用来指导当时的世界革命实践特别是俄国的革命实践。后来,世界历史和世界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表明,列宁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二十世纪初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所有重大发展,照搬俄国革命的具体经验、具体做法也没有带来新的革命胜利。

将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列宁所论述的二十世纪初期的帝国主义做机械的比较,而不是根据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历史状况、变化了的阶级斗争条件,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就势必丢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陷入教条主义的死胡同。

众所周知,列宁认为,在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必然展开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战争将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首先胜利。

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两次世界大战的实质,都是在英帝国主义全面衰落的条件下,德国与美国争夺资本主义世界霸权的战争。美国依靠自己的工业优势和地理优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主要大国中)都是最后参战,两次大发战争财,最终确立了世界资本主义的霸主地位。

今天的世界形势是,美帝国主义正处于加速衰落的过程中,但是仍然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美帝国主义的衰落主要表现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恶化、全球环境危机的恶化以及对于世界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中东、东欧等地区政治秩序的全面崩溃。美帝国主义虽然武装

到牙齿，但是却完全没有力量保障世界资本正常积累所必需的政治、经济和环境方面的条件。

另一方面，其它各大国（中国、印度、俄罗斯、欧盟）没有任何一个有力量代替美帝来充当世界资本主义的霸主，并承担其维持整个体系运转的责任。因此，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目前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这就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并且无法克服。

在各大国中，俄罗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主要的能源出口国和武器装备出口国。能源和军事工业是俄罗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了维护这些根本利益，俄罗斯资产阶级必须保有它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中东地区若干国家的势力范围。这就与美帝试图控制这些地区以图减缓其霸权衰落的图谋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甚至有可能发展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与俄罗斯不同，中国资本主义的核心部门是出口制造业。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很庞大，房地产业、金融业等非生产性部门也占相当的比例，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也很大。但是这些部门或者是为出口制造业服务，或者是依附于出口制造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制造业衰落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其它部门很快就会衰落。

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不仅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市场，而且还依赖在国外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这些能源和原材料虽然不来自美国，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客观上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海空力量来保障中东、非洲等地的政治稳定以及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安全。中国资本主义出口制造业对于美帝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依赖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甘愿在

“G2”体制下充当所谓“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

当然，在中国资本家争夺非洲等地原材料的过程中，会与具体的欧美资本家发生冲突。但是，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中国所获取的海外原材料，是维持中国资本主义制造业所必需的，而中国资本主义制造业又是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中心；通过对中国广大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中国资本主义向美、欧、日等核心国家输出巨大数量的剩余价值，保证了后者的超额利润，进而保证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常运转。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即使是在中国和美帝的仆从国（如日本）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

白曼同志说，“中日轻易不会开战”。我的看法是，只要中、美、日三家的资产阶级政权保持稳定，在三者之间就不会爆发战争。

如果我们同意上述的分析，那么，对于那些主张今日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同志来说，就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无论你们在今日的中国资本主义和二十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可以找到多少个表面的相似点甚至“相同点”，对于今日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与革命，又能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

或许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白曼同志才感慨，“路还很漫长”，“离走出迷雾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中日无产群众的自我组织远未到可以‘砸烂东亚资本主义的摊子’的时候”。关于日本无产阶级，我与白曼同志一样，认为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于中国无产阶级，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固然是万里长征，但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和每一步都不是不可逾越的，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

中，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将走出前人和外国人没有走过的路，并取得前人和外国人没有取得过的伟大胜利。

## 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中国资本主义的核心部门是出口制造业。中国资本主义出口制造业在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依靠的是对广大中国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依靠的是对中国环境和资源的疯狂掠夺，依靠的是美国的消费市场以及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庇护。伴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中国环境危机的加深以及生态环境系统的全面崩溃，伴随着美帝国主义的衰落以及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加深，中国资本主义赖以繁荣的各个条件都正在走向反面，并且正在转变为即将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瓦解和崩溃的因素。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经预言，现代无产阶级必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马克思的这个伟大预言，今天正在中国实现着。由于中国革命彻底铲除了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这就使得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在最“自由”的条件下充分发展，这就造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工业无产阶级。

今天，资产阶级毫无疑问仍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在各个工厂、矿山、商店、办公楼，各地的无产者仍然受到骇人听闻的剥削和凌辱，甚至失去无辜的生命。看不到这样的形势，不承认敌强我弱的基本现实，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仅仅看到了矛盾，却没有看到矛盾的发展变化，仅仅看到了静态的阶级斗争，却忽视了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就更加错误、更加危险。

如果说，在2007年以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进攻面前几乎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2007年特别是2010年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势头。虽然，资产阶级仍然占优势、无产阶级仍然占劣势，但是资产阶级的优势在逐年缩小，无产阶级的劣势正在转化为优势。

关于这个问题，在资产阶级官方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笔者做了计算。笔者的计算确认了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在2007年以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在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中是最高的，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两倍。2007年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急剧下降，即将下跌到比美国更低的水平。

（见远航一号撰写的红色中国时评“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正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4332&page=1>）

笔者预计，在未来几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还将继续下降，并且完全有可能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大约五年内）下降到足以导致中国资本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爆发重大危机的水平。

在历史上，面对这样的重大危机，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扩大世界资本主义有效积累的地理范围，并且通过加深和扩大对世界资本主义外围地区的剥削，来增加集中在世界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超额剩余价值，并且用这样的超额剩余价值来收买工人贵族乃至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从而确保核心地区的政治稳定。二是将利润率严重下跌、无法恢复的行业转移到尚有广大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的地区。

对于中国资本主义来说，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所谓高速增长，在经济上并没有根本改变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地位，因而也就不能扭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中国的资产阶级更不掌握足够数量的剩余价值来收买大量的工人贵族，同时还要保障中国资本主义必需的积累速度。

另一方面，在中国以外，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很难找到一大块与中国人口和面积相当，拥有充沛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并且还具备资本积累其它必要条件（政治上、基础设施上）的广大地区。除此以外，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还面临着一个以往历史时代都不曾面临的危机，那就是世界范围的资源和环境危机。

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将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向已经壮大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发动一次新的、全面的阶级战争。这次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吞噬早已经吞噬殆尽的社会主义遗产，而是企图夺回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工人阶级通过经济斗争已经取得的一些利益。面对已经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这可能吗？毕竟，在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时期，中国的工人阶级能够逐步地取得一些利益，并迫使资本家的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中外资本家的仁慈和施舍，而是因为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在客观上发生了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

而在中国无产阶级方面，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普遍开展着经济斗争，而不是政治斗争，更不是革命斗争。在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时期，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当中国资本主义积累陷入了根本不可克服的危机的时候，当无产阶级的最低要求已经开始超过资本积累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斗争原则就必须发生根本的、重大的变化。到那时，如果中国的无产阶级不愿意放弃过去几年来斗争中所取得的一点有限的利益，如果不愿意放下武器向资产阶级投降，如果还要维持哪怕是奴隶般生活的最低条件，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将也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将本阶级的已经壮大起来的经济斗争力量，进一步转变为政治斗争的力量和革命斗争的力量。

概括来说，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的正常运转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基本条件，而且是资产阶级国家存在的基本条件。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已经造成了一个数量庞大并且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在未来还将更加强大。中国的无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将有能力、有意志提出符合她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最低要求。这些最低要求，必将超过中国资本主义积累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中国资本主义积累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受到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限制，也受到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地位的限制。由于这样的限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将不可能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按照对中国资产阶级有利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危机就必须按照中国无产阶级的意志、在对中国无产阶级有利的条件下来解决。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 为中国马列毛左派的政治成熟而斗争

远航一号（2015年3月3日）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在残酷剥削亿万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然而，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无产阶级的壮大，并且必然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壮大准备物质的以及社会历史的条件。

到2008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初步表现出了组织起来的愿望并且展开了较大规模的斗争。2010年以来，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继续增长，经济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取得局部胜利的次数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克服不了其内在的矛盾，开始逐步陷于困境。虽然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仍然占统治地位，中国已经初步出现了无产阶级进攻、资产阶级退却的局面，集中表现在中国工人工资的快速增长和资本家利润率的普遍下降。

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组织必然要发展为政治斗争和组织。与此同时，由老工人、新工人、革命老干部、文革造反派、进步知识分子等共同组成的马列毛左派也在发展壮大。在这种形势下，很多马列毛左派同志很自然地产生了组织起来的愿望。

马列毛左派首先要做马列主义者，要做历史唯物主义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一定的政治派别、一定的政治组织形式，只能是现实存在的某一阶级利益的反映。只有那些从现实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并在现实阶级斗争中经受住考验，最充分地体现了某一社会主要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政党或其它政治组织形式，才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及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站住脚，并在历史发展中发挥一定作用。

在近现代中外历史上，有大量的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以及打着马列毛、马列托旗号的“左派”宗派团体，由于不符合上述的条件，很快就沦为过眼烟云，被同志、朋友和敌人所遗忘。

近日，一部分马列毛主义积极分子在洛阳开会，并以“中国毛派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为题发表了会议纪要。这次会议，红色中国网没有派代表参加，事先也不了解。据初步了解，这次活动，乌有之乡、大地微微网、东方红网、毛泽东思想旗帜网、中国红旗网等也没有派代表参加。

在2008年以前，除了老工人反私有化的斗争以外，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规模、力量都还不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老干部、文革造反派、一部分老工人以及一部分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构成了当时马列毛左派的主要社会基础。

2012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薄熙来事件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上层领导集团不仅早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而且顽固坚持反动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路线，从而消除了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有限的经济、社会改良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左派进步知识分子的合法活动空间大大缩小，左派群众的思想发生了一定的混乱，传统左派团体难以提出新的、在近期有效动员左派群众的政治目标，又与新兴的工业无产阶级斗争缺乏联系，乌有之乡、大地微微、红色中国等传统左派团体的发展普遍受到限制。

与传统左派团体踟蹰不前形成对照的，是各种青年马列主义团体和其他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有一定规模的、有全国影响的，已经有好几家。这些青年马列主义团体，有思想、有干部、有活力，特别是在与现实工人斗争相结合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他们，是今日中国马列毛左派的主要先锋力量。

很难想象，一个有生命力的马列毛政治团体，可以没有大量的青年马列主义者参加，可以没有大量的新工人先进分子参加。

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必须紧紧依靠自己的阶级，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现实斗争中产生，并且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经受现实的阶级斗争的考验，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团体产生的第一个条件。

一个有生命力的无产阶级政治团体，要产生并且存在，第二个条件就是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高度统一和相对成熟。也就是说，要有一整套符合当前中国实际情况的，能够正确地认识当前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并且据此提出正确的革命策略的马列毛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及其正确性，不是某些人自封的，而是要以中国目前实际发生的阶级斗争作为经验基础，总结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指导无产阶级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

随着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也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开花结果、成熟繁衍。但是，就目前来说，我们知道，中国客观上存在着大量自称马列毛的团体以及其他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主要来自于小资产阶级（就职业来说，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对于目前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革命策略，仍然存在着许多基本的乃至原则性的分歧。这些分歧，是中国目前阶级斗争形势的客观反映，是中国马列毛积极分子认识水平的客观反映，只能在未来的斗争中，随着中国马列毛积极分子认识水平的普遍提高而逐步消除。企图脱离阶级斗争的现实，将某一种自认为“正确”的理论或主张强加于人，是行不通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顾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撇开马列毛左派的绝大多数，自己拉一帮人，关起门来开会，然后发声明、发宣言，硬要别人“团结”在自己周围，是不可能真正团结、真正联合的。

产生于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并且在现实斗争中发展壮大，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团体的阶级条件或者说政治条件。

有比较成熟的马列毛主义理论，或者简单地说，能够真正回答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胜利、怎样能够胜利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团体的思想条件或者说理论条件。

在内部能够实行并贯彻民主集中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团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第三个条件，也是组织条件。在无产阶级政治团体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在没有形成决定的时候，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产生决定或者选举和任命领导人；在已经形成决定以后，组织成员要无条件服从（所谓无条件服从，就是即使个人认为是错误的组织决定，也要执行，个人只能保留意见），“党的决议就是党内的法律”，要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以最大的革命首创精神来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这些，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

在组织的决定实行一个时期以后，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要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既要勇于坚持原则，又要善于团结同志，既要敢于顶住压力、坚持正确的思想和做法，又要谦虚谨慎，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是巩固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方法。

目前，除了少数青年马列毛团体正在努力实践民主集中制外，大多数马列毛左派团体还远远不具备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条件。在实践中，有的实际上属于少数一两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有的属于自由主义泛滥的无政府状态。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内部，目前实际上是实行民主协商一致的制度，也做不到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之所以难做到，客观上，是因为目前马列毛左派的队伍还很不纯洁，很少无产阶级成分，而主要由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组成（这里的流氓无产阶级没有贬义，指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长期脱离物质生产活动的社会成分），因而很自然地带有这些阶级自由散漫、组织性纪律性差的特点。主观上，是因为目前绝大部分马列毛积极分子还不能做到将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高目标，压倒个人的一切（这里，个人的一切，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既包括荣誉、名声，也包括面子、虚荣心等）。由于这些主客观原因，就造成了许多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能分清主次、不能正确地地区分轻重缓急，在遇到分歧的时候，又不能正确地地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以至于为了个人的小利或者由于个人认识的偏差而影响了集体的和阶级的利益。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一个或者多个新型的、有正确理论指导的、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马列毛政治团体一定会出现在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当中。

让我们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及马列毛左派在政治上的成熟而奋勇斗争！

## 站在生态悬崖边缘的中国，怎么办？ ——兼谈市场发展道路的困境

李民骐  
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2015年1月  
(红色中国网2015年3月7日转载)

自2013年以来，在我国东部和中部省份，多次爆发席卷广大人口和地区的雾霾事件。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长期环境恶化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直接威胁到大量人口的基本健康和生命安全。除了环境污染问题以外，我国还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匮乏、大面积土壤退化、多种动植物资源濒临灭绝、对多种能源和粮食的进口依赖逐年增加等严重的资源短缺问题。除此以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已经成为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国家之一。如果现有的全球变暖趋势不改变，将最终导致全球范围的气候灾难，乃至威胁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存续。

对于中国目前生态环境危机的严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士有了切肤之痛。但是在主流论述中，仍然幻想在坚持现行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发展道路、不改变对无限经济增长追求的前提下，就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地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的目标；或者，即使暂时不能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目标，生态环境危机也仅仅是与“中国崛起”的伟大目标相比相对较小的代价，至多也只是需要将经济增长速度稍微放慢一点，在局部领域多增加一点环境保护“投资”，就可以将生态环境的恶化控制在可忍受的范围内。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不仅将严重制约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直接危害绝大多数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健康，并且有可能在经过长期持续恶化以后，完全毁坏中华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乃至使得中国的广大地区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从这个角度来说，维护生态可持续性，是中国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绝对要求，只有符合这一根本要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在长期生存和发展下去，而任何不符合这一要求的发展模式或迟或早是要垮台的。

本文主要从一般原理的角度探讨经济增长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同时论述二者与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并据此来阐述目前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发展道路的根本困境，最后力求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来说明未来社会、经济、生态变革的可能性。

### 生态可持续性是一切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

一切人类社会要繁衍发展，都离不开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所有人都必须首先要解决吃、穿、住、行的问题，然后才能从事其它社会和经济活动，从事科学、文化、艺术、宗教活动，从直接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从事社会管理，“创造历史”，从事剥削和压迫，或者进行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

所谓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就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反复的、多种多样的、规模不断扩大的物质交换过程。在这种物质交换过程中，人类社会在反复的社会劳动的实践中不断地增进对自然界的认识（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朴素经验以及在对这种朴素经验总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发展了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各式各样的手段和

工具（也就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力），并在这种物质交换过程中形成了与不同地理环境以及历史阶段相适应的各种社会关系（人类的生产关系和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

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过程中，人类要从自然界获取各种物质资源。其中有的资源，如各种矿物资源，在经过人类的使用和消费以后，在对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有意义的时间范围内（比如几年或几十年内）不能够再通过自然界本身的物质循环转化为对人类有用的物质形式，因而从人类物质生产和消费的角度来讲，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另外一些资源，比如土壤、淡水、森林、鱼类和其它各种动植物资源，如果其使用和消费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那么经过自然界本身的物质循环，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再生产，并反复用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由于这个特点，这些资源也称之为可再生资源。

通过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人类得以生产各式各样的物质产品，用于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在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除了产生各种对人类来说有用的物质产品以外，还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固态、液态、气态等各式各样的副产品。这些人类活动产生的物质副产品，又排放到周围的生态环境中去，就成为污染。人类活动产生的各种污染物，如果限制在一定数量范围内，不影响到各种生态环境的基本运行，那么自然界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这些污染物稀释或转化为对人类无害的其它物质形式。

可见，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如果要在可持续的基础上长期、反复进行下去，人类所使用的各种可再生资源应该限制在生态环境通过自身循环可以反复再生产的界限内，人类所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应该限制在生态环境通过自身循环可以充分稀释及转化的界限内。至于不可再生资源，自然界不能够通过自身的物质循环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再生产，人类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将不可避免地减少可供后代使用的资源量，乃至导致资源枯竭。因此，人类应该尽量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并力争用可再生资源完全代替不可再生资源。这几项原则，是维持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基本要求。

## 现代生态环境危机的基本原因

自人类开始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以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和发展为标志），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就始终处于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关系。一方面，生态环境为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物质交换的盲目扩大又往往会导致与生态环境的尖锐冲突，乃至爆发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导致文明的覆灭。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由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力水平总体上不够发达，也由于各个文明受到地理区域的限制，生态环境危机都限制在局部的地理区域范围内，尚不构成对人类整体文明的威胁。然而，到了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后，由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水平呈几何级数增长，在短短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就不同的物质产品来说，分别增加了几十倍到几百倍，在全球范围内极大地增加了物质资源的消耗以及污染物的排放。于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面临着全球生态系统崩溃的危险。

目前，“生态脚印”是一个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人类环境影响的指标。所谓“生态脚印”，指的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所消耗的各种可再生资源以及为了吸收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所需要的生产性土地和水域面积。根据 2014 年版的《生命行星报告》（见 [http://wwf.panda.org/about\\_our\\_earth/all\\_publications/living\\_planet\\_report/](http://wwf.panda.org/about_our_earth/all_publications/living_planet_report/)），1970 年以前，人类的生态脚印仍然小于地球的生态能力（各种生产性土地和水域面积的总和）。自 1970 年以后，人类的生态脚印就超出了地球的生态能力，也就是说地球的生态环境已经处于透支状态。到了 2010 年，世界人均生态脚印上升到了 2.6 公顷，相比之下，世界人

均生态能力仅为 1.7 公顷。简单地说，世界目前实际上需要一个半地球的资源 and 吸收污染能力来维持人类的物质消费水平。这种情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势必造成整个全球生态系统的崩溃。

就中国来说，中国的人均生态脚印在 2010 年达到了 2.2 公顷，仍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然而，中国的人均生态能力仅有 1.0 公顷。也就是说，要满足中国现有的物质消费水平，如果仅凭中国自身的资源，那么将需要相当于两个以上中国的资源和吸收污染能力。所以，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严重透支，属于世界生态环境危机的重灾区。

下面的公式说明了人类环境影响与经济活动水平之间的关系：

人类环境影响 = 经济总产值 \* 每单位经济产值产生的环境影响

其中，每单位经济产值产生的环境影响也可以叫做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如果用增长率的形式来表示这个公式，就是：

环境影响增长率 = 经济增长率 + 环境影响强度的增长率

如上所述，人类要实现与生态环境之间可持续的关系，人类对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以及人类所排放的污染必须限制在生态环境所允许的范围内，而人类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应该尽量减少。也就是说，人类产生的环境影响必须或者持平、或者趋于下降，因而环境影响增长率应当是负值，才符合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要求。

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家和为资本家服务的国家往往要追求资本积累的无限扩大（本文在后面还将进一步论述），因而经济增长率通常是正值。这样，只有降低环境影响强度，也就是使环境影响强度的增长率为负值，并且环境影响强度的下降率必须超过经济增长率，环境影响的增长率才可能为负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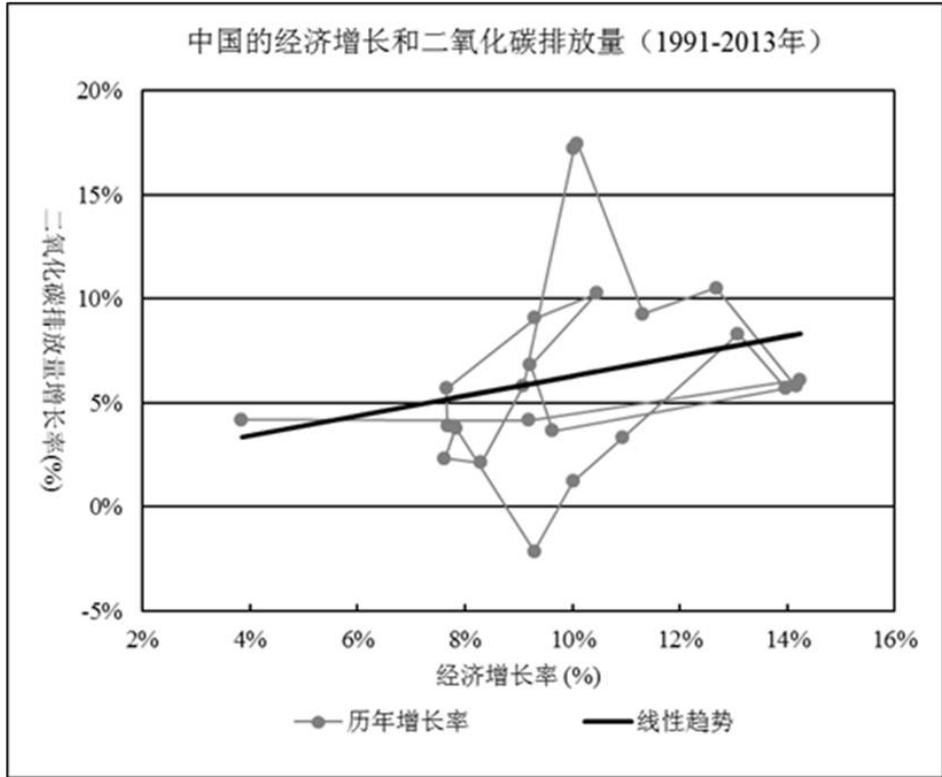
然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条件下，这是很难实现的。

### 为什么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不可能兼得？

在目前中国的主流论述中，一般认为，只要政府充分重视生态环境的问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再辅以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通过加速技术进步，就可以建成所谓“绿色经济”，做到既维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或者至少是所谓“中高速增长”），又能够逐步改善生态环境。笔者认为，官方、主流学界、主流媒体向大众所灌输的这种“共识”严重违反中国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实际，除了在个别领域以外，一般是不可能实现的。

让我们以最主要的污染物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人类因化石燃料（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燃烧引起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全球变暖如果超过一定限度，可能导致地球上的大面积地区不再适合人类生存，并威胁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存续。除此以外，二氧化碳的排放实际上还与各种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以及其它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高度相关。所以，二氧化碳的排放情况实际上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生态环境的整体状况。

下图说明了中国在 1991-2013 年期间历年经济增长率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BP《世界能源统计评论》

如图所示，除了 1998 年以外，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其它各年都属于正增长（也就是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断恶化）。由于中国的重工业部门常常会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大起大落，因而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也大幅度波动。1998 年，在官方经济增长率高达 9.3% 的情况下，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 2.1%；2003 年和 2004 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率曾经分别高达 17.2% 和 17.4%；2008 年，在官方经济增长率高达 9.6% 的情况下，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率又下降到 3.7%。

总的来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是正相关关系。简单线性回归的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就趋于提高 0.5 个百分点。

为什么在经济增长率为正的条件下，很难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呢？按照主流论述，只要技术进步的速度足够快，从而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下降的，即使经济快速增长，仍然可以改善生态环境。但是，要采用新技术，必须采用新的机器设备，还要建设新的厂房和办公楼，建设具有节能减排功能的住宅等。要用新的建筑物和设备来代替旧的建筑物和设备，需要时间。一个社会每年只可能淘汰和报废少量的旧设备和旧建筑。

假设一个社会每年淘汰和报废 5% 的旧设备和旧建筑，再假设这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率为 3%，因而每年需要相当于原有设备和建筑量 3% 的新设备和新建筑。这样，为了替代被淘汰和报废的设备和建筑以及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这个社会一共需要建设相当于原有设备和建筑量 8% 的新设备和新建筑。再做一个很乐观的假设，假设新设备和新建筑与旧设备和旧建筑相比可以将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减少 50%。但是，就整个社

会来说，因为仅在 8%的设备和建筑上采用了新技术，其它原有设备和建筑仍然在使用旧技术，整个社会的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仅减少了  $50\% * 8\% = 4\%$ 。与此同时，经济总产值增加了 3%，所以整个社会的环境影响仅下降了 1%。

在现实经济中，是很难做到将所有的新设备和新建筑的环境影响强度都平均减少 50%的。就二氧化碳排放来说，这相当于要求中国所有的新电厂都立即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比较现实一点，如果假设新设备和新建筑与旧设备和旧建筑相比可以将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减少 25%，仍然假设每年淘汰和报废 5%的旧设备和旧建筑，那么，在经济增长率为 3%的条件下，整个社会的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将减少  $25\% * 8\% = 2\%$ 。与此同时，经济总产值增加了 3%，所以整个社会的环境影响将会增加 1%。

如果假设经济增长率下降到零，其它假设不变，那么，整个社会的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将减少  $25\% * 5\% = 1.25\%$ 。与此同时，经济总产值没有增加，所以整个社会的环境影响也将会减少 1.25%。

可见，即使采用很乐观的技术进步假设，经济增长率也至少要下降到 3%以下，生态环境才可能有所改善；而在比较现实的技术进步假设下，只有在经济零增长的条件下，才可能逐步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生态可持续性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剩余产品（即社会总产品扣除生产资料消耗以及人口的基本需要以后剩余的部分）就掌握在占人口少数的剥削阶级手中。但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社会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主要是将剩余产品用于奢侈消费以及其它非生产性的社会目的中（如宗教、战争等），很少用于扩大再生产。因此，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在长期以来一直缓慢增长。

但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市场关系占了统治地位，几乎所有的社会产品都通过市场来分配。在市场经济中，几乎每一种社会产品都成为商品，而所有的商品都是由许多个不同的生产者来生产的。市场上的生产者之间，无论大小，相互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竞争。竞争成功的，可以扩大规模、吞并对手；竞争失败的，就会破产倒闭，甚至于家破人亡。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成功，市场经济中的每个生产者都必须将自己所占有的剩余产品（在市场经济中，也就是剩余价值或利润）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也就是用于资本积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就会被淘汰。

所以，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每个商品生产者必然要追求资本积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就必然导致物质生产和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导致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不断增长，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仅如此，只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依靠企业来获得税收，有了税收政府才能运转。由于在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企业都是私有制企业，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实际上都要依靠资本家来提供税收。为了获得税收，各级政府就要适应资本家的要求，包括在环境保护和劳动者权利等方面放松对资本家的监督管理，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靠单纯变更政府公开宣示的政策目标或者调整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比如，通过采用诸如“绿色 GDP”一类的衡量指标）就能改变得了的。

当然，不同的国家，由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中承担的职能不同，在政府、公众、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会有所不同，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调整空间有大有小。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地位的国家，由于可以从世界其它地区掠夺超额剩余价值并转嫁生态环境方面的矛盾，在保护本国生态环境方面往往就有较大的调整空间。比如，美国的人均生态脚印高达 8.0 公顷，号称“绿色”、“环保”的德国人均生态脚印高达 5.1 公顷，日本的人均生态脚印高达 4.7 公顷；但是这些国家通过垄断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低污染、附加价值高的商品链环节，同时转嫁高污染、附加价值低的商品链环节，他们在本国范围内的空气、水、土壤污染状况远远好于中国和大多数外围、半外围国家的状况。而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或半外围地位的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国家，在生态环境方面的矛盾就尤其突出，根本不可能做到既维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又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

近年来，中国主流经济学界以及经济决策部门对市场经济的迷信进一步强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设想，反映了在中国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也不符合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众所周知，所谓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实现最优结果，在理论上源于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假说。也就是说，在所有人或大多数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在 market 价格的引导下，每个人追求私利的结果最终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是，严格来说，这仅仅是个假说，这一假说即使是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也从来没有被证明过（目前仅有的所谓数学证明要求大量的极端不现实的假设条件）。

“看不见的手”的假说要成立，前提是市场价格能够给市场上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提供正确的信息，也就是市场价格要能正确地反映生产一种商品实际上所发生的社会成本以及这种商品能够给消费者和其它利益相关方所能带来的社会利益。如果市场价格不能提供这样的正确引导，那么，商品生产者就完全有可能在追逐私利的动机下，大量生产利润丰厚但是实际上社会成本大于社会受益的商品，从而不仅不能增加社会福利，反而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近年来，在中国经济的实践中，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在现实市场经济中，“市场失败”（也就是说市场价格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世界上比较开明的、站在经济学发展前沿的主流经济学家实际上对此都不否认。就生态环境来说，这就表现为生态环境“外部性”的普遍存在，也就是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不能充分反映商品生产和消费所包含的环境成本。在价格信号实际上普遍“错误”的情况下，追求私利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在错误的市场价格引导下，不仅不能造成增进社会福利的后果，而且完全可能在他们各自追求私利的行为的综合作用下，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在平时，会导致经济危机、大量失业、贫富悬殊加剧、社会道德沦丧等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在长期，则可能导致生态环境系统的全面崩溃以及人类文明物质基础的坍塌。

**站在生态悬崖边缘的中国——怎么办？**

如上所说，中国的各种生态环境系统目前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已经进入了崩溃的过程。中国如今已经站在了生态悬崖的边缘，当务之急，是亡羊补牢、悬崖勒马，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中国要重新走上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道路，大前提，是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根本调整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不是将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作为诸多重要或比较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而在实际上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而是将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确定为当前中国首要的、压倒一切的发展目标。

本文在前面已经论述，中国的生态环境要改善，即使在乐观的技术进步假设下，也必须首先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到3%以下；而在比较现实的技术进步假设下，只有实行经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才能实现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有鉴于此，一旦中国的政治体制经过重组以后确认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为首要发展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短时间内将经济增长速度压低到3%以下，同时采用最新、最好的各种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最大限度地降低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然后，在经过一个阶段的适应期以后，再用10年至20年的时间，逐步实现经济零增长，并在比较常规的技术进步速度条件下，逐步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

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就要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也就是减少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以2012年为例，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从支出角度，居民消费占36%，政府消费（主要用于支付政府雇员的劳动报酬）占13%，总投资（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增加）占48%，净出口占3%。

中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严重偏高，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资本家的收入在中国的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很大，而劳动收入份额偏低。其次，是因为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专门从事制造业出口，这就要求中国的资本家大幅度增加投资以形成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所以中国的投资占资本家收入的比例在世界上也是偏高的。

据笔者估算，2012年，中国的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包括工资、社会保险、个体经营者收入、农业劳动者收入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各种形式的资本收入（包括公司利润、利息、租金等）占31%，政府间接税和企业所得税（占中国政府税收的绝大部分）占18%，固定资本折旧占13%。

劳动收入主要用于消费，而资本收入主要用于投资。劳动者也会储蓄，并用于投资；资本家也会消费。但是在宏观上，劳动者的储蓄与资本家的消费大体抵消。所以，中国的劳动收入大致与居民消费相当；资本收入与固定资本折旧相加，大致与总投资相当；政府间接税和企业所得税相加，大致与政府消费相当。要降低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主要是要减低资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如果假设中国未来的资本-产出比（物质资本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3:1（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美国的资本-产出比），再假设折旧率为5%，那么未来中国的固定资本折旧会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中国现在的总投资是国内生产总值的48%，如果这个比例不改变，中国的净投资就将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3%，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00%的物质资本存量相比，这就相当于维持11%的经济增长率所需要的净投资规模。显然，这样的投资规模大大超出了维持生态环境可持续性所能允许的水平。

如上所述，要保证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率必须减少到3%以下，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00%的物质资本存量相比，维持3%的经济增长率所需要的净投资是国内生产总值的9%。因此，要将经济增长率减少到与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兼容的水平，中国经

济的净投资需要从国内生产总值的 33%减少到 9%，总投资需要从国内生产总值的 48%减少到 24%，也就是将中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减少大约一半或 24 个百分点。

要完成上述的宏观经济结构调整，首先要减少资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劳动收入的比例；其次是创造条件，鼓励劳动者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如果能够使中国的资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减少 20%、劳动收入比例相应增加 20%，再通过提高社会保险的覆盖和水平，减轻普通群众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负担等方法，使劳动者的消费意愿有所提高，就基本可以完成将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 24 个百分点的宏观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的劳动收入偏低、资本收入偏高，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中国的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伴随着大量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这就造成了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之间的高度竞争，从而破坏了非农业部门劳动者的斗争能力。近年来，由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所减少，非农业部门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增强并且逐步组织起来，中国劳动收入比例偏低的情况有所改善。2007 年至 2012 年，中国的非农业部门就业人员总数从 44600 万人增加到 50900 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约 1260 万人；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33.7%增加到 37.9%，平均每年增加约 0.8 个百分点。按照这个比例，如果非农业部门每年能够从农村吸收 1500 万个劳动力，中国的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有望提高 1 个百分点；如果非农业部门每年能够从农村吸收 3000 万个劳动力，中国的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有望提高 2 个百分点。如果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年提高两个百分点，那么大约需要 10 年的时间，可以完成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20%的资本收入转移到劳动收入的结构变化。考虑到中国生态环境危机的紧迫性，应当采取尽快提高劳动收入、尽快降低资本收入的调整方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雇佣劳动力的目的是为了从事资本积累和获取利润。在中国，虽然劳动力已经十分廉价，但是资本家为了获取利润，仍然选择用大量的机器来替代劳动，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2007-2012 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约 9%，非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年平均增长 1260 万。按照这个比例，中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由企业部门所吸收的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可以增加 140 万。如果经济增长率下降到 3%，由企业部门所吸收的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只能增加 420 万。

这样，要保证每年新增加 3000 万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就不能依靠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而只能由公共部门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统筹规划，实行大规模的公共就业和公共投资计划。如果实行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就业计划，每年新增加公共部门就业约 2500 万人，按照每名劳动者年收入 40000 元计算（略高于现在农民工的平均年收入），则每年政府需要新增加支出 1 万亿元。

这 1 万亿元，可以通过适当增加政府税收来筹措。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仅占全部税收的 6%、国内生产总值的 1%，并且主要由工薪收入者承担。完全可以考虑，适当提高高收入者的纳税比率，并严格打击偷税漏税，将个人所得税收入提高约 5000 亿元，大约相当于资本收入的 3%、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另外，取消大部分出口退税，可以再筹措 5000 亿元。

除了劳动者的工资支出以外，公共就业项目还需要配套的公共投资。按照公共投资与劳动者工资支出 3:1 计算，每年需要新增加 3 万亿元的公共投资。这部分公共投资，可以通过中央政府发行建设公债来筹措。政府可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认购，再由国有银行认购一部分，必要时，强迫一些资本家购买。这些公共投资，可以形成大量的建设性资产，

因此可以用未来的收入来偿还。如果年利率设为 5%，在经济增长率为 3%、通货膨胀率为 2%（从而名义收入增长率为 5%）的条件下，就可以保证政府公债还本付息。

由此开展起来的大规模公共投资和就业计划，可以用来大规模建设劳动人民迫切需要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项目，清理污染，发展生态农业，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以及从事其它有利于民生和生态环境的项目。经过 10 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使中国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收入结构发生根本的改善，将经济增长率初步降低到与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相适应的水平。

并且，经过 10 年左右的大规模公共投资和就业计划，中国的公共部门就业可以增加约 2.5 亿人，公共资产可以增加约 30 万亿元，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将发生重大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这就为中国在下一个阶段全面开展向生态社会主义模式的过渡打下了坚实基础。

## 当工人运动高潮来临时，“劳工界”何去何从？

李民骐（2015年4月5日）

近日，有幸读到了王江松先生起草的以“劳工界”名义就劳工权益问题告政府、企业和社会书（“劳工界就制造业衰退过程中劳工权益问题告政府、企业和社会书”，原载劳工互助网：[http://blog.sina.com.cn/s/blog\\_a1dc47310102vf9k.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a1dc47310102vf9k.html)，以下简称“告政府、企业和社会书”）。王江松先生是当代中国劳工权益届的前辈，长期战斗在南方工人斗争的第一线，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王先生的这篇“告政府、企业和社会书”内容很丰富，不乏真知灼见，值得中国的马列毛左派、其他马列主义倾向以及一切关心中国工人运动前途的进步人士阅读和思考。

王先生在“告政府、企业和社会书”中，生动地介绍了当前中国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现状，特别是在中国资本积累的重心——制造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有了尖锐不可调和的趋势。王先生正确地指出，中国目前的所谓发展模式，其结果就是让“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是“病态的和疯狂的”，是“以牺牲大部分人的自由、平等、尊严和幸福为代价”，是“另一种倒退”。

王先生对于“90年代以来的改革”进行了控诉。正如王先生所说，数千万国企工人“被扫地出门”，数亿农民工只是被当作“没有人权和公民权”的劳动力，“以人为本变成了以人为成本”，“劳动者成为用过即扔的劳动力商品和生产工具”。“这是一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因而根本缺乏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其所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隐患深不可测。”

王先生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容纳阶级矛盾的能力，也有不失精辟的分析：“一般来说，如果仅仅是劳工抗争日益高涨，只要经济上行、就业稳定，对劳工的权利诉求的吸纳能力就比较强，或者虽然经济下行、失业严重，但劳工的权利诉求不太强烈，可以通过压低劳动权益来扩大就业。”简言之，如果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高涨、资本积累旺盛，资本主义社会就拥有一定的调节和缓和阶级矛盾的能力，得以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当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比较薄弱，觉悟和组织程度还比较低的时候，资产阶级便可以无所顾忌地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强迫工人阶级在血汗工厂的状况下听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以此来提高利润率并扩大资本积累的规模（正如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情况）。

但是，王先生敏锐地感觉到，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化，也随着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上述两种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方式在今日中国已经越来越维持不下去了。“中国已经开始陷入到产业衰退引发的大规模失业与长期对劳工的历史欠账引发的维权抗争纠结叠加在一起的窘境之中。。。大规模失业与劳工的权利要求和抗争行动一起到来，事情就不好办了。”王先生预言，再不“根本转变发展理念和增长模式”，“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就会半途而废，而且会导致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文明倒退。”

在受到中外资本家长时期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以后，中国的工人阶级正在成长和壮大起来，并且正在开展大量的、有组织、有规模、有威胁力的斗争。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矛盾，由于“处在全球化生产链条末端”，由于“对世界市场和跨国资本的依附性”，由于利润率的大幅度下降，不具备在其自身内部进行社会改良、对工人阶级做出有限让步以缓和阶级矛盾的能力。面对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资本主义的“事情

不好办了”，正在逐步地然而却是确定无疑地走向“半途而废”、“大规模动乱和倒退”的前途。对于这个前途，越来越多的中国马列主义者正在认识到，而越来越多的像王江松先生这样的改良主义者正在感觉到。

在“告政府、企业和社会书”中，王先生十分诚挚地、发自内心地向“政府”和“企业”提出自己的谏言，希望中国的资产阶级能够从自己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舍去一些局部和眼前利益，效法当年的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实行“劳工新政”。王先生警告说，“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劳动和资本这两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整个工业市场经济就会土崩瓦解”。

在王先生看来，只要实行了“劳工新政”，就可以带来“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效益”：“由于底层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中有了上升的通道和空间，由于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上升为有产者以及由此出现了中间阶级的发展壮大，贫富两极分化所导致的底层劳动者的绝望和愤慨逐渐减弱了，对市场经济的心理和道德认同提高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减少了，要求彻底消灭市场经济而代之以计划经济的极端思潮和政治力量衰退了，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变得更加公正和稳定了。”

确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西方各国工人阶级的长期斗争，但是同样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以及马列主义的广泛影响，西方资产阶级被迫做出一些让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西方各国工人阶级在生活水平以及各种社会权利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生活的进步也是以对第三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这种残酷剥削使得西方国家得以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巨大的超额利润）以及对化石燃料的巨大浪费为代价的。

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呢？王先生很有信心地（抑或是很天真地）说：“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渐上升，已经达到 75%左右。市场经济因此而崩溃了吗？没有，它获得了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动力源泉。”我与王先生是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代吗？以美国为例，“雇员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1970 年前后达到 58%的历史最高点以后，就长期趋于下降，至 2013 年已经下降到仅有 52%。即使加上包含中小资本家收入的“企业主收入”，2013 年美国的雇员报酬和企业主收入之和也不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0%。不仅如此，美国绝大部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也是趋于下降的。（顺便说明一下，王先生在“告政府、企业和社会书”中还提到，中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仅有 16%；虽然中国工人受到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但是王先生所提到的这个数据是不确实的）

当然，王先生不是国民收入统计方面的专家，对于外国经济统计数据了解得不翔实也是在所难免的。然而，王先生并非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既忘了“东风压倒西风”时代的世界革命高潮，又闭眼不见世界反动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休克疗法”以及“改革开放”。王先生搞不清楚欧美的国民收入统计，难道不曾听闻“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1%与 99%”之间的对立，难道没有关注过如今遍布欧美各国的人民大众的反紧缩斗争，或者也不曾听说过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皮凯蒂的畅销书《21 世纪的“资本论”》？难道这些不是当今世界“底层劳动者的绝望和愤慨”的真实写照？更不必说在广大的第三世界，数十亿劳动人民所面临的饥饿、挣扎，以及在拉丁美洲、东南亚、南亚和中东到处都在发生的社会崩溃以及武装斗争。

回到中国的现实中来。王先生所倡导的“劳工新政”，虽然是改良主义的，虽然多数是从良好愿望出发的，而不是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实际出发的，但是仍然不乏积极的因

素。其中一些主张，未尝不可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过渡性的政治与经济要求。在王先生所倡导的“劳工新政”中，我认为，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大体上可以赞成并且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加以推动的，有这样一些：

- 一. 补偿对农民工和国企下岗工人的历史欠账，解决在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要解决上千万工伤职业病农民工的医疗养老问题。
- 二. 保障所有工人都能得到足以过上尊严生活的“生存工资”；并在此基础上，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并且保证全体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的休息权。
- 三. 在法律上确立并且明确保障全体劳动者都应具有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以及罢工权。
- 四. 在民主的以及有工人阶级代表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在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下，建立不受资产阶级影响和干扰的、具备一定执法权的劳动关系监督及调节委员会，依法保障各项劳动法规的贯彻实施，对于违法资本家可以给与罚款、没收部分或全部财产、拘留传讯等处罚。

以上几点，根据王先生在“告政府、企业和社会书”中的若干设想，略作修改而形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种不同政治倾向但是切实致力于中国工人阶级进步的各方面人士在现阶段共同点。除此以外，王先生还提出了一些建议，诸如将国企利润划归社保基金账户、“降低企业赋税”·“激励创业投资”、给失业工人提供所谓“职业教育”、给返乡农民工“技术支持”等，多属于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或者不甚实际，或者杯水车薪，或者实际上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劳动者，未必经过王先生的深思熟虑。

现在来探讨实质性的问题。上述的可以作为“劳工新政”的四项主要之点，如何才能实现？如果实现了，又会有怎样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首先，请问王先生，要实现上述的“劳工新政”（或者哪怕是王先生在“告政府、企业和社会书”中原版的“劳工新政”），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条件？除了王先生以及王先生的许多朋友都翘首以待的“政治改革”以外，如何才能防止会被“劳工新政”损害利益的大小资本家们在政治上捣乱破坏并导致王先生的“劳工新政”胎死腹中呢？其间的酸甜苦辣，或许王先生以及“劳工界”人士近年来已经多有体会，了解得也更加深刻？

我们再设想，有朝一日，不再有政治上的障碍，“劳工三权”得以伸张，“劳工新政”得以全面贯彻，这样的“劳工新政”导致工人权力的增加、工资和生活水平的快速增长；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或者，在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资本家的利润率又将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王先生在“告政府、企业和社会书”中已经讲到，中国制造业资本家的利润率已经在普遍下降，已经到了“产业衰退引发大规模失业”的边缘。既如此，再大幅度增加劳动成本，难道不会使得资本家的利润率更加大幅度下降，难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会导致经济危机来得更快、更猛烈？

王先生有什么办法，能够既实现“劳工新政”，又保障中外资本家的利润率？是靠分享国企利润？王先生可以查实一下，中国所剩的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其利润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几？（2014年，中国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不过2.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4%；其中三分之一是应交所得税，另外还包括比例很大的属于非国有资本的利润）

是靠政府给资本家减税？减税之后，政府的公共职能如何维持、社会福利如何支付？王先生是向往北欧福利国家的，可知道北欧福利国家的宏观税率（各级政府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往往在 50%以上？这样比例的宏观税率，中国的资本家可愿意贡献，可能承受？

是靠产业升级？所谓“产业升级”，就是说中国要从王先生所说的“全球产业链的末端”提升到顶端。换句话说，中国资本家要在全球不平等交换中由价值输出的一方转变为价值输入的一方。想法是很美好的，但是能实现吗？第三世界国家几百年都没有实现的事情，中国资本家在几年、几十年中能够实现吗？什么样的全球产业链“顶端”能够吸收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全球产业链“末端”的产业向哪里转移，相应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具备吗？世界环境能够允许所有中国工人都按照美国工人的物质消费水平生活吗？

比较现实的前景是，一旦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从而中国工人阶级有力量、有决心贯彻上述的“劳工新政”，中国的资本家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利润率大幅度下降的局面。一旦，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舞台上，人们将被迫在“劳工新政”与资本家的利润率之间做抉择的时候，王江松先生以及王江松先生周围的“劳工界”朋友们将何去何从呢？是坚持“劳工新政”、反对利润率，还是维护利润率、抛弃“劳工新政”？

这是假想的问题吗？不是的，这正是王先生认为已经解决了劳资关系问题、实现了“公正和稳定”的美、英、德、日等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的真实写照，这正是为什么前苏联、东欧、拉美、非洲、南亚、东南亚等许多国家人民在新自由主义暴政下陷于贫困与饥饿，这正是中国工人运动一旦高涨以后不可避免要面临的历史抉择！

出路是有的，那就是剥夺剥夺者，那就是用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通过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和公共就业计划，将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组织起来，重建并扩大社会主义经济，限制及缩小资本主义经济，直到建立以人而不是以物为发展目的、以劳动而不是以资本为基础的新社会。

这样一条出路，想来王江松先生现在还是不愿意走的乃至于强烈反对的。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愿意等待，我们有的是时间。但是不知道，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的发展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王先生等待。

当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性要求与中国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二者之间发生尖锐不可调和冲突的时候，当“劳工新政”与资本利润二者必居其一的时候，何去何从？王先生要选择，笔者也要选择；你们要选择，我们要选择，他们也要选择；资产阶级要选择，工人阶级也要选择；历史终归是要选择的。这便是 21 世纪中国的宿命。

（作者是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 要坚决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做斗争

远航一号（2015年4月28日）

近日，红色中国网编辑远航一号就工作问题致信 C 小组，并就当前工作表达了一些个人意见。这些意见是远航一号个人的，不是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其他成员的意见，也不代表编辑部集体的意见。下面是远航一号同志给 C 小组的信的主要内容：

在今日中国为数众多的左派团体中，C 小组是最早关注并参与基层群众斗争的，开辟了资本主义复辟时代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与基层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先河。到 2012 年，C 小组已经成长为与基层群众斗争联系紧密并且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的一个马列毛主义团体。

然而，自 2012 年以来，C 小组的工作逐渐陷入了动摇徘徊，在具体工作方面或者急躁盲动、或者无所作为，在主要工作方向上迟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负责人丧失了战略目标，而工作骨干又不断流失，整个工作已经陷入被动。现在，应该积极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结合当前阶级斗争的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倡新思想，尝试新办法，力争扭转目前的不利局面，争取 C 小组的新生。

目前国内阶级斗争总的形势，于工人阶级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虽然资产阶级毫无疑问在各方面居于统治地位，但是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乃至本世纪初的形势不同，目前阶级斗争的基本特点，是无产阶级在进攻，资产阶级在防御；无产阶级力量在上升，资产阶级力量在下降。无产阶级力量的上升，目前主要表现在经济斗争方面。当然，在许多具体斗争中（如目前南方沿海普遍爆发的讨薪求偿斗争、建筑业工人的讨薪斗争等），资本家仍然是很猖狂的，地方资产阶级政府在镇压工人方面依然是很凶恶的。但是，这种猖狂与凶恶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困难的反映，而不是资产阶级力量的反映。

有几个方面的趋势是确定的。第一，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在不断壮大；第二，无产阶级的斗争愿望和组织程度在不断提高；第三，无产阶级斗争的先进分子与马列主义和其他的进步积极分子之间的联系在不断扩大与加深；第四，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力量在迅速增长，表现为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第五，资产阶级的困难在不断增加，表现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在不断下降。

除此以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分化，其政治上比较活跃的部分在左转。这不仅表现在大量青年学生为马列主义所吸引，而且表现在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各项经济和社会要求（教育、医疗、住房、环境、基本人权等）都意味着增加资产阶级的困难，并且都不可能在中国资本主义的现有制度框架内得到满足。

上述趋势只要继续发展下去，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中国资产阶级就必然要遭遇严重的并且不可克服的困难，中国的政治形势就可能发生重大的并且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就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建立起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强大的、人民大众的反资本主义联盟，中国无产阶级就有可能取得反对资产阶级的胜利。

在当前阶级斗争的总的发展形势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大前提下，C 小组的工作遇到了严重困难，除了一些客观因素以外，主要要从主观方面来寻找原因。关于这些原因，我在另外一封信中，说明了我个人的看法，此处不再赘述。

目前，在国内的各左派团体中，若干个以青年同志为主的马列主义团体和进步团体在人数规模、组织严密度、行动能力、生命力以及联系群众的程度等方面已经超过了原来的几个主要的传统左派团体，在表面的社会影响力方面也在迅速赶超。原有的传统左派团体，谁能够率先正视这一事实，率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在与青年同志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过程中，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解放贡献自己应当贡献的作用，谁就有政治生命、就能取得存在和发展，否则，就有被历史淘汰的危险。

在现阶段（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中国各马列主义团体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坚持做大量的、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这既包括积极开展马列主义积极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主要是与工人相结合）的工作，也包括用马列主义思想来积极影响、教育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总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大众的反资本主义联盟而斗争。

在这个过程中，各马列主义团体要树立无产阶级全阶级的利益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目标高于一切的思想，要坚决与各种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做斗争，要坚决反对和克服将小团体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包括打着革命旗号的个人利益）置于无产阶级整体利益之上的倾向，要在初步的阶级自觉的基础上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封建家长制，也反对个人英雄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工作的主要目的，除了用马列主义思想影响和教育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外，主要是要结合当前中国革命的实际，正确地认识和分析无产阶级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条件，并据此发展正确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以及联合其他各被压迫阶级的策略。

教条主义是当前左派理论工作的主要缺点。当前中国左派队伍中教条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由于一般马列主义积极分子在理论素养方面的不足以及对于中国与世界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从而照搬马、列、毛在以往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些理论主张和革命策略。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这些主张和策略，或者已经失去生命力，或者已经被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部分是错误的，并且无论如何不能给当前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提供任何现成的灵丹妙药。比如，无论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设想都不能给今日中国的革命实际提供现成的答案。再比如，由于照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在若干青年左派团体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导致一部分同志或者盲目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不相信或者不敢相信无产阶级胜利的前途，或者将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欺骗误认为是中国资产阶级本质的方面、夸大中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而将中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希望毫无根据地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上。

当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勾结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妨碍中国左派进步与发展最严重的障碍。现阶段，在各左派团体的所谓“理论交锋”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恶习，即理论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在无产阶级斗争以及马列主义积极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实际问题，也不是为了认识和分析无产阶级斗争胜利的条件、树立无产阶级斗争胜利的信心，而是将理论斗争庸俗化，堕落为各个小宗派拉帮结派、站队划线并将本宗派利益置于阶级利益、马列主义左派全体利益之上的工具。

我个人认为，C小组要克服目前的困难，实现政治上的新生，再创辉煌，除了认真总结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发扬以往的优点以外，还必须与当前已经困扰中国左派的上述各

种错误倾向做斗争，才有可能不断取得进步，并且通过自己的进步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做出应有的贡献。

为此，我个人郑重提出如下建议，请 C 小组的同志们考虑：

第一，以若干同志为核心，重组 C 小组，明确成员、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参加和退出方法，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封建家长制，也反对小资产阶级个人散漫主义。要把 C 小组建设为一个战斗队，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茶馆，也不是“职业革命家们”喝酒抽烟发牢骚、说大话的精神疗养所，也不可以是个别同志根据个人主观意志任意使用而又可以任意改变的“政治品牌”。

第二，制定并且贯彻工作计划。工作计划要服务于当前无产阶级斗争发展的总的目的。在目前马列主义和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的形势下，要寻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要最大限度地在其他团体尚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发挥作用。工作计划绝不能好高骛远，而必须切实可行，要留有充分的余地。责任要落实到个人。每隔一个时期，个人要向集体汇报工作，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取得成绩的地方要坚持，遇到困难的地方要找原因、想办法。在条件有利并且可以直接开展工作的地方，当然应该努力开展工作。在暂时还不能开展工作但是未来应当开展工作的地方，应当首先制定调查研究的计划，并且委托专人进行。

第三，C 小组要带头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敢于向那些坚持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团体开展斗争，要向那些自觉克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团体学习和靠拢，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永远使本团体的局部利益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 “中等收入陷阱”、“劳工新政”、“二十世纪”的终结及“二十一世纪”的开始

远航一号（2015年5月18日）

近日，中国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重提“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根据楼继伟先生的观点，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由于“多元所有制”兴起，开始了“真正的市场化”，大多数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都“垮掉了”，“形成了真正的竞争”，于是“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释放”，“劳动力开始真正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在这个期间，中国经济“可以说是基本健康的”，“没有大的问题”。

然而，“2007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开始减慢。而且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择业标准也不同了。”由于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以及“工资陡然增长”的所谓“三期叠加”，再加上所谓“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笔者注：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计算经济效率的一个概念，大致相当于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某种加权平均），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开始丧失竞争力。

楼继伟先生进而提出他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前景的看法：“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

在预言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可怕后果后，楼继伟先生也开出了跳跃“中等收入陷阱”的药方。根据楼部长的认识，要跳跃“中等收入陷阱”，“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此，“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也就是说，要全面推行金融和土地私有化，对外资全面开放；保护资本家的“产权”，特别是要限制工人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另外，还要放开农产品进口，使得更多的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确保劳动力市场不“僵化”，从而保障中国工人的工资增长长期地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楼继伟先生的清华演说在网络上得到了广泛关注，引起了左右各方面社会人士的激烈辩论，尤其是遭到了来自左翼学界、劳工积极分子以及广大进步网民的批判。就在楼继伟先生发表清华演说大约一个月之前，知名的自由派劳工活动家王江松先生发起了以呼吁政府和“企业界”实行所谓“劳工新政”为目的的“劳工界呼吁书”。

在呼吁书中，王江松先生认为，“90年代以来的改革”（也就是楼继伟先生认为“基本健康”的、“没有大的问题”的时期）“是一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因而根本缺乏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其所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隐患深不可测。”

在王江松先生看来，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即将维持不下去了。“中国已经开始陷入到产业衰退引发的大规模失业与长期对劳工的历史欠账引发的维权抗争纠结叠加在一起的窘境之中。。。大规模失业与劳工的权利要求和抗争行动一起到来，事情就不好办了。”再不“根本转变发展理念和增长模式”，“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就会半途而废，而且会导致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文明倒退。”

楼继伟先生担忧的是“中等收入陷阱”，王江松先生为“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文明倒退”而忧心忡忡。然而，与楼继伟先生所主张的“劳动力市场灵活化”以及“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铁律”相反，王江松先生大声疾呼，要赶紧实行“劳工新政”，“尽快偿还对农民工和国企下岗工人的历史欠账，解决在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保障劳工三权（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为此修改工会法，并进一步明确立法保护工人的集体争议权和产业行动权”。

王江松先生发自肺腑地向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们呼吁：只要实行了上述“劳工新政”，就必然可以带来“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效益：由于底层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中有了上升的通道和空间，由于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上升为有产者以及由此出现了中间阶级的发展壮大，贫富两极分化所导致的底层劳动者的绝望和愤慨逐渐减弱了，对市场经济的心理和道德认同提高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减少了，要求彻底消灭市场经济而代之以计划经济的极端思潮和政治力量衰退了，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变得更加公正和稳定了。”

一方面要坚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以及“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铁律”，另一方面在大声呼吁（乞求？）“劳工新政”、使得“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上升为有产者”。显然，两方面的愿望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铁律”与“新政”不可得兼，孰为南辕，孰为北辙？

楼继伟部长的演讲很值得一读，因为他说出了高度自觉的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心里话，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资本主义在现阶段的深刻矛盾。那就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发展壮大起来，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开始发生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变化，表现在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表现在资本家利润率的普遍下降，表现在中国境内的资本主义企业（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开始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如此发展下去，中国资本主义将不仅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还可能召唤起“民粹主义”的幽灵。

什么是“民粹主义”？楼继伟先生没有明说，但是从王江松先生的呼吁书中却可以见其端倪，那就是“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半途而废”，“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文明倒退”，“工业市场经济土崩瓦解”，“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要求彻底消灭市场经济而代之以计划经济的极端思潮和政治力量”不是衰退而是蓬勃发展。

作为知名的自由派劳工活动家，王江松先生的立场是有相当代表性的。王江松先生首先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实行社会改良的愿望（解决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养老等问题，不仅对工人阶级有利，而且首先将使得相当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受益）；但是他们又不希望或者说非常害怕由此而引发“社会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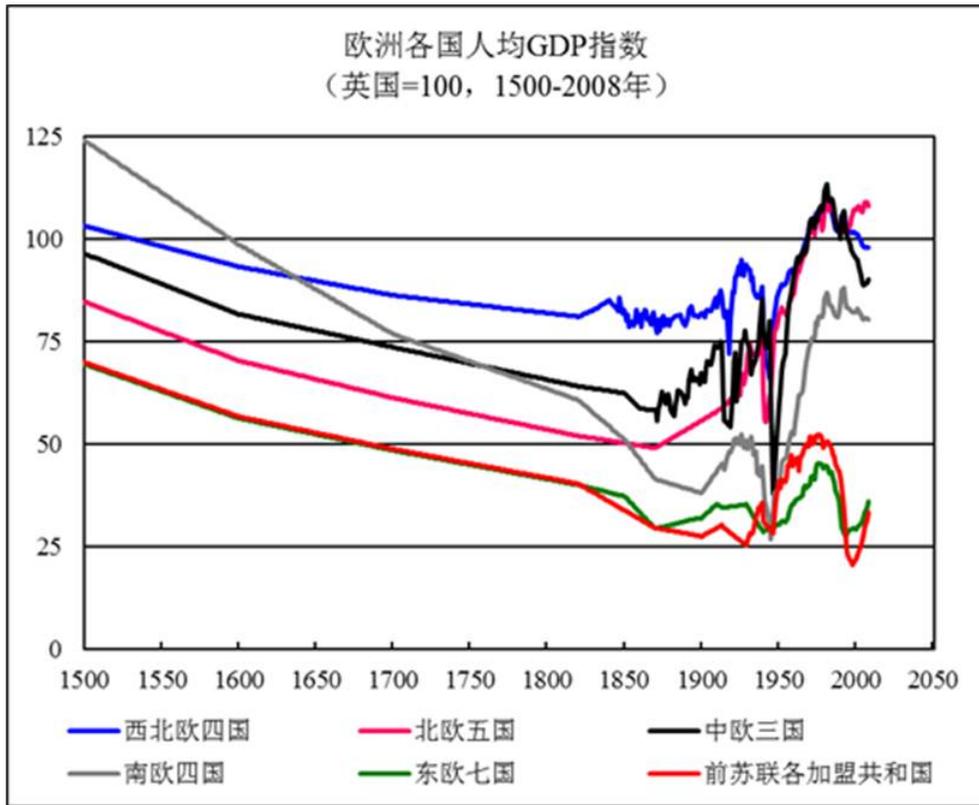
乱”进而危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其次，王江松先生的主张也代表了一部分已经初步具备了阶级觉悟但是尚未具备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积极分子在现阶段的向往和要求。因此，可以说，王江松先生的主张在现阶段概括了相当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愿望和要求。这些要求，是中国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反映，是相当多数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群众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尚存幻想的产物，是在中国尚未发生革命形势条件下一般群众觉悟的真实表现。随着中国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对工人阶级有利而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深化乃至爆发危机，随着中国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乃至演变为革命形势，上述愿望和要求就将不再是工人群众一般觉悟的反映，而将逐步降低为工人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可以接受的最低要求，乃至成为一般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最低要求。当这样的最低要求与楼继伟所代表的自觉的中国资产阶级所要强加于中国工人阶级的“铁律”（或者说，为了维持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积累，中国资产阶级所能容忍的最大界限）发生尖锐不可调和冲突的时候，还有什么能够阻挡“工业市场经济土崩瓦解”以及“要求彻底消灭市场经济而代之以计划经济的极端思潮和政治力量”违背诸如楼继伟、王江松等先生的意志成长为未来压倒一切的时代潮流呢？

在本文的下篇中，笔者将进一步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历史运动规律的角度来探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着重分析当代中国资本主义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特殊意义。

在本文的上篇（上期红色中国时评）中，笔者通过分析楼继伟先生的清华大学演讲以及王江松先生的“劳工界呼吁书”，试图论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日益面临尖锐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在工人阶级以及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最低经济和政治要求（所谓的“劳工新政”）已经日益逼近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能容忍的最大界限（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当中国各劳动阶级的最低经济和政治要求突破中国资本主义所能容忍的狭隘界限的时候，中国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将不再能够在中国资本主义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得到解决。斗争的结果，将或者导致中国工人阶级的彻底失败（从长远的历史观点看，这是不可能的），或者导致中国资产阶级的彻底灭亡（从长远的历史观点看，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本文的下篇中，笔者将进一步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历史运动规律的角度来探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着重分析当代中国资本主义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特殊意义。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起源于欧洲，至十六世纪开始初具规模并表现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运动规律。图一说明了欧洲各个主要地区自十六世纪以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指数变化的情况。早在十六世纪，英国就已经是西欧比较先进的国家。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基本确立了相对于西欧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荷兰和法国）的优势地位。十九世纪，英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霸主，“日不落帝国”如日中天。英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使在英国霸权衰落以后，今日英国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之一。基于英国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都长期处于领先或比较领先的地位，本文以英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为基准，以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0，其它各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按照它们相对于英国的百分比来表示。比如，1500年，南欧四国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数是124。就是说，当时南欧四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英国的124%。



图一 欧洲各国人均 GDP 指数（英国=100，1500-2008 年）  
（数据来源：麦迪逊，《世界经济历史统计》）

在图一中，西北欧四国指的是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北欧五国指的是爱尔兰、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中欧三国指的是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南欧四国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东欧七国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前苏联指的是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疆域，包括现在所有的所谓“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员国，大致相当于历史上俄罗斯帝国的疆域。

长期以来，欧洲一直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即使是在欧洲内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两极分化的规律从一开始就在起作用。在 1500 年，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南欧地区与最贫困的东欧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为 1.8 倍。到了 1900 年，西北欧与前苏联历史疆域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扩大到了 2.9 倍。

自十六世纪以来，西北欧就长期处于欧洲乃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位。南欧曾经是欧洲范围最富裕的地区。自十七世纪开始落后以后，南欧与西北欧的差距越拉越大。到了 1700 年，南欧、北欧、中欧已经全部陷入了当时欧洲经济体系范围内的“中等收入陷阱”，其人均收入相当于英国的 61-77%，或者相当于西北欧平均水平的 71-90%。在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半期，上述地区与西北欧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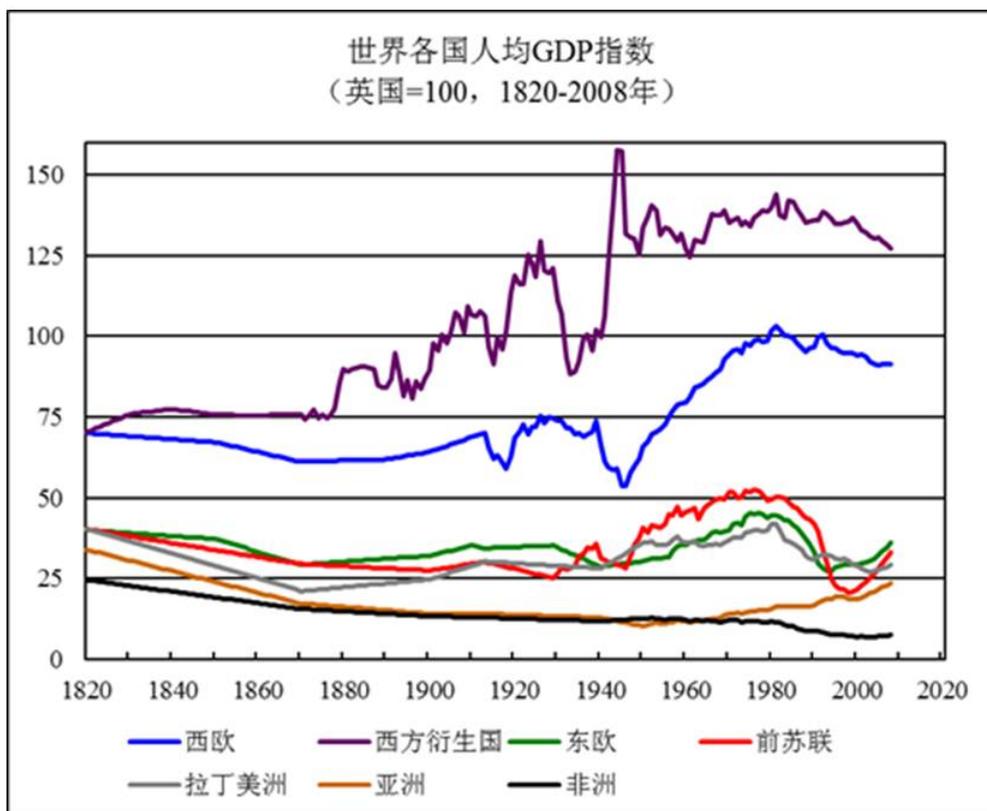
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中欧和北欧才开始逐渐缩小与西北欧之间的差距。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严重挫折以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后半期，中欧和北欧才逐步实现了与西北欧之间的“融合”，最终加入了核心国家的行列。

至于南欧诸国，一直到二十世纪上半期，其人均收入水平还徘徊在相当于英国 25-50%之间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南欧诸国曾经一度发生了“经济奇迹”，与西北欧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南欧四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西北欧的约 80%。南欧地区似乎有望步中欧、北欧的后尘，成为欧洲又一个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地区。然而，好景不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南欧追赶西北欧的过程戛然而止，最后 20%的差距再也无法合拢。图一中的数据截止到 2008 年。自从 2008-2009 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南欧诸国纷纷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经济地位已经一落千丈。

自十七世纪南欧开始落后于西北欧以来，已经过去四百多年的时间了。在四百多年的时间里，南欧各国经历了无数风云变幻，实行过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等五花八门的政治体制，尝试过从自由放任到主要工业企业国有化的多种经济模式，经受了无数次战争、政变和革命的洗礼，但是始终无法改变其在欧洲相对落后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即使到了今日，仍然沦为债台高筑的“欧猪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的英文国名头一个字母合在一起是 PIGS，正好构成英文单词“猪”的复数形式，中文译为“欧猪四国”）。

至于东欧诸国和俄罗斯，自十六世纪起，就已经是主要向西北欧输出农产品的欧洲外围地区。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东欧和俄罗斯与西北欧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一直到俄国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苏联才开始迅速缩小与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1928 年至 1975 年，苏联与英国在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由 4 倍缩小到了 2 倍。然而，在苏联解体以后，几十年的发展成就付诸东流。

到了十九世纪，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扩展到全球。到十九世纪晚期，绝大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都已经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图二说明了 1820 年以来世界各主要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变化的情况，仍以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00。



图二 世界各国人均 GDP 指数（英国=100，1820-2008 年）  
（数据来源：麦迪逊，《世界经济历史统计》）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在收入和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基础上。到了 1870 年，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核心、半外围、外围三个相对稳定的等级。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西北欧和“西方衍生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四个英语国家；由于美国人口数量占这四个国家人口总数的绝大部分，“西方衍生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主要反映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1870 年，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大约占全世界人口的八分之一，但是占有世界经济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强，实际上拥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大部分剩余价值。

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占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但是仅占有世界经济总产值的五分之二，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外围地区。亚洲和非洲人民生产的大量剩余价值通过帝国主义的征服和掠夺以及不平等交换（在世界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外围国家用较多的劳动来交换核心国家较少的劳动）转移到核心国家，为核心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

南欧、东欧、俄罗斯帝国、拉丁美洲各大国、日本以及西亚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半外围。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相当于英国（当时的霸权国家）的 25-50%。半外围国家初步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但是在国内生产关系中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前资本主义的”或者“封建的”残余。

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陷入重大危机，帝国主义战争削弱了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

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资产阶级被迫对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一些让步。在这种形势下，半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前苏联、东欧、南欧、拉丁美洲各大国普遍实现了基本工业化和城市化；前苏联、东欧、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英国的 40-50%；南欧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英国的 80%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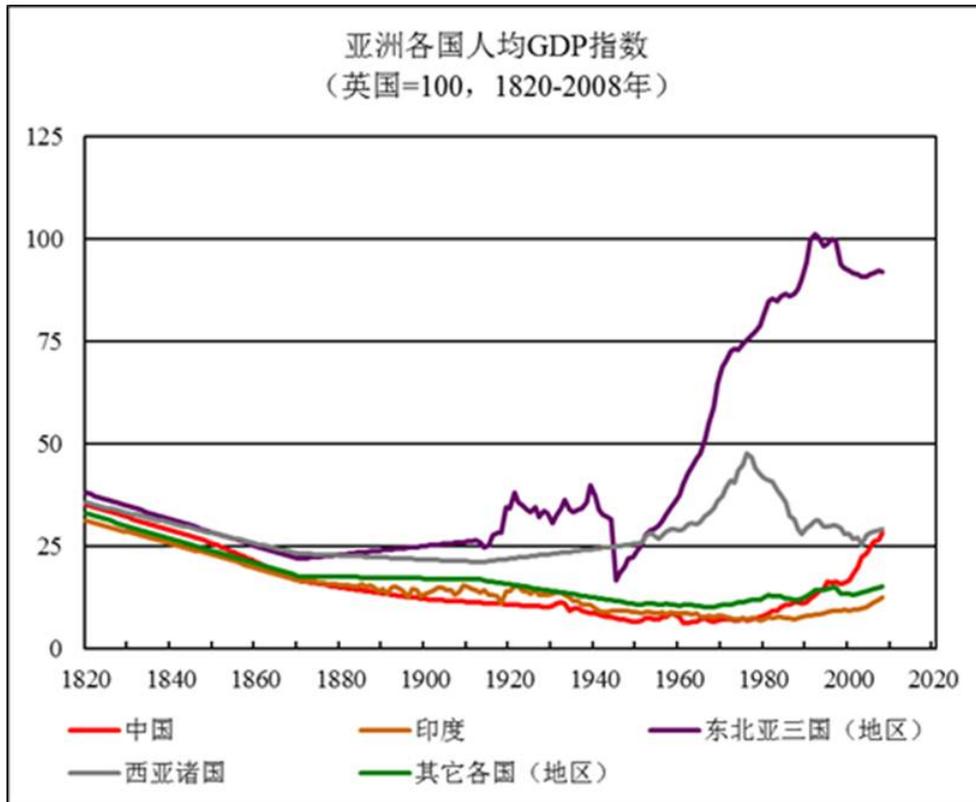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步，半外围国家的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要求有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权利。然而，无论是苏联和东欧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还是南欧和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都无法满足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与核心国家不同，半外围国家不占有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无法既满足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又确保将足够的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以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东欧、南欧和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开始高涨。智利一度出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形势。1974 年，葡萄牙爆发革命，推翻了统治葡萄牙数十年之久的法西斯独裁政权。葡萄牙革命胜利后，西班牙、希腊的法西斯政权相继垮台。

为了挽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世界资产阶级开始进行反扑。1973 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在智利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并且在军政府的铁蹄下开始推行以全面私有化、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反动政策。1979 年，撒切尔在英国上台；1980 年，里根在美国上台。以此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开始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政策。

到了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的债务危机爆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逼迫下，拉丁美洲国家被迫实行所谓“结构调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趁机“与时俱进”，一边大搞所谓“休克疗法”（所谓“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一边大举侵吞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工业化形成的巨额全民资产，摇身一变成为资产阶级新贵。经过几十年建设的社会主义工业毁于一旦，大批劳动人民沦为赤贫。

为了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除了向核心地区和半外围地区的工人阶级发起进攻以外，世界资产阶级还必须寻找大批新的廉价劳动力供应来源。只有有了大批新的廉价劳动力，并且将这些廉价劳动力投入资本积累，才能使得世界范围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对世界资产阶级有利的根本变化，恢复并提高世界范围的利润率，重启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图三比较了自 1820 年以来中国和亚洲其它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情况。



图三 亚洲各国人均 GDP 指数（英国=100，1820-2008 年）  
（数据来源：麦迪逊，《世界经济历史统计》）

如图所示，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1820 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相当于英国的三分之一；到了 1870 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下降到英国的六分之一。甲午战败，东亚贡赋贸易体系彻底瓦解，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下降到英国的十五分之一、美国的二十分之一，沦落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外围国家。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不断外围化的过程，就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危机的实质。

中国革命胜利后，经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稳定了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制止了外围化。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在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中国发展起了庞大的出口制造业。到了 2008 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上升到大约相当于英国的四分之一、美国的五分之一。中国进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半外围的行列。于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就要开始面对各自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按照楼继伟先生的理解：“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1050 美元到 12470 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 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 8000 美元，如果按照年均 5% 的增长速度，只要再经过 10 年的时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可以顺利地越过楼

继伟部长所规定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上限。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则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 14000 美元，已经进入楼继伟部长所展望的安全地带了。既如此，忧从何来呢？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要具备社会科学的意义，就决非仅仅是一堆孤立的、机械的美元数字。1820 年时，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700 美元（按照 1990 年不变美元计算），足以让英国成为当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霸权国家；而在 2008 年，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按 1990 年不变美元计算）“高达”3000 美元，印度仍然不过是一个“发展中”的外围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一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在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不同的等级地位相联系时，才有着相应的社会科学的意义；就是说，才能够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及该体系的各个不同地区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方面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提供一定的指示信息。

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动规律来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本质上是半外围陷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中心在核心地区。但是为了充分利用世界其它地方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往往还要求核心地区以外的一些国家积极参加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这些国家，就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围地区（与基本上不参加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外围地区相区别）。当半外围地区的资本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势必产生一个比较强大的工人阶级以及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能力组织起来，要求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权利。由于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与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相比处于劣势，不掌握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无力赎买工人贵族、实行“劳工新政”，这就必然导致半外围国家阶级矛盾的激化以及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半外围地区就始终是世界阶级矛盾的中心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动荡的地区。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早期，南欧、中欧、北欧构成了以西北欧为核心的欧洲经济体系的半外围。到 1850 年，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分别是英国的 50-60%、西北欧国家平均水平的 60-80%。1870 年德国统一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最后一轮大规模的殖民扩张，非洲被完全瓜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帝国主义国家提供了大量超额利润。在这个背景下，中欧和北欧开始了脱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进程，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多次工人起义以及纳粹德国的黑暗统治。一直到 1970 年，中欧和北欧的人均收入才赶上了英国的水平，完成了从半外围到核心的过渡。

到了十九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全球体系。俄罗斯、东欧、拉丁美洲、西亚相继进入半外围的行列。在整个二十世纪，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徘徊在相当于美国的 20-40%、相当于英国等二流核心国家的 25-50%的水平。从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当人均收入达到或接近英国 50%的水平时，是“中等收入陷阱”危险的上限。上世纪七十年代，前苏联、东欧、拉丁美洲、西亚纷纷在达到或接近这一上限时遭遇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日本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搭上了帝国主义的末班车。1905 年，日本在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战争中打败了腐朽的沙皇俄国，巩固了作为半外围国家的地位。此后，在整个二十世纪前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是变中国为自己的殖民地并在此基础上争霸世界。日本帝国主义的图谋因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被彻底粉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对抗新兴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帝国主义决定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并扶植南朝鲜和台湾当局。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日本、南朝鲜、我国台湾省得

以实现“经济起飞”。1970年以后，日本基本摆脱了半外围地位，加入了核心国家的行列（见图三，东北亚三国（地区）包括日本、南朝鲜和我国台湾省）。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资本主义复辟以后，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传统意义的工业化（工业产值达到GDP的40%，非农业产值达到GDP的90%，非农业就业人口接近全部就业人口的70%），城市化率也超过了50%。中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人阶级占到了人口的大多数，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也有很大增长。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力量日益增长，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对工人阶级有利而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逐年下降。这些趋势继续下去，只要五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就完全有可能起质的变化。中国现有的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将无法继续下去，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或者将导致工人阶级的严重挫败，或者将导致资产阶级的灭亡。

在有一个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即将陷入（或者已经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与以往各个国家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都不同。那就是中国的巨大的人口规模。在二十世纪中期，核心、半外围、外围地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大约是15%、15%、70%，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大约是50%、25%、25%。随着中国由外围上升为半外围，再加上人口分布的变化，核心、半外围、外围地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已经大致演变为15%、35%、50%，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大致演变为40%、40%、20%。中国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份额已经接近20%，如果中国的份额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倍，达到世界经济总产值的40%（从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半外围的上限），核心、半外围、外围地区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就将分别成为20%、60%、20%，建立在财富和收入高度集中于西方少数国家基础上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将坍塌。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资本主义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未来中国阶级斗争的结果也不会是简单地重复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前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的悲剧。当前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遭遇严重的资本积累危机时，他们的总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15%。由于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动员相当于世界劳动力总数五分之一的巨大的廉价劳动力队伍投入资本积累，从而使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克服二十世纪晚期的危机。

相比之下，如果中国资本主义在未来陷入危机，除了中国本身人口占世界人口20%以外，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中的中心作用，还完全有可能使得整个的半外围地区以及一部分外围和核心地区卷入危机。这样，就有可能在包括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广大地区造成革命形势。而在中国之外，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很难寻找到另外一块既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又具备有效资本积累所需要的其它各项条件的广大地理区域。由于这些全新的历史特点，未来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将完全有可能演变为中国资本主义乃至全球资本主义无法逾越的末日鸿沟。

属于二十世纪的社会改良主义“劳工新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样属于二十世纪的“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反革命时代就要落下帷幕了；真正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与世界工人革命的大时代就要开始了。

在这个即将开始的大时代里，中国工人阶级将要上演怎样的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活剧，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 关于“文革造反派”的几个问题

郭松民（2015年8月5日）

民骐同志：

你好！

感谢你的支持和通报的情况，完全赞同你对“文革造反派”的判断。我个人认为，文化革命过去是保卫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未来是重建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因此就必须总结第一次文化革命失败的教训。

在我看来，“文革造反派”对文革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他们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为走资派重新上台创造了机会，最后也导致他们自己被镇压，铸成了他们自己的人生悲剧。正如你指出的那样，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 “文革造反派”的问题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组织严重不纯，有大量严重敌视红色政权的人，以响应文革造反的名义混入了造反派队伍；

二、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思想严重，眼睛里只有个人利益、山头利益而没有阶级利益。即便是在文革搞得最好的上海，工总司中也有大量这样的人；

三、正是由于第二点，他们极力想垄断文化革命的解释权、话语权，于是就表现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把一切推向极端。你让他破四旧，他就去砸孔庙，你让斗走资派，他就搞打砸抢、喷气式。结果严重败坏了文化革命的声誉，也使他们自己陷入了极端孤立的境地；

四、同样由于第二点，他们分裂了文革大军，相互之间发展到了武斗的程度，迫使毛主席不得不动用解放军，以“三支两军”的方式重建社会秩序，导致反文革的林彪集团掌控了很大一部分文革领导权；

五、当毛主席去世，华-汪阴谋集团在北京发动政变后，他们又患得患失，畏首畏尾，坐看北京的文革领袖被一网打尽，自己也引颈就戮，束手待毙，毫无反抗能力；

六、80年代以后，面对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文革的恶浪，他们完全没有反潮流精神，不敢挺身而出为文革辩诬，反而以文革受害者的面目出现，说什么自己是上当受骗，以所谓“当事人”、“过来人”的身份为右派对文革的诬蔑做背书；

七、待到90年代后期，左翼力量重新出现在思想和政治舞台上之后，他们又开始进行新的政治投机，再次以唯我独左的面目出现。由于他们在主流话语平台上毫无影响力，于是便盘踞在左翼力量内部，大开钢铁公司、帽子工厂，专门背后捅刀子。左翼力量目前一盘散沙的局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文革造反派”的各种搅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文革造反派”当中也有不少优秀同志，这毋庸赘言。但文革造反派葬送了文革，如今又正在摧毁民间左翼力量，这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为今之计，我认为，第一，民间左派应该认真总结文革失败的教训，不把文革失败的教训总结清楚，重建社会主义的努力永远不可能成功；第二，“文革造反派”应该进行检

讨和反思。当然应该允许他们继续革命，正像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允许王明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继续革命一样，但不能允许他们不反思，也不能允许他们以唯我独革的面目主导民间左翼力量。

对“文革造反派”来说，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目前他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是通过自我检讨和反思，来为文化大革命洗去污水。

按照毛主席的设想，文化大革命是要“自下而上的揭露阴暗面”，毛主席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文革造反派”在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驱使下犯下的各种错误，又构成了文革的阴暗面，并最终导致了文革的失败。“文革造反派”应该有勇气把这个历史责任承担起来，而不是把这一切都推给毛主席。“文革造反派”如果能够做到这一切，历史会给他们应有的尊重，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这一切，那么等待他们的一定是历史垃圾堆！

祝好！

郭松民

2015、8、5

## 关于发表郭松民同志“关于文革造反派的几个问题”的说明

远航一号（2015年8月6日）

各位网友、红色中国网各编辑并路石同志：

今天，收到郭松民同志致李民骢同志的信。应郭松民同志要求，该信已经在红色中国网全文发表。这封信，是由我编辑发表的。作为红色中国网主编和本周值班编辑，我对于编辑工作中产生的问题，负完全责任。

中国现代的马列毛左派，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是在本世纪初开始的；以乌有之乡 2003 年成立为标志，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在此前后，又分别成立了毛泽东旗帜网、东方红网等马列毛网站。红色中国网的前身是中国工人网；红色中国网本身是 2011 年才成立的。

以上述网站为代表的马列毛左派，其客观上的群众基础主要是参加反私有化斗争的国企老工人、革命老干部、文革造反派群众以及一部分无产阶级化、边缘化的小资产阶级进步青年。其中，文革造反派群众在人数上占多数。上述马列毛左派团体在工人阶级中的基础比较薄弱。

在 2012 年以前，在马列毛左派内部就已经爆发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这些争论，有些属于原则性的，有些则属于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的。以 2012 年的政治风波为标志，上述马列毛左派各网站及其工作队伍，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严重冲击，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逐渐陷入低谷，其在群众中的影响，徘徊不前或者趋于下降。

与传统马列毛左派网站衰落局面形成对比的是，新兴的，主要由青年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新一代左派进步团体正在蓬勃发展。这些团体，有马列毛倾向的，也有其它马列主义倾向的或者一般进步倾向的，正在工人阶级和进步小资产阶级中稳步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建立起全新的阶级基础。

在这样的形势下，各个传统马列毛左派团体迫切需要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既包括上历史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也包括过去十多年斗争的经验教训；并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位置，为未来的阶级斗争发挥更大和更好的作用。

关于这些问题，我与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其他同志、与红色中国网的老领导路石同志都分别交换过意见。我们原来希望，在今后的一个时期，搁置左派内部的分歧，将主要精力用来发展现实的群众工作。但是，事物发展自有其难以违背的客观规律。有的马蜂窝，很想捅，又不敢捅；正在犹豫间，马蜂窝自己破了。硬着头皮挨蜇也好，点火烧马蜂也好，只有勇敢面对。

郭松民同志在信中，提出了若干严肃、重大的问题，涉及到如何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问题，也涉及到目前左派内部的分歧以及当前工作的方式方法问题。我认真阅读了郭松民同志的信，对于郭松民同志在信中所提各点，我或者完全赞成、或者基本赞成。

我个人认为，目前总的阶级斗争形势，对于马列毛左派是越来越有利而不是不利。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是工人阶级力量上升、资产阶级力量下降。左派正经历一个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过程。各传统马列毛左派团体的积极分子，只有看清这个形势，找到自己恰当的政治位置，用实际行动为左派的发展、为工人阶级的斗争而努力，扩大马列毛左派在一般群众中的影响，才能在将来为革命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否则，当革命大潮来临的时候，怕是连一个浪花也掀不起来。

以上都是我的个人意见。仓促之间，有不成熟、不正确的地方，欢迎各位同志批评。

## 周舵先生和马克思 —— 自由派没落时代的哲学和经济学

李民骐（2015年10月25日）

据闻，为了响应习主席关于“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员的最高理想”的讲话，端传媒邀请周舵、徐贲、洪振快等三位自由派领袖以五篇文章“证伪共产主义”（其中周舵先生一人就贡献三篇），据说港台地区传播甚广，读者争相传阅，云云。

如果按照自由派队伍里面的资历来说，周舵等先生属于我的前辈。自1989年以来，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各位先生，你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还是生活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个瞬间，还是陶醉于“历史的终结”，对于中国与世界大势的变化茫然无知。如果要比，今日之自由派，未尝不是在步上世纪八十年代斯大林主义遗老之后尘。

中国现代的自由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既不是真正地、完全地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不是如它自己有时所标榜的，是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这里专指城市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的利益。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由派曾经是强大的，你们曾经垄断着青年的思想，你们曾经那样接近权力中枢，眼睁睁地把机会错过了；你们那时虽然还不富裕，但是你们曾经是有理想、有激情、有献身精神的，曾经有些像当年的共产党人。后来呢，有的消沉了，有的被招安了，有的盲目地往体制的枪口上撞，有的做了资本家的食客、管家、御用文人，还有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海外的队伍早就瓦解了，国内的也多半被体制吸收了。今天，还有多少有理想、有抱负（而不是为稻粱谋）的青年在追随你们？

本世纪初以来，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在左转，已经成为内地在思想上、政治上最活跃的力量。对于马列毛左派在内地青年和一般群众中的实际影响，各位先生可有客观、可靠的估计？各位先生难道没有考虑过，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在这思想运动的背后是否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难道仅仅是因为今天的青年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就像当年的老共产党人责备青年向往资本主义是因为没有经历过“旧社会”？

二十多年前，空谈自由、民主、宪政（姑且不论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尚可属于天真。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仍然不进步吗？洪振快先生深为中共的合法性所忧虑。有朝一日，中共不“合法”了，中国就能够实现自由、民主、宪政了？今天受马列毛左派思想影响的青年数量这样多，整个社会这样脆弱，中国的工人阶级又如此庞大，并且眼看着越来越好斗、越来越激进，即便是城市“小资”也正在发展“仇富”的思想。

形势如此可虑，站在你们的立场，难道不揪心、不担忧？如何还会有闲情逸致来算“共产主义”的旧帐？

### 周舵先生的哲学

周舵先生是学哲学的，但是周舵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实在是大失哲学水准，完全是一堆花边新闻、道听途说、主观臆测的大杂烩，外加赤裸裸的歪曲胡说。从周舵先生的“批评”中，不但看不出周舵先生读过马恩列任何关于哲学的原著，甚至连上世纪中学哲学教科书的理解水平都达不到。

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还是宗教？》这篇“大作”中，周舵先生先是吹嘘自己如何师从“党内思想领袖”于光远学习科学哲学，然后在讲了经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以后，便是大批黑格尔的“唯理主义”，接下来笔锋一转，“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黑格尔的经院哲学式的幻想式‘方法’之上”，“他的研究方法、理论建构方法全然不是前面所说的科学方法，而是‘头足颠倒’之后的黑格尔主义——不论如何颠倒，其方法论的本质不变”。除了人身攻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式的恶意揣测之外，这差不多就是周舵先生对马克思哲学的全部“批判”。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为就是黑格尔主义，然后再借批判黑格尔来打倒马克思，周舵先生决不是第一家，并且恐怕还是最蹩脚的一位。

周舵先生讲到经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从问题出发，通过观察和实验搜集经验事实，运用归纳法和科学想象力，提出理论假设，然后用经验证据对从理论推导出的可观察现象做出验证，从而做出证实或证伪的结论。周舵先生在这里所概括的，应当说，基本符合现代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实践（对不起，这里要说“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请周舵先生不要激动，这丝毫不妨碍你“证伪”的自由）。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经验”？经验是依赖于人的主观的东西，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东西？如果说经验是主观的，我们怎么知道从经验证据中获得的理论是客观的或者说是科学的？如果说经验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变化的，科学又为什么会进步？新的经验证据与旧的经验证据之间为什么会发生矛盾？如果两者都是客观的，为什么一种客观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推翻另外一种客观？除了“科学共同体”的“范式”以外，还有没有更加深刻的原因？“科学范式”发生革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周舵先生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所谓“经验”就是人对于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的感知。如果同意，周舵先生是否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不同意，周舵先生是否承认自己实际上是唯心主义者？

周舵先生是否承认，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周舵先生是否承认，自然界在人类产生以前就是从来就有、一直存在的（列宁的问题）？如果周舵先生对列宁的问题做肯定的回答，周舵先生是否同意物质是本原、意识是派生的，人的意识不过是外部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如果是这样，科学是不是也是外部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一种反映？科学的真理性是不是取决于在一定时期的科学理论认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正确地反映外部的客观实际，而不仅仅是“经验”？

请周舵先生考虑，科学是怎样产生的？科学的产生，是不是人类的长期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等社会实践的结果？科学的产生，是不是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才有可能？如果是这样，周舵先生是否在事实上接受历史唯物主义？

人类科学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是单纯为了获得能够得到经验证据“证实”的理论假设吗？还是为了将科学理论运用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等广泛的社会实践？这些实践是不是又必然造成新的、大量的“经验事实”，从而反过来影响并决定科学的发展？在这个从社会实践、经验事实、科学理论，再到社会实践、经验事实、科学理论...的循环往复过程中，人类的认识能不能逐步地接近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实际？如果不是这样，周舵先生愿不愿意承认自己实际上是不可知论者？如果是这样，那么能不能说，人的正确认识实际上来源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等广泛的社会实践，并且要接受社会实践的再验证，从而通过大量相对真理的反复长期积累，逐步地接近并达到绝对真理？

如果周舵先生同意上述观点，周舵先生是否就同意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如果周舵先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那么，就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周舵先生达到对客观真理的认识来说，可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 周舵先生的历史哲学

周舵先生有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他在批判马克思的时候，既不愿意花时间阅读原著，也不愿意核对自己的道听途说、任意揣测有没有文献的根据和来源。

为了论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周舵先生列举了13项致命错误（周舵，《论证共产主义的马克思犯了哪些错？》）。其中多数属于无知的胡说，只有几项值得讨论一下。

在周舵先生看来，社会现象是非常复杂的，“比自然现象高出不知多少个数量级”（诚不知周舵先生是根据怎样的“经验证据”下了这么一个大结论），根本不可能有必然规律。

这里要向周舵先生请教一个哲学史上的著名问题：我们每天早上都看到太阳升起，连续一千次，那么是否就可以肯定地说，明天早上太阳必然第一千零一次升起？这是休谟的问题。休谟是个怀疑论者，就是不可知论者，用这个问题来说明不存在必然规律，或者仅存在周舵先生所说的“概率统计”意义上的规律。

但是，现在只要稍有天文学常识的人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明天早上太阳必然升起。这是因为，太阳明天早上升起，只不过是地球每天完成一次自转在视觉上产生的现象。休谟不能回答为什么太阳必然升起的问题，是因为他只是“知其然”（太阳在过去每天早上升起）而“不知其所以然”（地球每天自转一次）。“然”与“所以然”的关系，就是事物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社会现象虽然复杂，但是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因而也都有一定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这些本质性的社会关系规定着一个社会的基本性质，这个社会的基本性质又规定着它运动、发展、变化的一般特点，也就是规律。比如，周舵先生坚定地认为，人类争取建设共产主义的尝试必然失败，这就是周舵先生根据自己所认定的人类社会本质特点总结出的“必然规律”。再比如，周舵先生很有信心地判断，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仍然要无休无止地为了争夺“优质异性”而展开斗争，这又是周舵先生根据“人永远是动物之一种”这一本质特征总结出的“必然规律”。既然周舵先生连在现实世界中尚未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规律”都能够总结出来，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根据现存和以往社会的本质特征总结出它们的“必然规律”呢？

周舵先生关于必然性有另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如果社会进步是必然的，如果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为什么还要搞阶级斗争，还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人都是要死的，但是没死的人还是要继续生活。周舵先生没有吃长生不老药，周舵先生正在必然地、无可挽回地走向死亡，但是周舵先生今天还是要喝水吃饭睡觉休息，维持新陈代谢。

资本主义是必然要灭亡的，现实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死亡。但是，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一天，无产阶级就要被压迫、被剥削一天，无产阶级就必然地（不以周舵先生意志为转移的）要进行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无产阶级为了争取自己活得好一些而斗争，这是符合自由民主精神的，应该是周舵先生所赞成的。无产阶级必然为了自己活得好一些而斗争，这也是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过程的一部分。

## 周舵先生的经济学

周舵先生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一把单刃的剪刀，只有供给理论，没有需求理论”。实际上，马克思的“经济学”比周舵先生所说的还要糟。马克思只有“政治经济学”，没有“经济学”，并且既没有“供给理论”，也没有“需求理论”，而只有价值规律。

说到这里，周舵先生一定会抢白：“有充分证据证明”，庞巴维克已经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彻底驳倒了。想来周舵先生对于庞巴维克之后所发生的经济思想史已经一片茫然，更不曾追踪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转形问题”的讨论。或许理解转形问题所需要的数学十分复杂高等，周舵先生力不胜任。

周舵先生身临其境般地描述：“主流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出现之后，马克思完全傻掉了”。周舵先生是否知道，后来爆发了“两个剑桥的论战”，主流经济学的萨缪尔逊完全傻掉了，因为论战的一方从逻辑上论证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同时定义并测量资本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而不陷入循环论证或者导致类似于利率上升而资本密集度反而上升（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如果利率上升，资本密集度应该下降）一类的自相矛盾的结果。萨缪尔逊不仅傻掉了，而且公开承认论战失败。在经济思想史上，论战双方中的一方因为逻辑错误而被迫承认自己论战失败，这是唯一的一次。

“两个剑桥的论战”之后，整个“边际革命”的逻辑基础都不存在了，马克思还会傻掉吗？

##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自由派的投降

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一切人类社会都是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产生、存在、发展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决定一个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发展的最重要的历史条件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历史条件，决不会固定不变，而必然不断地发展变化。当一个社会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变化到一定程度，就不可避免地要与现行的社会制度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只能以已经不适应历史条件的、旧的社会制度灭亡，代之以新的社会制度来解决。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一切社会制度都是历史性的，因而一切社会制度都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存在和发展，永恒不变的社会制度是没有的。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定的社会制度，它同样要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才能存在和发展。自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取得全球统治地位以来，资本主义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乃至根本的变化。

仅举一例，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由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规模有限，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总的来说是有限的，即使爆发环境危机，也仅仅影响到个别的地理区域、个别的文明。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本无限积累的倾向，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爆炸式增长，从而导致世界资源迅速枯竭、环境全面破坏，气候变化危机标志着全球生态系统濒于崩溃。周舵先生既然引用了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或许也知道，罗莎·卢森堡的另一句名言，资本主义之后，“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资本主义可以不灭亡吗？如果出现了下述三种情况之一，资本主义或许是可以不灭亡的：（A）资本主义不是一种社会制度；（B）资本主义可以不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存在；（C）资本主义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可以完全静止下来，不再发展变化。

人总是要死的，一个社会制度也总是要死的。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资本主义，总是要死亡的。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中国的自由派朋友们，你们何去何从呢？是向社会主义投降，还是向野蛮投降？

李民骐

2015年10月25日晨于美国盐湖城

##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理论和统计问题 —— 与阳和平同志探讨

远航一号（2015年10月29日）

近日，阳和平同志就某组的第一次和第三次讨论写了两篇商榷文章。这两篇文章的内容很丰富，涉及当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过去几年的工作和斗争中，我和阳和平同志产生了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在阳和平同志近日的文章中也有所反映。阳和平同志的文章涉及的具体问题很多，短时期内不便一一讨论，现仅就其中几项初步说明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为今后进一步讨论创造一些条件。

###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及其与阶级社会产生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基本问题。正确理解和认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是否能正确总结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而且对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巩固和发展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阳和平同志有这样一些看法：

虽然社会职能分工是阶级产生的基础，也就是阶级的出现必须有分工，分工是阶级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反过来认为只要有分工就有阶级（秋石客的理论）是荒谬的，因为分工不是阶级存在的充分条件。阶级产生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力水平相对的低下，劳动的异化。但是，**即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社会职能分工只会更加细化**，比如不是人人都可以轮流从事心脏外科手术。只不过那时候的分工不再是约束人全面发展的制约条件，分工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个人兴趣和特长的基础上的，一人可以多能，且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以后的事情[引注：“且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以后的事情”，原文如此]。

在这里，主讲人不光是犯了一个明显的逻辑上的错误，而且像似把因果关系也给颠倒了。虽然“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基础不是原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这才是阶级存在的根本原因，而非脑体分工。我认为阶级和脑体分工都是一定生产力水平的结果，不是原因。分工只是给阶级的产生提供了一个“自然”的渠道，就像资产阶级的产生起先就是在手工作坊的师傅身上“自然”地出现一样。

阳和平同志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社会职能分工只会更加细化”。笔者学识有限，孤陋寡闻，想不起来在经典著作中有任何这样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倒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论述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分工的不断细化，如何成为资本家控制工人劳动的手段。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关于“分工”的定义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

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也就是说，分工是指，一定的社会集团专门从事“一定的特殊的活动”。所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所产生的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专门从事以生产物质产品为目的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少数人得以从体力劳动中摆脱出来，而专门从事可以概括为“脑力劳动”的各项活动。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是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只要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分裂为阶级。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发明创造，也不是我独出心裁的“解读”，而是马克思、恩格斯从青年到老年一贯的观点，也是后来为世界上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除了历史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以外）。本来是不应该有争议的。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 因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 ... 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明的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

阳和平同志引用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论断：“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然后，阳和平同志马上就说：“这才是阶级存在的根本原因，而非脑体分工。”

阳和平同志，在这里，你为什么不完整地引用恩格斯的论述呢？任何一个善于思考的读者，孤立地面对上面这段话，都不可避免地要思考：为什么只要是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只有少量剩余”、“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对此，恩格斯是这样说明的：“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显然，被阳和平同志省略的这一段话，是与“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密切联系的；离开了被阳和平同志省略的这一段话，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为什么“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

恩格斯这里讲的，“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首先就是这样的划分，一方面是“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想必阳和平同志不会认为，这“大多数人”专门从事的是脑力劳动吧？），另一方面是“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

显然，在恩格斯看来，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同时也是这样一个阶级，它是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同时又掌管着“社会的共同事务”，后者包括“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什么是“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呢？什么是所有这些活动作为人类实践的共性呢？除了脑力劳动，还能是什么呢？这里说的脑力劳动，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精神劳动”，就是人类通过思维活动来总结、概括对自然界和对社会的认识并反过来试图指导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恩格斯在这里采取的是列举法，后面还特意加了“等等”，以免由于个别的遗漏而引起歧义。

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根据《反杜林论》有关章节改编的。在《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四章中，恩格斯是这样表述的：“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当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的时候，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

恩格斯在这里的论述很清楚，“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之所以“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正是因为，在“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条件下，“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这里，“实际劳动的人口”显然就是上述的“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而与他们相对立的，是从事“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请注意，恩格斯在这里提到了“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恩格斯明确地讲，当存在这样的条件时，“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

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

恩格斯并且明确说明了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同时也是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条件：“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它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

阳和平同志强调，分工仅仅是阶级社会产生的“基础”，而非原因。请问阳和平同志，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不是从形式逻辑的观点出发，“基础”和“原因”的差别何在？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我们解释一定的社会关系之所以存在，是不是要从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那里寻找原因？

阳和平同志认为，分工仅仅是“阶级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不能认为，“只要有分工就有阶级”，据说这是荒谬的，还是秋石客的观点。从字面意义上来说，阳和平同志的观点是，分工是阶级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那么，首先，请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在什么著作中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除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以外的阶级社会产生和存在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并且是关于人们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的）？经典作家们在什么著作中设想过，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形成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却不会产生阶级社会？经典作家们是否曾经设想过，在未来，即使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却不能消灭阶级社会？按照阳和平同志自己所说的字面上的逻辑，分工是阶级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否就意味着，只要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就必然可以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阳和平同志和我都同意，未来的无阶级社会要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度发展为前提。那么请问，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高度发展的结果，不是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创造条件，不是造成恩格斯所说的“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又如何才能实现使“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成为多余？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问题，阳和平同志还有这样的担心：“把脑、体分工看成是阶级对立的根源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误解，好像是说资产阶级从事的是脑力劳动。我想主讲人的原意不会是这个意思。”阳和平同志不必担心，认为资产阶级从事脑力劳动，这不是误解，而是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如上所述，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同时也是掌管着“社会的共同事务”的阶级，是从事“例如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的阶级，也就是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是剥削

阶级、统治阶级，所以资产阶级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并协助资产阶级完成剥削和统治职能的阶级）。

认为资产阶级从事脑力劳动并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与同时认为资产阶级剥削、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以及由剩余劳动所生产的社会剩余产品，决不矛盾。恰恰相反，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正是因为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仍然要依赖资产阶级来从事某种“社会的共同事务”，才能真正解释为什么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能够持续到现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反之，不承认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不承认“少数人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绝大多数人发展的条件，而试图用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以外的原因去解释阶级社会的产生和存在，便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也就是恩格斯所批判的杜林的观点。

### 关于资产阶级的数量规模

在讨论中国资产阶级的数量规模时，阳和平同志有这样一段话：

看来主讲人并没有把国有资本集团的成员看成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虽然他口头上承认资本主义早已在中国复辟，但是他像似把掌控国家经济命运的国有资本集团成员排除在计算资产阶级人口以外。就“中国资产阶级有多少人”他给了两个估计。第一个估计是基于官方统计的，“包括一些小业主”在内的“城乡私营企业投资者”约为 2500 万人。“第二个估计是基于平均资本家占有固定资本量。他说：中国“全部固定资产的总数大概是 180 万亿。如果国有资产占其中三分之一，全部私有资本加起来是 120 万亿左右。”而且“假如每个资本家占有的固定资产是 1000 万，那么就有 1200 万个资本家，加上配偶，就是 2400 万人。”估计来估计去，国有资本集团的成员都不在内。

按照他的估计，“大概中国资产阶级的规模不会超过人口的 3%。”官方 2005 年的 1% 人口抽样调查，“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一项占全国就业人口的 1.5% 以上（见该统计图表 5-3）。两者的估计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官方起码在这里一视同仁地把国有资本和私企的负责人归在一类，且注重“国家机关”这一项（预计尚待发布的 2015 年的抽样报告变化不会太大）。

说“主讲人并没有把国有资本集团的成员看成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帽子不小。

阳和平同志的逻辑是，主讲人仅仅计算了私人投资者的数量以及非国有资本的数量，而没有包括国有资本集团的成员，于是就犯下了“把掌握国家经济命运的国有资本集团成员排除在计算资产阶级人口以外”的重大原则性错误。今日中国，到底是谁“掌握国家经济命运”，是所谓的“国有资本集团”，还是跨国公司、出口制造业资产阶级以及一心想要私有化的官僚买办资本集团，这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进一步讨论。这里只是请阳和平同志考虑一下，在进行统计研究时，是不是需要将一定的理论概念转化为一定的统计概念？为了某些非正式的学习和讨论的目的，在考虑到合理误差的前提下，是否可以允许人们对某些统计指标进行粗略估算？中国现在的“国

有资本集团”成员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都拥有大量的私人财富，从而是否直接或间接拥有大量的私人生产资料？如果是这样，在统计私人投资者或者私人所有固定资产时，是否客观上已经包含了绝大多数的“国有资本集团”成员（况且主讲人还考虑到了“配偶”）？

就以阳和平同志提供的统计数据来说，“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据说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5%。“城乡私营企业投资者”约占全国就业人口的3%。两者相加，占全国就业人口的4.5%。但是，“城乡私营企业投资者”中有一部分是“单位负责人”，所以与“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有所重叠。“城乡私营企业投资者”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小业主。如果扣除这两项误差，与主讲人所估计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规模不会超过人口的3%”，是否就相去不远了呢？

阳和平同志还有一个意见，就是在计算小业主时，不仅要计算城镇小业主，而且要计算乡村小业主。这个意见，我认为是正确的。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中国城镇个体劳动者约为6100万，乡村个体劳动者约为3200万，合计9300万，占当年经济活动人口的12%。

### 关于小资产阶级和小业主

在第三次讨论中，主讲人重点讲了现代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小业主之间的差别。这是主讲人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结合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长期观察和体会的结果。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需要一批在形式上是雇佣劳动者、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政治统治、经济管理、技术创新、意识形态再生产等职能。由于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如公务员、经理、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医生、律师、演员、作家、艺术家等——以上仅为列举的目的，非理论“定义”，特此说明）从事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再生产至关重要的职能，因而享有相对于一般工人阶级的显著的物质特权，从而构成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小资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其独立的阶级利益，有鲜明的经济和政治要求，是一支政治上活跃的力量。

另一方面，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小业主（形式上占有生产资料、主要靠自己劳动为生的劳动者）的实际社会经济状况与无产阶级接近，甚至还不如无产阶级。在近年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阶级斗争中，都不再是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也没有独立鲜明的阶级利益。硬将已经失去政治活力的小业主与政治上十分活跃的现代城市小资产阶级扯在一起，顽固地抱着十九世纪的一些阶级概念不放，除了追求繁琐的经院哲学以外，于现实阶级斗争没有任何帮助。

在讨论决定小资产阶级和小业主收入水平的因素时，阳和平同志竟然用起了“人力资本”的概念：

我们能否借用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所谓“人力资本”的视角来看这一问题？比如，高级知识分子虽然可能不拥有有形的生产资料，但是他们的收入好像并不能完全的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解释，即便是复杂劳动，... 可能很大一部分应该是对所谓“人力资本”投入的回报。就像小业主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可以获得不仅仅是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是自己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一样（在不考虑垄断资本的存在条件下），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更可能反映了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劳动力的价值。

如果这样的分析站得住脚的话，那么这些“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差别就比较客观了，就不仅仅是收入上的差别了。那些“城市小资产阶级”确实拥有无形的“知识资产”，因而他们才是小资产阶级。其实所谓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小业主应该都是小资产阶级，只不过是收入的高低罢了。他们收入的来源是一样的：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价值以外，他们的收入有较大的成分来自于个人资本的回报，也就是自己占有了自己的剩余价值。他们收入的差别在于他们所创造的价值不同。

在上面的论述中，阳和平同志先是设想“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是“对所谓人力资本投入的回报”，后面又说，“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反映了“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阳和平同志难道没有认识到，无论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这两种说法都属于自相矛盾、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如果阳和平同志认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等于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那么还需要人力资本理论吗？如果阳和平同志认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是他们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投资收益，那么还需要劳动价值论吗？

简单地说，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收入就是由他们在一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劳动力价值”所决定的。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价值早就不再受生产绝对生活必需品所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限制，而是主要取决于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道德的因素”，也就是说，主要取决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至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劳动力价值，在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所决定的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还要加上资产阶级所给予他们的“忠诚租金”，以反映他们较强的谈判能力。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半外围国家，还要考虑到，由于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小资产阶级劳动力市场趋于统一，中国国内小资产阶级的劳动力价值有向着核心国家小资产阶级劳动力价值趋同的趋势。

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不同，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小业主的劳动收入，完全是由另外的经济规律决定的。让我们还是从小业主收入这个“量”的方面来观察一下这个问题。据阳和平同志说，这是“非马列毛主义的方法”。确实，货币收入本身是一个“量”的指标，不是“质”的指标，属于现象，而非本质。但是，现象是本质的反映，而本质只有通过现象才能存在、才能起作用。我们只有透过现象，才能认识本质；反之，再好的关于“本质”的理论，如果解释不了现象，就是浪费人们的时间和精力，而浪费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是最大的犯罪。这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

那么，关于小业主的现象是什么呢？据 2014 年《中国统计年鉴》，2013 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中“经营净收入”为 2797 元；当年中国城镇人口总数 7 亿 3111 万，于是可得中国 2013 年城镇“经营净收入”总数为 20449 亿元。所谓“经营净收入”，在资产阶级统计中，指的是所有非公司在扣除各项成本以后的纯收入，主要包括小业主收入，但是也包括一些中小资本家的利润。也就是说，“经营净收入”总额会高估城镇小业主的实际总收入。

2013 年，中国城镇个体劳动者总数为 6142 万人。所以，当年，中国城镇个体劳动者的人均经营净收入估计为 33294 元（可能高估）。当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含国有、集体、股份制、港澳台、外商投资等单位）平均工资 51483 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32706 元。也就是说，城镇小业主的平均收入显著低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也只是大体相当。

这如何来体现“小业主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可以获得不仅仅是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是自己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呢？阳和平同志确实加了一个括号（在不考虑垄断资本的存在条件下）。也就是说，在“垄断资本”存在的条件下，小业主就得不到“自己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了。那么，小业主的收入又受什么样的经济规律支配呢？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是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规律总结的产物，而不是强加于经济现实的一个主观、先验的概念符号。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在世界各地曾经普遍存在主要由大量小生产者组成的商品经济，即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商品经济”。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小生产者之间的相互竞争，客观上会产生“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经济规律，从而使得小生产者的收入在长期平均条件下与劳动创造的价值大致成比例。简单地说，也可以说小生产者得到了他们自身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发生变化，价格不再直接围绕价值波动，而是围绕“生产价格”波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转形问题”（相关政治经济学问题，此处不详述）。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运行中，生产价格相对于价值的偏离在数量上并不是很大，所以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也可以将生产价格作为近似价值。

在资本主义企业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差不多所有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行业都被资本主义企业全面占领，手工业作坊（除了少数服务于旅游业、奢侈品等特殊需要外）已经基本不存在，农业以外的小生产退居于餐饮业、旅馆业、修理业、零售业等领域。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经济波动中，大量失业半失业工人被抛出了就业队伍，暂时或永久地退出了资本积累所需要的雇佣劳动过程。这些失业半失业工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为了谋生，会利用自己的积蓄或者向亲友筹借，置备一些“生产资料”，开始自己“创业”。这些“创业”

工人，除了极少数能侥幸上升为资本家，还有一部分会破产沦落为城市贫民以外，绝大多数只不过维持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

在这样的条件下，城市小业主的收入水平根本不可能由他们自身所创造的劳动价值来决定，而主要是由城市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价值所决定，甚至于城市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价值还会规定小业主收入的上限。这是因为，如果小业主的收入超过了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资，就可能吸引大批城市工人改行“创业”，“自己给自己干”，增加某些城市工人暴发为资本家的幻想。这样，大批城市工人涌入小餐馆、小旅社、小商店、小修理铺等行业，会导致这些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很快降低到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资以下。

另一方面，当小业主的平均收入下降到城市工人平均工资以下时，原则上，小业主可以选择变卖家产，改行当工人，这样会增加普通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压低城市工人的工资；同时这些原小业主改行当工人以后，会减少某些行业的商品供给，从而提高这些行业的小业主收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大量的小业主舍不得抛家舍业，不能轻易放弃“创业”的幻想，这样小业主的平均收入就有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在城市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价值以下。

上述讨论说明，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小业主的收入水平各自分别由不同的经济规律决定。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因而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

在近日的两篇文章中，阳和平同志还就毛泽东时期社会性质、当前阶级力量对比、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帝国主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所涉及的问题多且复杂，受篇幅所限，本文暂不探讨。希望以后随着讨论的深入，再逐步展开。

## 阶级斗争、经济危机和马克思主义 —— 与阳和平同志再探讨

远航一号（2015年11月22日）

阳和平同志撰写的长文“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源”已经发表了。这篇文章，是阳和平同志为了批判以“现代世界的革命和反革命”为题的某马列毛学习小组讲座而专门撰写的。为了批判这组系列讲座，和平同志已经写了三篇文章。看来和平同志还会继续写下去，将有限的精力耗在无尽的争论中。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吧。

为了写这篇文章，和平同志很用心，查了不少资料，编制了许多图表，专门设计了数学模型，正文以外，还不辞辛劳地逐句逐段点评。甚是辛苦。我的精力不如和平同志充沛，时间也确实有限，琐事缠身，就拣一些主要的问题扼要地谈谈我的看法。

###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

阶级社会为什么产生？阶级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是什么？阶级社会消亡的历史条件是什么？这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对于我们正确总结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教训、探索新的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乃至走向共产主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这些问题，本来，经典作家是给了明确答复的。那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一方面，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社会剩余产品出现并显著增加，另一方面，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仍然不得不用他们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的时间来从事生产必需品的劳动，而只有少数人能够从这种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得以从事宗教、社会的公共管理以及科学艺术等活动，于是就产生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在这种分工的基础上，专门从事宗教、公共管理、科学、艺术的少数人得以将自己从事的本来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职能转变为剥削和压迫的特权，逐渐成为社会剩余产品的独占者。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产生及存在条件的观点。

这些基本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一贯的观点，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明确阐明的观点，也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特权官僚集团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经验所证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从斯大林开始，官方马克思主义对于经典作家的一些基本观点采取了阉割、掩盖的做法，从而官方教科书（如关于“社会发展史”的教科书）很少谈关于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分工的问题。尽管如此，经典作家这些基本观点的本来面貌原本是不难恢复的。

和平同志先是否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是阶级社会产生的物质基础。经过反复讨论，和平同志总算承认“如果主讲人把...改为‘只要存在着[奴役般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强迫]分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分裂为阶级’，我们就没有分歧。”阳和平同志说，我们所应该反对的只应该是“基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所迫的分工”，而不应该反对“基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自愿的分工”。据说，“只有通过专业化的，同时又是随着个人的特长和爱好进行的分工，人类才能克服这一矛盾。因而专业化必将是越来越细。”在第一次“商榷”文章中，和平同志这样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有的人就是喜欢从事体力劳动，喜欢种菜、养殖，有的人就是喜欢写作、编程。就像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那样，那时候的人们就会是亦工亦农，亦脑亦体，但是有主有副，只要所从事的工作不是谋生手段，而是兴趣和特长所在即可。”

和平同志，你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还是历史唯心主义者？如果你是历史唯物主义者，那么请问，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大的、重要的分工，有哪些不是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你所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是属于“生活所迫”。这不仅在阶级社会中是如此，在阶级社会以前的原始社会中，更是如此。原始社会中，人们按照性别和年龄而分别从事采集和狩猎的生产活动，不是因为兴趣爱好，而是生存的必需。

在和平同志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据说，人们可以按照“兴趣和特长”进行自愿的分工，而且分工还“越来越细”。和平同志，人们的“兴趣和特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还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以及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呢？如果许多个人的“兴趣和特长”与社会需要发生了冲突，又怎么解决呢？如果全世界有一亿人喜欢种菜，而合理的社会需要只需要一百万人，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如果世界上需要一百万人从事掏大粪的工作，而仅有一千人自愿报名，这个矛盾又怎么解决呢？

和平同志，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部分第四章中下面的论述：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只要实际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

和平同志，你同意不同意，阶级社会消亡的前提是“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无论他们爱好与否〕，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同样也无论他们爱好与否〕。”如果不是这样，不难设想，社会的少数人会以自己拥有管理社会的“特长”为借口（既然是专业化并且还越分越细，他们的“特长”自然就更加难以替代），并且他们对于“治人”而不是“治于人”自然是“爱好”的，从而将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排斥在“社会的公共事务”以外；而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不仅只能满足于体力劳动、物质生产劳动的“特长”，并且既然已经越分越细，在本“专业”之外，怕是也没有什么别的“特长”，从而除了“爱好”已有的“特长”以外，恐怕也不便再有别的爱好。

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防止那个拥有管理社会的“特长和爱好”的特殊阶级，不为了它自己的利益，而“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呢？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的官僚特权集团，不就是这样产生的吗？

## 阳和平同志的“生产过剩”危机观

阳和平同志用其文章的整个的第二部分来论证“生产过剩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阳和平同志对于资本主义积累和经济危机的认识，是很粗糙的，甚至可以说是肤浅的。

阳和平同志在第二部分开头便讲“任何一个社会的所有产出，就其使用价值来讲，最终都是要被消费掉的。”阳和平同志，即使一个人没有读过《资本论》第二卷，就是从常识出发，也应该认识到，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为了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必须将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用于替换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所消耗掉的生产资料。这部分社会产品，是不能被“消费”掉的，如果被“消费”掉了，社会就不复存在了，人类就要灭亡了。

接下来，阳和平同志试图论证，一方面，资本家有使生产不断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家又要努力压低工人的工资，从而限制了工人阶级的消费，当产出与消费之间的剩余不能被资本家的投资吸收掉的时候，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就无法在市场上“实现”，于是就必然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阳和平同志的这段论述，虽然有些紊乱，不算有太大的问题，基本上反映了消费不足危机倾向的思想。接下来的发挥，则更多是阳和平同志个人的思想了。

在阳和平同志看来，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虽然不能“克服”，也不能“消除”，但是可以“缓解”，还可以“推迟或转嫁”。据阳和平同志说，“缓解生产过剩危机”有好几个办法：可以通过资本输出，可以通过“新科技”，可以通过自然灾害，还可以通过战争，资产阶级国家还可以通过财政赤字来购买过剩物资。

如此说来，阳和平同志费力论证的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的“生产过剩”，实在也没什么可怕。无论什么样的生产过剩，资产阶级的兵器库里随时存着好几样武器，想用哪件就用哪件，无论什么样的“生产过剩”都不难“缓解”。

虽然阳和平同志也说，资产阶级防止“生产过剩”的办法，“虽然防止了经济的大起大落，暂时的推迟了危机的到来，但会使得将来的产能更加过剩”，并且还做了预言：“在这些强心针的刺激下美国的经济看上去是‘复苏’了。但是，下一次经济危机来临时（它必然要到来，且有迹象快要到来），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去缓解经济危机？”

如果是单纯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而没有其它方面的矛盾），无论是资本家还是资产阶级国家，只要有办法增加开支，就可以使危机得到克服，达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稳定。阳和平同志所推荐的几种兵器，资产阶级都可以用。既然这些方法，资产阶级过去几十年、上百年都一直在用，阳和平同志又没有论证出有什么新的理由、新的历史条件使得这些方法不再能够被使用，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仅仅几年之后，美国资产阶级就没有“办法”了呢？如果危机可以反复地、无休止地“推迟”下去，可以任意地“转嫁”，还可以反复地得到“缓解”，那么“危机”还成其为危机吗？

即使按照阳和平同志所说，为了“缓解”产能过剩而采取的各种办法，会使得“将来的产能更加过剩”（根据呢？），无非是把资本更多地输出，实行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更多地印钞票，再发明几件“新科技”。实在不行，按照阳和平同志的观点，还可以发动战争吗。在针对第三次讲座的商榷文章中，阳和平同志不是说：“战争和地震类的自然灾害对资本的破坏造就了新的投资机会，发现新大陆和新技术也都会为资本创造新的投资机会，从而拯救而不是埋葬资本主义。同样的，生态危机也可能拯救而不是埋葬资本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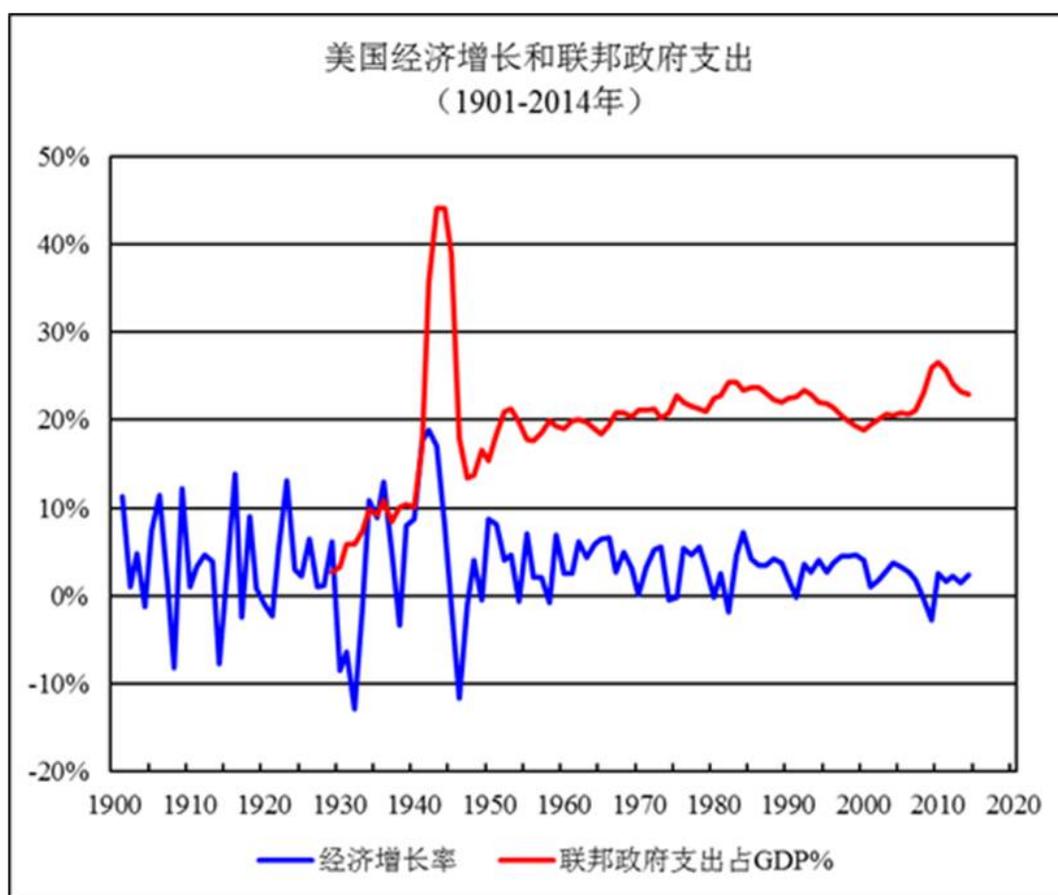
既然如此，无论什么天灾人祸，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都是天赐良机，哪里还会灭亡，资本主义可以万万年了。

## 阶级斗争和经济危机

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问题及其与当前中国、世界阶级斗争的关系，我在另外的场合有所论述，并有专著。此处不再赘述。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典型形式确实是主要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以及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生产过剩的危机。由此引起的经济危机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剧烈波动和大萧条。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大加强了国家干预，同时福利国家制度、工人工资的提高客观上也起到了提高和稳定有效需求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幅度大大减轻了，经济衰退的深度也普遍小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以美国为例，图一比较了美国自 1901 年以来历年的经济增长率和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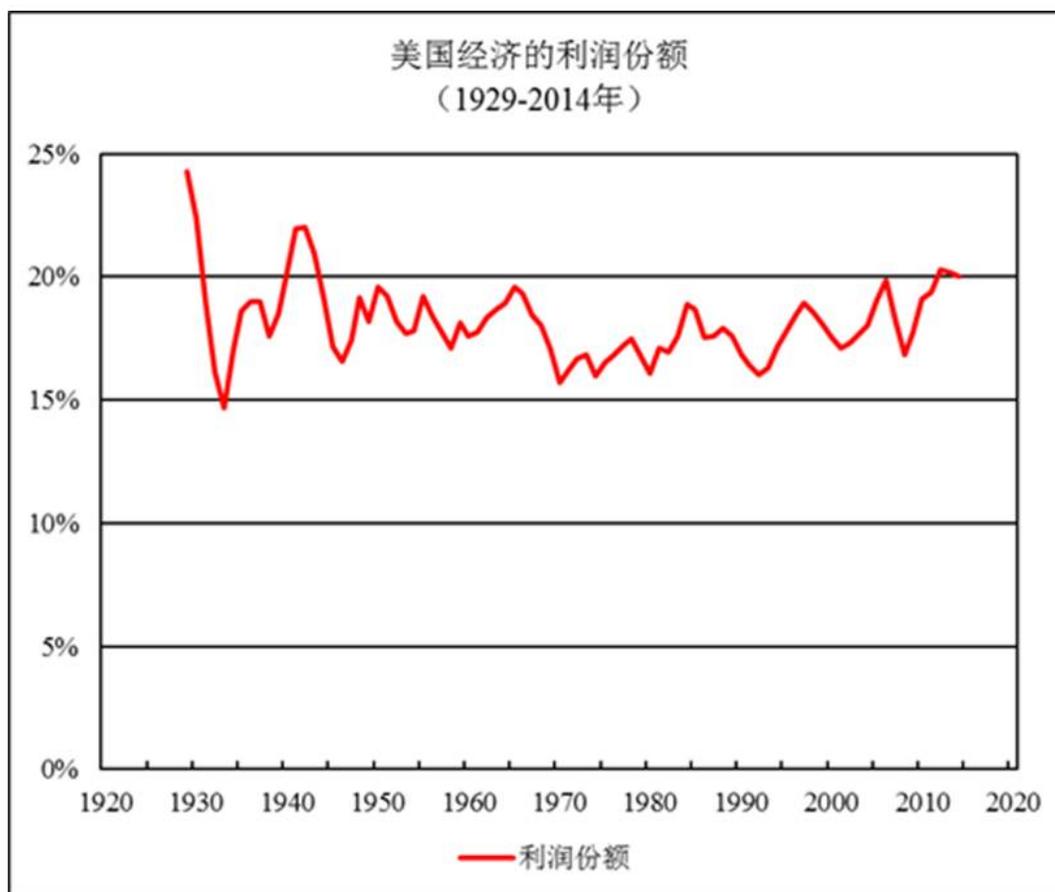
图一 美国经济增长和联邦政府支出，1901-2014年  
[本文所用统计资料主要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

如图所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经济剧烈波动；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波动的幅度总的来说变小了；而这种相对稳定，与美国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

加强是密切相关的。在图一中，这表现为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29年的只有3%上升到五、六十年代的约20%。近年来，为了克服经济危机，联邦政府支出又有比较显著的增加。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为了克服消费不足、有效需求不足而进行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又带来了新的矛盾。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加强，还是福利国家、工会等制度，客观上都造成了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资产阶级剥削能力的下降，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出现了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变化。

图二显示了1929年以来美国历年利润总额占国内总收入比例变化的情况，即利润份额。这里的利润总额包括一切形式的资本家财产收入（公司利润、利息、租金以及业主收入的资本收入部分），而国内总收入即按收入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图二 美国经济的利润份额，1929-2014年

从图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从1929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经济中的利润份额总的来说趋于下降，这反映了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利润，如果

因为利润份额下降而导致利润率下降，资本积累就必然陷入危机（利润率区别于利润份额，利润率指的是资本家的利润与资本家的投资总额之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危机表现为所谓“停滞膨胀”现象（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表现为美元濒于崩溃，表现为工人学生运动高涨、美国资产阶级统治摇摇欲坠。正是为了挫败工人阶级的攻势，美国和其它国家的资产阶级才实行了包括货币主义政策在内的新自由主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对此，阳和平同志一方面不否认美国资本主义一度出现了利润份额、利润率下降的局面，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利润份额、利润率的下降只能是生产过剩造成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失业率下降，工人工资上升。从物价水平来说，通货膨胀逐渐加速。为了进行侵略越南的战争，约翰逊政府既要大炮、又要黄油，一方面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另一方面实行所谓的“伟大社会”计划。按照和平同志的理论，实在是应该大大“缓解”生产过剩才是。

如果按照和平同志的观点，美国七十年代以前的利润份额下降是由于生产过剩造成的，难道到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经济利润份额上升，是不是就说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过剩越来越“缓解”了呢？这是于理不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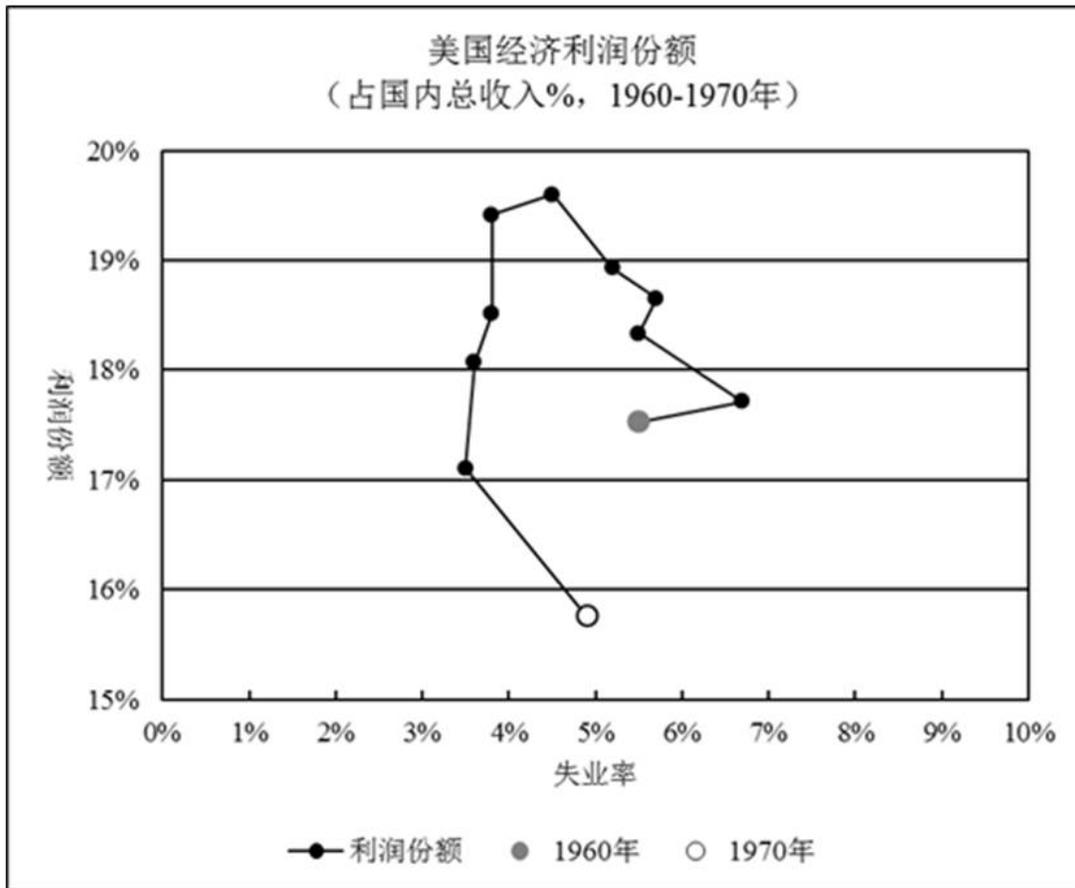
### “利润挤压”和经济周期

关于“利润挤压”危机倾向的论述，并不是少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明出来的，而是最早见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和第三卷第十五章的若干段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资本主义阶级矛盾和危机形式的变化，逐渐地引起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重视，并在七十年代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关于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主要解释。另外两种主要的解释是《每月评论》学派的垄断资本主义长期停滞说和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导致利润率下降说。需要说明的是，在持后两种看法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否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出现过一个工人阶级力量明显上升的时期。

为了说明“利润挤压”危机倾向，阳和平同志引用了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的观点：“在经济复苏期，随着失业率的下降，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上升，工资上升，挤压资产阶级的利润，资产阶级不得不反扑，用减少投资，关闭工厂，打压工会，抬高失业率，制造经济危机的手段来制服工人阶级。而后利润率得以恢复，经济复苏，工人阶级的力量又在上升，直到资产阶级的再次反扑。”这段话中，除了一开头的“经济复苏期”如果改为“经济扩张期”则更准确以外，其它部分还算客观。

然后，阳和平同志准备了若干幅图表，试图来说明利润挤压危机倾向不符合事实。有意思的是，阳和平同志既然在上述论述中已经明确谈到了失业率与利润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统计资料又并非特别难找，和平同志所提供的图表，却没有一幅是比较失业率与利润率或者失业率与利润份额之间关系的。

既然和平同志或有不便之处，笔者帮和平同志把一些统计资料补上。下图说明了美国六十年代经济周期中失业率与利润份额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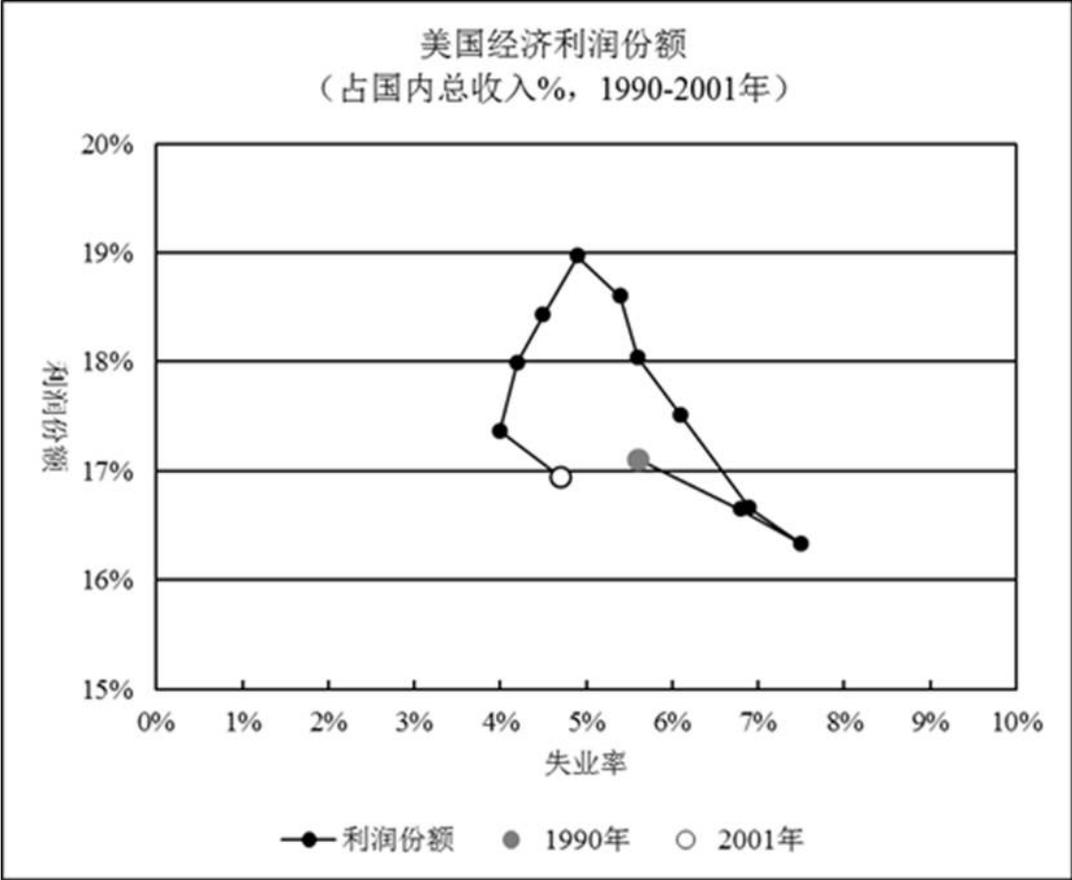
图三 美国经济利润份额，1960-1970年

图三显示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经济周期中失业率和利润份额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在1960年经历了一次轻度衰退，失业率上升持续到1961年。此后几年，美国的失业率处于5-6%的较高水平，工人的斗争能力还不够强。所以在经济复苏初期，资本家是主要的受益者，利润份额快速上升，由1960年的17.5%上升到1964年的18.9%。到了1965年，利润份额达到顶峰（19.6%），失业率已经下降到4.5%。这时阶级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由于产业后备军萎缩，工人斗争能力和信心都迅速上升。六十年代后半期，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份额急剧下降。到1969年，失业率下降到3.5%，利润份额下降到17.1%。按照资本主义的标准来说，3.5%的失业率几乎就可以视为“充分就业”，整个经济的产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利用，从而危机爆发之前几乎不存在生产过剩。

只是在1970年的经济衰退中，才出现了失业率上升，同时利润份额下降的局面。这一年的利润份额下降，可以说是由于生产过剩引起的。但这不过是危机爆发时的表现形式，而危机产生的原因显然要从此前连续数年的利润份额下降中寻找。正是由于工人斗争力量的上升，造成了利润份额和利润率下降，才使得在一定的阶段，资本家的投资信心崩溃，从而导致投资大幅度萎缩。另外资本家解雇工人，也导致失业率上升，消费下降。

在经济危机初期，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力不会马上下降，会抵制资本家压低工资、转嫁危机的企图，所以整个经济有效需求的下降有可能表现为利润份额的下降。

下面再来看一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周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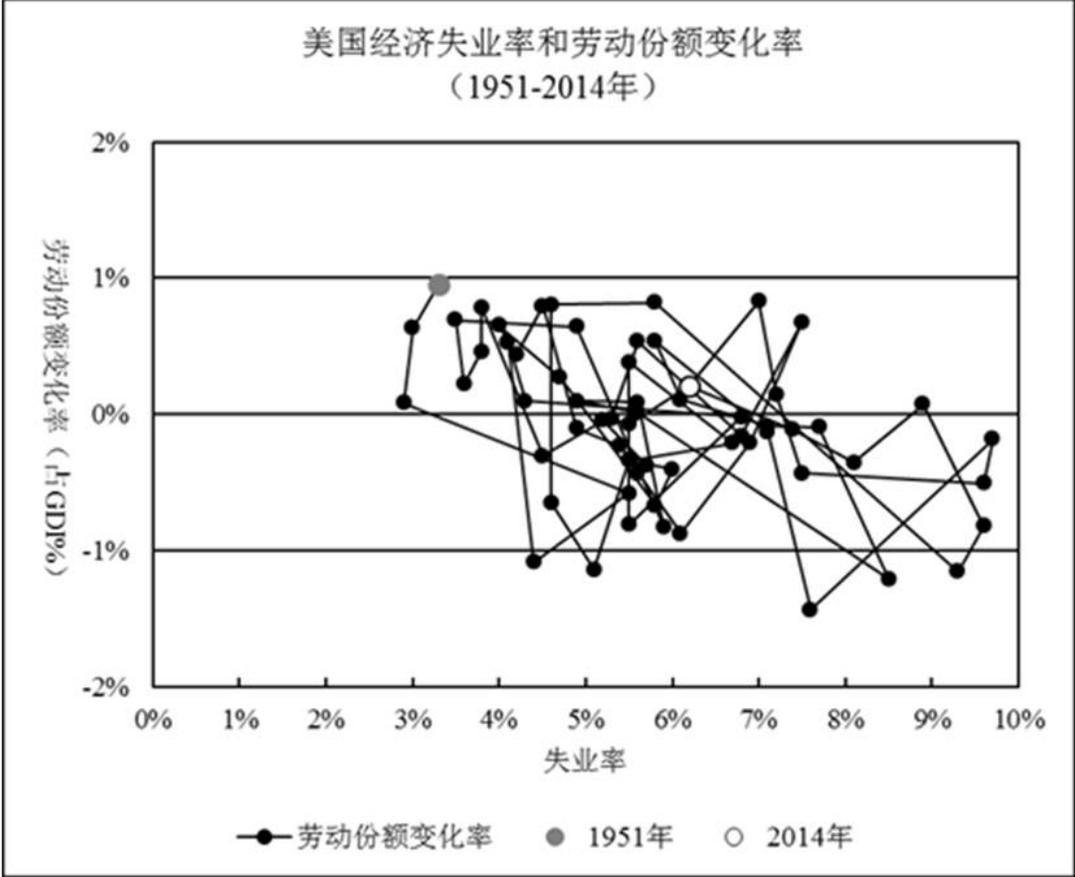
图四 美国经济利润份额，1990-2001 年

美国经济在 1990 年底至 1991 年初进入衰退。一直到 1992 年，失业率都在上升，同时利润份额下降。如上所述，这是经济危机期间的表现。此后，1993 年至 1996 年，虽然失业率逐步下降，但始终处于 5% 以上的高水平，利润份额稳步上升。1997 年，利润份额达到顶峰，失业率也开始跌破 5%。此后，1998 年至 2000 年，失业率下降伴随着利润份额的下降，直至 2001 年爆发经济危机。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美国经济正处于所谓“新经济”繁荣中，失业率也一直趋于下降，于 2000 年下降到只有 4%。这个时期，美国经济即使有生产过剩，也是相对轻微的。

可见，即使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在工人阶级力量总的趋于下降的大形势下（不知何故，在“主讲人的错误”一节中，和平同志非要用美国工人在九十年代以来实际工资停滞的事实来试图推翻主讲人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人阶级力量增强的论述），在具体的经济周期中，仍然可能出现工人斗争力量暂时增强从而导致利润挤压的局面。

上面分别分析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比较典型的经济周期。如果将美国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数据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分析美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利润份额的变化与失业率（作为产业后备军的统计指标）之间的平均统计关系。

图五比较了 1951-2014 年美国的经济数据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分析美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利润份额的变化与失业率（作为产业后备军的统计指标）之间的平均统计关系。这里，劳动收入包括全部的雇员报酬和业主收入中的劳动收入部分。所谓变化率，指的是每两年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差。数学上就叫一阶差分。



图五 美国经济失业率和劳动份额变化率，1951-2014 年

如图所示，在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也就是说，失业率越高，工人斗争力量越弱，劳动收入份额越趋于下降；失业率越低，工人斗争力量越强，劳动收入份额越趋于上升。如果对二者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线性回归，可以发现，失业率每上升 1 个百分点，则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率就要下降 0.155 个百分点。平均来说，劳动收入份额在失业率下降到 5.5% 以下时开始上升；在此失业率以上，则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下降。这个统计关系的统计 t 值高达 3.9，在 0.02% 的水平上显著。就是说，失业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有 99.98% 的统计概率存在。

上述统计关系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产业后备军”的论述以及利润挤压危机倾向的理论预期。

## 关于中国的阶级斗争

关于中国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危机的关系，我在他处有详细论述，此处不重复。这里仅简单地评论一下阳和平同志的几个观点。

阳和平同志承认，近年来，中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大幅度上升。但是，为了证明中国工人工资的上升与工人斗争力量上升无关（不知道为什么，和平同志似乎本能地强烈反感一切关于工人斗争力量上升的论述），和平同志坚持认为工人实际工资的上升是由“城镇化”引起的。

确实，完全在城市生活的工人其生活成本要大大高于那些传统的在城乡之间“两栖生活”的传统农民工。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的资本家都是活菩萨吗？如果不是因为工人阶级的有效斗争，资本家何必付给越来越多的工人足够高的工资，从而使得他们能够负担在城市的的生活成本呢？如果不是因为工人阶级的有效斗争，工人继续做他们的农民工，资本家有什么损失呢？还是说，中国的资本家的血管里突然开始流淌起了道德的血液？阳和平同志自己都举了例，世界上实现了高度城市化，但是劳动者的收入不足以维持正常生活、从而大量人口在贫民窟中挣扎的国家有的是。这不恰恰说明，中国工人的斗争能力比那些国家高过一筹吗？

为了说明中国工人的斗争主要是“防御性”的，阳和平同志引用了中国劳工通讯的一些资料，试图说明，大部分工人罢工主要是为了反对迁厂、倒闭、拖欠工资等。

首先，关于罢工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工人斗争的力量和综合的阶级力量对比。要比较全面地了解阶级力量对比及其对资本积累的影响，还是要看国民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化。

其次，沿海诸省的制造业资本家为什么在经历了多年经营以后纷纷要搬厂、倒闭呢？至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正是因为近年来，沿海工人进行了越来越卓有成效的斗争，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接受较高的工资成本，利润率急剧下降，所以资本家才急于寻找新的廉价劳动力场所吗？所以，这样的“防御性”斗争，至少是在普遍进行的工人有效进攻基础上才发生的。并且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有效进攻似乎还没有停止，所以资本家的利润率还在下降，于是更多的资本家还要搬厂、倒闭，从而引起更大范围的“防御性”斗争。

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这样的工人斗争，无论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都不是没有限度的。

## 改良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在整篇批判文章中，和平同志有一个主旋律，那就是将主讲人的观点判定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或者“不像马克思主义”；而主讲人最主要的罪过，莫过于为“改良主义”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引导工人阶级走上劳资双方“共赢”的邪路。

和平同志的批判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谁来判定，某人、某事、某思想、某观点，是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

或许有人认为，只要“回到马克思”，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问题没有这么简单。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由于被资本家压迫剥削、生活条件所迫，是没有多少时间和条

件来阅读经典著作的。有条件阅读的进步知识分子，也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至于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也决不会放弃各种机会来歪曲、“解读”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闹剧，就是一例。

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是辩证唯物主义。将经典作家在一定时期、一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思想当做不变的教条、万世不可更改的圣经，是既不唯物也不科学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经常地学习经典著作，从中吸取营养、得到启发。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主要是十九世纪欧洲工人的革命运动的产物，反映了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从中初步总结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运动规律。列宁、毛主席依托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上世纪六十年代，又出现了新的世界革命高潮。在六十年代革命高潮的基础上，国际上（不仅是在欧美，而且也在拉丁美洲、南亚、中东、俄罗斯等广大地区）形成了大量的、新鲜的进步思想成果。其中有一些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范围内的，有一些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以外的。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外的，都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认识，增进了我们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基本运动规律及其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趋势的把握。

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进步分子来说，必须努力继承中国的和外国的以往一切的进步思想成果，这不仅要包括马、恩、列、毛等经典作家，尤其要注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革命高潮以后产生出来的一大批进步思想和实践经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的进步左派团体多数缺乏来自后一个方面的营养和启发。

无论是古代、近代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不能够给我们当前的实践提供现成的标准和公式。中国的左派进步分子，应当有决心、有勇气，根据二十一世纪中国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根据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经验新办法，独立自主地解决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问题。

在这方面，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还是走其它的道路，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客观的历史实际，取决于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及其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十九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流行的“生产过剩”危机说并没有阻止欧洲工人运动在二十世纪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事实上，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式简化为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购买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就是在第二国际时期才流行起来，后来又经过斯大林定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版本）。

而从历史实际情况来说，正是因为由消费不足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形式，才在客观上存在着通过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让步，来一方面提高工资、缓和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借着工人增加消费，来提高有效需求，从而实现资本家、工人“双赢”的历史可能性。

与阳和平同志努力要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恰恰相反，历史与理论的事实都是，简单化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恰恰是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经常依靠着的理论基础。

与阳和平同志所诬蔑的相反，由于利润挤压所造成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恰恰反映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核心国家以及一部分半外围国家的工人阶级力量已经上升到相当的程度，以至于他们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已经无法被世界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最低限度所容纳。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或者，工人阶级将斗争引向更高的阶段，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界限；或者，危机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并且剥夺

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历史改良成果来解决。这难道不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基本世界历史事实吗？

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在经过了长时期的被奴役被压迫、近乎任人宰割以后，开始进入了新的斗争力量上升的阶段。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工人阶级也将面临类似于欧美工人阶级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韩国工人阶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面临的历史检验。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能不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的道路，做出一番前人没有做过的新的事业！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大浪淘沙，一切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都要经受考验——是走在历史的前面，还是被无情地遗弃，还是在滚滚洪流面前无助地徘徊——对于历史，或许是无要紧要的，作为个人，还可以选择。

## 中东与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

远航一号（2015年12月1日）

近日，由于叙利亚形势恶化、难民危机、恐怖袭击事件以及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新近爆发的紧张形势，人们对于中东地区的关注大大增加，网上评论连篇累牍，但是多数属于主观臆测、道听途说，真正能够把握当前中东地区问题本质并正确说明其与世界阶级斗争联系的，并不多见。

笔者对中东问题缺乏专门研究，但是依靠在其它领域的多年研究以及日常对国际形势的关注，积累了一些想法。现在简单地说几点，与读者一起探讨。

现代中东危机的根源在于上世纪中后期“阿拉伯社会主义”（实际即阿拉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失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有一个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共同作用下，外围和半外围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带有对内实行阶级妥协、对外摆脱西方帝国主义控制色彩的各种各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比如当时的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尼赫鲁的“印度式社会主义”、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时期的“建国五基”以及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都属于这种情况。

埃及是当时“阿拉伯社会主义”的代表性国家。但是到了1967年，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战败，属于进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纳赛尔声望严重受挫。到了七十年代，埃及与同时期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其他许多国家一样，陷入积累危机。于是，在萨达特时期，埃及撕毁了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全面投靠美帝国主义，对内抛弃国家资本主义、大搞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外与以色列媾和并实际上成为美帝在中东的一个桥头堡。

与此同时，另外两个“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伊拉克、叙利亚也逐步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伊朗在巴列维统治后期，由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引起的阶级、宗教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伊斯兰革命，摧毁了当时美帝国主义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支柱。随后，在美、苏的共同支持下，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发动侵略伊朗的战争，经过八年苦战，以两败俱伤而告一段落。

中东地区真正开始大乱，则是在美帝国主义为了挽回自身霸权的衰落而进行军事冒险以后。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全面确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如日中天，此后就进入了逐步衰落的过程。苏联解体以后，表面上，美国成了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但是实际上美国霸权衰落的进程并没有停止。

这里所说的霸权衰落，主要不是就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经济、金融、军事实力来说（虽然与这些都有关系），而是就美国越来越丧失维护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维护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意愿和能力来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由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经济和政治体系，需要一个霸权国家来维护整个体系的共同和根本的利益，包括地缘政治的稳定、世界范围的宏观经济协调、缓解世界环境危机等。

到了世纪之交，美国统治集团面临着如下的战略选择：或者，是承认霸权逐步衰落的现实，接受并且有效管理这种衰落，从而使衰落的过程尽可能延长、代价尽可能缩小；或者，利用美国仍然掌握着的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一举占领并有效控制位于中东中心地

带的伊拉克，并据此向周围辐射军事力量，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从而通过控制世界主要的能源供应地来达到“挟石油以令天下”的目的。

小布什政府的军事冒险以惨败告终。这说明，在现代条件下，由于外围、半外围国家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即使是像伊拉克那样宗教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组织得很不好的人民游击战，内无有效领导，外无大国援助，也可以运用现代武器有效地打击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武力。在美帝国主义方面，越南战争失败以后，由于惧怕美国人民的反对，被迫放弃了征兵制，从而使得美国陆军雇佣军化。因此，美帝国主义虽然海空军无敌天下，但是却严重缺乏为了对一个地区建立有效占领和统治所必需的陆军力量。在伊拉克战争的高峰，即使美国投入了它在全球二十几个旅的陆军作战部队一半以上的力量，仍然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美国不得不采取剿、抚并用的办法，一方面短暂增兵，另一方面与部分基地组织以外的逊尼派部落合作，才得以暂时“稳定”了伊拉克局势，使得美军可以逐步抽身。但是，与此同时，伊拉克“中央”政府却落到了实际为伊朗代理人的什叶派穆斯林手里。

这样，到美军大部分撤出伊拉克之时，伊朗在中东的势力已经迅速扩张。与腐败、专制的沙特阿拉伯、埃及等政权相比，伊朗一度成为中东各民族、各教派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政治象征。通过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巴勒斯坦哈马斯民兵以及什叶派控制的伊拉克“中央”政府，伊朗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从地中海到波斯湾之间的广大地区（其中真主党民兵在2006年胜利地挫败了以色列的军事侵略）。这就引起了腐朽的沙特王朝以及以色列军国主义种族隔离政权的严重恐慌。

在中东诸大国中，埃及的内部矛盾最为尖锐、积累体制最为脆弱。由于抛弃了国家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业化，又不像海湾诸国那样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再加上对粮食进口的严重依赖，埃及的资本主义积累已经陷入绝境。埃及人民一方面反对穆巴拉克独裁统治，另一方面对于当局的亲美亲外交政策强烈不满。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终于导致埃及长期积累的矛盾全面爆发。

埃及旧政权垮台以后，一度在多个中东国家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政治热情。这时，首先是英、法两个过气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错误判断形势，以为可以借机扭转西方帝国主义在中东地区的颓势，在中东（特别是北非）建立一批自己可以控制或影响的亲西方政权，积极策动推翻利比亚卡扎非政权，美国也随后跟进。结果，导致利比亚局势完全失控，并为后来的难民危机埋下了种子。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国认为这是趁机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并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天赐良机，开始积极策动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叛乱，逐步发展到出人出钱出枪，导致叙利亚境内各民族各教派“民兵”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叙利亚内战完全失控。

在美帝国主义方面，始终处于逡巡徘徊、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本来，自奥巴马上台以后，已经全面放弃了布什政府的军事占领中东、“挟石油以令天下”的战略方针，而是采取在全球缩短战线，在承认美国霸权衰落的大前提下，与其他各大国（首先是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共同维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基本秩序的方针。（就美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扼杀中国崛起”的图谋；当然，这并不妨碍美帝国主义要努力保持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绝对军事优势。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如果中东地区全面失控，则无论是对于美帝国主义而是对于资本主义各大国来说，都是不能够接受的。但是，在美国无力也无意恢复大规模军事干预的前提下，美国

已经失去了有效干预中东形势的手段，欧洲更没有进行军事干预的能力和意愿，于是就只能听任中东地区的形势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伊斯兰国（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的纵容和支持下）突然崛起以后，美国加紧了与伊朗妥协的步骤。但是，这种妥协是有限度的。伊朗的要价实际上是以放弃反美为交换，要求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伊朗在中东地区的霸主地位，而这是以色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绝对不能接受的。

伊斯兰国崛起以后，整个西方在战略上完全被动。美、英、法等国时而幻想，靠着支持所谓“温和”的反对派能够在叙利亚建立亲西方的“民主”政权，重温政权更迭的美梦；时而不得不面对现实，与抵抗伊斯兰国最有力的库尔德等民兵组织合作，因此又与土耳其等传统盟国发生了尖锐矛盾；当美国为了应付中东乱局，而不得不与伊朗缓和关系时，其与以、土、沙等传统盟国的关系又迅速恶化。当西方支持的各派民兵组织纷纷败阵，阿萨德政府又摇摇欲坠时，俄罗斯为了维持在中东的桥头堡（也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果断进行军事干预，这就使得整个中东的局面进一步复杂化，同时引起了美国和西方统治阶级内部在俄罗斯问题上的激烈争吵。

当前的中东危机，是美帝国主义全面衰落、从而已经丧失维持地缘政治稳定的有效能力而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即将走向灭亡的前夜各种矛盾全面爆发的反映。

目前，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各大国都已经无力保持中东的稳定。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整个中东地区将无法恢复有利的资本积累条件以及基本的社会秩序。在这种形势下，不仅中东将乱下去，而且由于中东紧邻欧洲，由此引起的巨大难民危机将在不久的将来引起欧洲的全面动荡。即使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关闭了合法的移民渠道，大量难民通过各种非法渠道涌入南欧各国，然后再逐步渗透到西欧、中欧，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形势下，欧洲的福利国家和多元文化体制将不可避免地崩溃，各种阶级和民族矛盾将全面激化。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欧洲的前途将一片黑暗。

在未来几十年，除了以色列迟早要为阿拉伯人民长期反抗斗争的浪潮所吞没以外，沙特阿拉伯爆发革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世界上仅存的几个专制君主国之一，沙特王朝的统治完全靠着以石油收入为基础的、类似于满清王朝豢养八旗贵族那样的将国内逊尼派多数养起来的福利国家体系，同时对什叶派少数残酷镇压。如果石油价格持续低迷，沙特阿拉伯固然难逃财政危机进而导致政治危机的厄运。即使石油价格恢复，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量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开始下降，从而到一定阶段引发沙特阿拉伯的全面危机。

无论是欧洲资本主义糜烂，还是沙特王朝崩溃，对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打击都将是致命的。到了那时，中国资本主义恐怕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或者，中国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会先于欧洲、沙特阿拉伯，也未可知。

## 学习毛主席的战争理论、正确认识当前阶级斗争的特点

远航一号（2015年12月27日）

毛主席是唯物辩证法的大师。毛主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和发展起来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大批革命军事理论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些革命军事理论著作，不仅对于革命战争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往往还是应用唯物辩证法的经典范例，因而对于一般的革命实践也有着广泛的指导意义。

毛主席亲自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就是这样一篇经典范文。这篇文章最初是1942年10月12日毛主席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现在的标题。毛主席这篇著作，笔者年轻时也读过，但是当时并没有注意到，毛主席撰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在斯大林格勒激战正酣的时候（而不是在苏军全面反攻、德军战败已成定局之后）。在这篇社论发表之后三天，德军发起新的攻势，打到了伏尔加河边，坚守斯大林格勒狭小地段的苏联红军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当时，不仅罗斯福、丘吉尔不认为苏军会取得胜利，斯大林也没有完全的信心。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主席最早做出了苏联红军必将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以及这一胜利将证明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光辉论断，并且还早于苏军总参谋部准确地预测了苏军反攻的时间和地点（见网上文章“史上最强战争评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http://bbs.tianya.cn/post-no05-396725-1.shtml>）。

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毛主席首先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于一九一八年冬，在一九一六年，德军曾向法国要塞凡尔登举行数度的进攻。当时德军的战役统帅是德国皇太子，投入战斗的力量是德军的最精锐部分。当时的战斗是带决战性的。德军猛攻不克，整个德奥土保阵线再也找不到出路，从此日益困难，众叛亲离，土崩瓦解，走到了最后的崩溃。然而当时英美法阵线方面，还没有看出这种情况，以为德军仍极强大，不知道自己的胜利已经快到面前。”

接下来，毛主席指出，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战役一样，斯大林格勒战役也必将证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挣扎。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也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质。自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全部渡过顿河河曲，全面地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九月十五日德军一部打入该城西北部工业区，至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该区德军包围线为止，共计进行了四十八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一战终于胜利了。在这四十八天中，这个城市每天的胜负消息，紧系着无数千万、万万人民的呼吸，使他们忧愁，使他们欢乐。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在上述两段话之间，毛主席插入了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论述：“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

毛主席的这段论述，不仅符合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而且也符合阶级斗争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中国的左派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相当一部分左派积极分子对革命前途缺乏信心，或者口头上有信心而实际上没有信心。这个问题的存在，从认识上来说，是因为没有能够正确地把握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及其矛盾。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资本主义是一个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基本特点决定了，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是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必然造成一个人数广大并且越来越有组织能力的工人阶级。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个工人阶级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必然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并且提出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然而，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半外围地位，不占有或只占有很少的超额剩余价值，这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不具备通过改良主义方式来缓和阶级矛盾的能力。这样，中国的阶级矛盾最终只能以突破资本主义狭隘界限的方式来解决。

当上述的尖锐阶级矛盾接近爆发而尚未爆发的时候，资本家的利润率会急剧地下降（但是尚未下降到爆发全面经济危机的水平）。为了挽救利润率的下降，一部分资本家会关闭工厂、转移资本，迫使当地工人开展反对关闭工厂、要求补偿的斗争。为了遏制工人运动增长的势头，资本家会对资产阶级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当局用暴力手段镇压工人运动。这些，都是我们当前正在目睹的。

面对这样的表面现象，有一部分同志发生了思想的混乱，乃至惊慌失措。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在进攻，而工人阶级只能防御，看不到资产阶级目前所谓的进攻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现有的困难，并且还会给他们增加新的困难。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的镇压会消灭原有的“合法空间”，从而使得工人运动和其他进步运动处境更加困难，而不愿意设想工人运动和其他进步运动可以在新的政治条件下以新的方式生存和发展；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少一些“合法空间”，未尝不是一种积极和健康的因素。

最近左派队伍中集中争论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自由派（实质即受到跨国资本影响、带有买办性的小资产阶级右派）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关系。所谓自由派工运，其实质是企图通过有限度地发动工人斗争，对资产阶级造成一定的“压力”，以此换取资产阶级给与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上层）以政治自由，作为小资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推行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反动政策的回报。

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的工运积极分子，在一部分工人群众中制造这样的幻想，即只要有了资产阶级政治自由，就可以同时实现所谓“劳工三权”（组织工会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并通过“劳工三权”使得所有工人都可以分享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利益。

这种自由派工运要得到全面发展的前提，是中国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容纳“劳工三权”而不危害到资本积累的根本利益，并且资本家能够通过国际剥削掌握足够的超额剩余价值，从而一方面容许工人分享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保证资本主义利润的增长。然而，正是由于半外围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这两个方面的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于是，自由派工运的发展，就必然遭到资产阶级的反扑。或者，按照南方自由派的语言，叫“打压”（笔者是北京人，着实不习惯这种“港台范儿”）。

经济上，资本家采取的是关厂撤资的办法。当这种经济反扑遭到工人阶级顽强抵抗的时候，资本家就必然要求助于资产阶级国家（难道这不是早就可以预料到的吗？），并且把镇压的拳头砸向他们自认为的工运主谋和策划者——自由派工运积极分子。这实在也

是没有办法的事，按照资产阶级国家的认识水平和工作方式，我们难道还能做其它的设想吗？

于是，就发生了当前南方自由派工运的挫败。这种挫败，在表面上，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的镇压。但是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改良、妥协的空间已经枯竭或者正在枯竭。正因为如此，尽管自由派积极分子们苦口婆心、泣血上谏，告诫当局，如果不为他们的 NGO 提供“合法空间”，就会逼着工人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当局还是置若罔闻，硬是要置“现代武训”们于死地。对于自由派“劳工界人士”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亲者痛，仇者快”。

除了上述两个重要原因以外，自由派“劳工界人士”自身的弱点和缺点，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值得一提的、造成他们挫败的次要原因。这些自由派积极分子的弱点和缺点，本来，是值得马列毛左派加以总结、引以为戒的。有意思的是，在当前一部分左派同志中，指出自由派人士的弱点和缺点，竟然成了一种禁区。谁如果不以最大的嗓门、高八度地表示对被“打压”自由派人士的同情，谁就是“五毛”、“皇左”，换言之，就是革命的敌人。一时之间，俨然成为一股潮流。

对于这样的潮流，我是要反一反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下，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少数人也要敢于坚持真理。无非是挨骂，脸皮厚一厚就挺过去了。

中国当前阶级斗争的真理是什么呢？那就是，改良主义的大门已经关死了。当局镇压也好，不镇压也好，自由派工运都是没有前途的。

中国工人阶级的前途无非是两个。一是退缩和放弃，将过去几年已经争得的一些有限成果原原本本地还给资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跳跃“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永远被剥削、被压迫的“双赢”。我相信，即使是最没有觉悟的工人也是坚决反对这一前途的。不仅如此，这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只要中国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它就在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做着不自觉的推动者。

再一个前途，那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继续发展壮大，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能力不断提高，从而他们的最低要求突破了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最大界限。到了那时，这个矛盾便只有以砸碎中国资本主义狭隘界限的方式来解决。

我相信，在改良主义的路堵死了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才开始、才能开始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自主发展的阶段；也只有在这个阶段，工人阶级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